

出 版 说 明

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从1972年11月开始登载了以T·K为笔名写的《韩国通讯》。

从那以后十多年来，我出版社把这些通讯编译成各国文字的书出版。已有许多读者成了我们的朋友。那是因为这些通讯以生动的材料赤裸裸地揭露了南朝鲜社会的腐败和法西斯化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1945年，朝鲜人民获得解放后，着手建设自主独立国家。南朝鲜也曾到处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人民意气风发，投入了新社会的建设。

然而，霸占了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实行他们的殖民统治，动用暴力炮制了李承晚傀儡政权。当然，这种傀儡政权遭到了南朝鲜人民的一致反对，到1960年，由于4·19人民起义，象一座砂城一样垮台了。

美帝国主义看到它的这个殖民统治机构陷入危机，就于1961年唆使它的走狗发动5·16军事政变，炮制了朴正熙傀儡政权。

独裁者朴正熙傀儡梦想长期掌权，连有名无实的“国会”也象敝屣一样扔掉，炮制了使一人独裁体制合法化的“维新宪法”。这就是所谓1972年的“十月维新”。

整个南朝鲜土地在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下变成了“外人当家的故土”，变成了傀儡匪帮肆行“蹂躏人权的情报政治、无视社会舆论的高压政治”的“无气之宇，无汁之地，无光之世”。

可以说，《韩国通讯》是作为“十月维新”的见证出现的。所以，我们的一位读者说，想真实地观察南朝鲜现实的人们并不是把《韩国通讯》当做野史，而是当做正史来读的。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1980年光州大屠杀事件后，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等，南朝鲜各阶层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杀人魔鬼全斗焕的法西斯统治制度而奋起进行的斗争。

本文摘自日本杂志《世界》登载的1982年和1983年度的通讯。

1984年1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I 491042

目 录

向往联合斗争 (1982 · 11)	(1)
元丰工会的斗争	(1)
学生斗争日志	(7)
狱中斗争的胜利	(13)
谁能阻挡春天的到来 (1982 · 12)	(22)
时代的趋势	(22)
颓废的浪潮	(27)
三起事件	(33)
金大中的“获释”	(40)
最底层的思想 (1983 · 1)	(45)
死亡之城	(45)
充满忧虑和希望的对话	(50)
悲怆的岁月 (1983 · 2)	(58)
落地的谷穗	(58)
政治把戏	(63)
追究真相	(68)

否定的道路 (1983 · 3)	(72)
在一个毕业典礼上	(72)
再度监禁	(77)
不可饶恕的人们 (1983 · 4)	(82)
被凌辱的学校	(82)
抵抗的激进化	(88)
创造“先进祖国”	(94)
殷切的呼声	(100)
怒火冲天 (1983 · 5)	(106)
大盗贼的故事	(106)
禁忌对象——民众	(112)
光州和汉城	(118)
推动时代前进的人们 (1983 · 6)	(128)
暴力在逐步升级地扩大	(128)
兵营化了的大学	(132)
光州事件三周祭	(137)
金泳三的斗争	(140)

向往联合斗争

1982年11月16日讯

元丰工会的斗争

汉城之行

我的爸爸和妈妈
已经3年卧病不起，
后山上的药草全都挖来，
给他们做了药。

天天早上
啼鸣着飞去的鸟儿哟，
愿你替我来探望，
安慰我的爸爸和妈妈。

如我离去由谁来
照顾年老的父母，
去汉城的路，

为什么这样遥远。

这是，今年夏天，由叫“形成社”的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女工的生活记录《现场札记，汉城之行》中的一首诗。作者是宋孝顺。这本反映真实的书，当然立即被禁止出售。作者在札记的“后记”中写道：

“被解雇后两年来的变化是两个朋友结婚了。她们虽然结了婚，但为了不忘记悲酸的往日，都想奋发起来，再进工厂去多少参加现场劳动。我们每周见一次面，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友情更加深厚、牢固。想着复职的那天到来，我们没有领退职金，要继续进行斗争。公司方面可能想，岁月逝去，我们就会东一个西一个地散去，但只要对后来的工友有所帮助，我们将继续忍受痛苦，不停地斗争。在很多单位，工人们在各种借口下冤枉地被解雇，彷徨街头。我认为只有他们得以复职的那一天，才会在这块土地上建成正义的社会。”

宋孝顺是在大一化工厂被解雇的女工。这个厂的民主工会也遭到了破坏。

美国系统的电子工业工厂昆特老·泰塔7月20日，宣布工厂停业，撤走了。这个厂是在1967年，花320万美元建成的。当年就出口相当于1.7万美元的电子计算机零件，1979年，出口额达到2,400万美元。他们未经同工会的协商，就以闹工潮为借口，单方面地撤走了。这样，240名工人失了业。工人们组织机动队，在男工的帮助下，甚至进行了暴力斗争，但反而3名女工遭到逮捕，被判了3年徒刑。

人们说，应该由美国本公司代表出庭作证，可是他们没有露面。退职金也没有按规定发。据说，工人们拒绝接受的退职金，撤走时托给了法务部。他们曾通过报纸约定，不仅给工人们发优厚的退职金，而且负责介绍工作，进行再就职的职业性训练。然而，他们根本不管就职问题，而且由于被贴上昆特老·泰塔工人的标签，工人们再就职的道路完全给堵死了。这个公司加剧工潮，给自己造成有利的条件后，逃走了。

令人不禁痛叹，跨国企业的真面目就是这样的。人们痛叹地说，这就是最近美国对所谓“友邦”所持的露骨的态度。如今，他们连“恩人”的假面具也摘掉了。年轻的人们愤慨地说，美国是被人们骂为掠夺者也感到高兴的厚颜无耻的东西。

这回开始了对元丰毛纺厂工会的破坏工作。这是被称做民主自由工会的仅有的一个工会。9月13日，有一名工会会员突然遭到公司方面暴徒的袭击，住了医院，可是受害者反被解雇了。当工人们对此提出抗议的时候，又有4名工会干部被解雇了。9月27日，100名暴徒占据了工会办公室，监禁了工会支部长。于是工人们对此提出抗议，进行了绝食斗争。这个斗争的特点是，男女工人一同参加了斗争。9月30日到10月1日，进行了两天的绝食斗争。在这期间，有250名来历不明的男汉闯进来，拉走了650多名工人。这时，警察包围工厂，帮助他们。另一方面，以非法举行罢工破坏了工厂器物为借口，开始逮捕了很多工人。

10月7日，永登浦产业传教会建筑里，有一个支援元丰

毛纺厂工会的小组准备开祷告会。有2,000多名学生和工人赶到这里来了。可是警察破坏了这个祷告会，并逮捕了要参加祷告会的学生。据核实材料，被逮走的有124名。

据说，至今在元丰毛纺厂，有67名工人被撵出去，200名被逮走，有很多人被提交当即审判，支部长郑善顺等5名工人被捕受审。此外，要参加祷告会的4名学生好象也被捕受审。34名学生被提交当即审判，14名被强征入伍。因为这是学生和工人要联合的运动，当局为此特别动脑筋。

全斗焕匪帮对这种事态的态度是强横的。因为他们最害怕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害怕这种抗拒波及全国。元丰工会事件是为把自由工会统统破坏，预先铲除政治不安因素而周密筹划的行动。同在昆特老·泰塔事件时搞的一样，他们发动新闻出版手段，继续宣传，说“城市产业传教会促使企业破产”。这是说，元丰工会的背后也有城市产业传教会。《京乡新闻》(10月18日)甚至发表了题为《面临危机的元丰毛纺厂——‘城市产业传教会’的暴行，不能袖手旁观》的社论。下面介绍这篇社论的头一段和最后一段：

“‘城市产业传教会’又把一个企业赶进了破产局面。由于属于‘城市产业传教会’的工人们的激烈斗争，国内数一数二的纺织企业元丰毛纺厂不能正常进行生产，面临危机。”

“如上所述，如果‘城市产业传教会’超出纯粹的宗教范围，继续保持秘密结社的性质，不停止激烈的斗争，那么不应该从劳资问题的角度，而应该从国家保安问题的角度对待他们。我们认为，借此机会，当局要考虑到，克服我们当前的经济困难的关键之一，就是维持劳资间的圆满关

系，对城市产业传教会彻底进行调查，查出其不经之行，采取消除它的强压措施。”

如上所述，青瓦台叫报纸宣传说，工人运动是反国家行为，把本应看做是一个工厂的劳资纠纷的这个事件当做最大的问题之一。据说，法务部、内务部等的长官和叫做安全企划部的中央情报部部长同全斗焕讨论了这个问题。

工人的斗争，无论在元丰毛纺厂内部或外部都将继续进行。他们的要求是，工会运动正常化，解散暴徒集团，救济被监禁者和被解雇者。

这个公司属于拥有海外市场的国际组织。据说，这个组织还向美国等国家出口“胜利之女神”牌球鞋。抵制其出口，也算是一条帮助斗争着的元丰工人的途径。

这些工人的斗争，不是单纯的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而是争取生存和维护人的尊严的斗争。他们主张，工人也是人。因此，这些妇女在斗争中，领悟到人生的意义，更加强同志式的团结和友谊，并从中感到喜悦和骄傲。她们进行着不屈的斗争，在这过程中，她们愈加坚强地成长起来。正因为如此，就是遭到失败也不懊悔。因为她们从中得到了很多东西。

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9月末召开的保守的教派——大韩基督教长老会总会，虽然受到要断绝同城市产业传教会的关系的压力，但他们断然拒绝了。被政府和企业方面收买的代表企图非难城市产业传教会，但遭到与会者的强烈抨击，没能继续发言。与会者们主张，当前应要求的是传教的自由，而不是抛弃传教。甚至还通过了坚决要求

释放政治犯的决议。他们还说，黎巴嫩的悲剧使人联想到两年半前的光州事件，并深表同情，做了捐献。

很多人得知这个消息，表示惊讶：“那个保守的教团竟那样做了吗？”并表示感叹说：“他们仍然保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拒绝参拜神社的传统呀。”

10月18日，教会联合组织——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发表了《关于镇压元丰毛纺厂工会和城市产业传教会一事的声明》，对制造暴行事件并任其自流的当局和继续搞片面宣传的新闻出版机关追究了责任，并主张恢复民主的工会。声明最后指出：“我们教会将永远同城市产业传教会和元丰毛纺厂工会同舟共济，继续做祷告。”

下面援引这个声明中虽然语调温和但反映了韩国的现实和国民心情的一段文章。

“最近发生的美因文化院纵火事件、宜宁屠杀无辜居民事件、韩国教会社会传教协议会发表声明事件、张玲子和李哲熙的巨额期票舞弊事件等，使人对第五共和国所标榜的‘实现正义社会’抱怀疑。夏天发生的与昆特老·泰塔停业有关的对工会的镇压以及最近对元丰毛纺厂工会的暴力破坏行为等，使人不能不感到第五共和国所标榜的所谓‘民主幸福社会建设’是空谈而已。”

现今，可能是搞假面舞会的时代。最凶恶的家伙戴上正义和爱国的假面具，毫不羞愧地到处乱窜。要生活在这样不知羞耻的时代，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啊。所以，这个国度的有良心的年轻人感到心如刀绞。

学生斗争日志

学生的斗争越发显得悲壮。谁也无法预料，在哪里发生什么事。在这森严的警戒之中，领导人不断地被逮捕或强征入伍，但他们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断。不知互相怎样取得联系的，大学之间，事先约定好，然后象进行奇袭一样搞联合行动。

据我拿到手的学生斗争日志，只在汉城，从1982年1月到9月20日，发生了60起事件。在这期间，有133名学生被捕入狱，受拘留处分的学生有36名，有许多学生被强征入伍，而且由于1980年和1981年的事件转入地下的学生当中，被捕的事件有10起，人数为13人。10月和11月，学生斗争逐步升级地扩大，波及到地方，件数达40起以上。为此，被扣留受审的学生竟有100多名。当然，比这更多的学生被提交当即审判或被强征入伍。这样，政治犯急剧增加，想必达到600名。下面摘要介绍学生日志中的重要部分。

从9月13日到15日的成均馆大学的示威

9月13日，从下午两点钟示威一个小时，就儒学系学生长因预算问题遭到学生护国团(下称总团)干部殴打的暴力事件，提出抗议。儒学系学生150名高呼“暴力总团滚出去”的口号，并要求他们公开谢罪和辞退。

9月14日,召开文学系总会,讨论了学校民主化、关于日本教科书的歪曲问题、对付暴力总团、御用总团的对策。发表《为了韩国的自由和民主》的声明。从12点开始,有600到700名的学生进行了约两小时30分钟的示威。

9月15日,召开社会科学系总会,通过了关于学校的民主化、暴力总团的公开谢罪和辞退、韩日关系问题的声明。从3点钟开始,有文学系、儒学系、经济商学系的3,000名学生进行约一个小时的示威游行。武装警察闯入学校,发射辣椒面弹和催泪弹。

9月15日, 汉城大学的示威

9月14日,各系的总会召开了关于日本教科书歪曲问题的讨论会,决定在15日下午1点在阿克罗普里斯召开全体总会。

15日1点钟,学生开始聚集,遭到守门人和便衣警察的阻止。1点10分左右,在学生食堂和学生会馆进行静坐斗争的学生唱着歌,喊着反日口号开始游行。又有一批学生汇合起来,有1,000多名学生进行示威,直到5点钟。5点左右,便衣警察在阶梯上殴打学生。女学生被打倒,阶梯上留下血迹。直到第二天,有7名被捕。

从9月14日到18日,美以美神学院的示威

9月14日,由于贴出将召开有关“肆意大批教务惩戒和

变化无常的学校行政”问题的会议的广告，有两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对此，学生们从5点左右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静坐斗争，要求让两名同学复学。

9月15日，拒绝上课。

从16日5点左右，200多名进行绝食斗争，要求从9月16日到18日的期间，让被开除学籍的同学复学，校长辞职。

17日，教员们要拖出学生时，有5名昏过去，被抬走。

18日午后5点左右，有来历不明的250名青年和200多名戴着写有“太拳”字样的帽子的人跟着便衣警察闯进来，包围和解散了学生，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

9月22日，梨花女子大学的示威

12时许，在大学校楼的四楼阳台上，50多人散发了《告梨花民主学友》的声明，并举行了示威。12点30分左右，约200名高呼着“要求纠正日本教科书的歪曲”、“亲日政府滚下台”、“反对经济合作”等口号，在校内举行示威。到12点40分左右，示威队伍扩大到1,500名，示威队伍走过大学校楼前、图书馆前、大礼堂前，由于发射催泪弹而解散，有1名被捕。

9月24日，许多大学的示威

下午4时许，在YWCA(基督教女子青年会——译者注)前面开始示威游行。500人的示威队伍经南大门、市厅、好

莱坞剧场等,游行达4个小时。下午6点,在教育保险文库前,也有1,000名唱完爱国歌就开始游行。他们高呼“停止经济合作”、“纠正歪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部”等口号。在清溪川和钟路之间,也聚集了1,000多名学生,共有1万多学生参加示威。9点左右,在好莱坞剧场前,由于发射辣椒面弹,疯狂殴打,许多学生负伤。用3辆汽车逮走200多名,10时许,示威队伍被解散。被逮去的学生在26日零点被“训斥释放”,但多数被强征入伍。

10月6日到10月11日,庆熙大学的示威

10月6日,由于校方废除建筑科,建筑科总会决定反对废除这个学科。200多名在正楼前面,高呼“学校行政在愚弄学生”、“立即停止独断行为”的口号,开始静坐斗争。10点钟,自动解散。

10月7日,上午10点钟,工学系、产业系的500多名学生高呼着“御用总团滚出去”等口号,进行静坐斗争。当警察和教员要强制解散时,他们就肩并肩地在校内游行示威。7点左右,自动解散。

10月8日,工学系、产业系、文理系停课。1,000多名学生聚集在主楼前,高呼着“暴力集团——学生处滚下台”、“要澄清迁校问题”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下午5点左右,300多名武装警察闯进校内,对在图书馆的和举行示威的学生破口大骂,进行殴打,并把他们拉出去。当工学系决定进行绝食斗争,正在进行静坐斗争的时候,7点左右,警察

闯进7楼,粗暴地骂他们,把他们拉了出去。两名被捕。

10月9日,上午10点左右,工学系500名学生在主楼前举行示威。文理系600名学生也进行静坐斗争,要求撤销黑暗行政。学生方面一要求同校长会谈,校方就把200名学生引诱到教室。随即有200名武装警察和来历不明的150多名青年破坏门和窗户,拿着方木和玻璃片闯进来,乱加殴打。他们拿玻璃片刮人脸,搬起椅子砸人,致使数十名负伤,14名住院。

10月10日,警察占据学校。学生在学校前面,喊着“保证学校自由化”、“杀人魔鬼滚出去”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警察不仅殴打和逮走参加游行的学生,还搜查背胡同、茶馆、酒馆等,殴打和逮走了学生。午后1点左右,在外语大学附近举行示威。

10月11日,全校学生拒绝考试。在文理系前面,2,000名学生喊着“杀人魔鬼滚出去”、“警察暴力团滚出去”、“保证学校自由”等口号,进行静坐斗争。1点左右,走到街道,在外语大学后门集结,在徽庆洞一带进行示威。3点左右回到学校,4点左右,300多名举行示威,要求“校长辞职”。由于便衣警察和武装警察的恣意殴打,被迫解散。很多学生被逮走。

10月13日,公布:8名学生无期停学,4名学生有期停学。

光州学生事件(1929年11月3日)纪念日示威游行

为了纪念11月3日光州学生事件,10月27日,汉城大

学举行了示威游行。这天下午6点钟,在警察的森严警戒中,学生们一齐来到塔公园前面,举着写有“打倒全斗焕”字样的横幅标语,散发着题为《告国民书》的印刷品,举行示威,来到钟路5街附近。往回走时,在钟路2街,由于警察的暴行,数十人被逮走。有人说,逮走了70名。同一天,在汉城,各汉城市立大学、梨花女子大学、中央大学、庆熙大学也举行了示威。在地方,庆北大学、全北大学举行了示威。

学生的斗争接连不断。这对甚至动员市内暴力集团来维持秩序的全斗焕匪帮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虽然学校被践踏成那个样子,但校方和教师们却做暴力的走狗。

弄到这种地步,还能搞什么教育呢。据说,大学里,要实行对成绩的“相对评价”。这是说,把成绩分成一定的比率,因此,即使得了90分,也有可能被评为C。他们是要用这种方法,把学生束缚在成绩竞赛中。这个问题教师也不能随便处理。但是,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平息学生的愤怒,反而更加激起愤怒。这是全斗焕匪帮为维持政权而进行的疯狂的阴谋活动。

把大学搞成这个样子后,负责治安的人在成了“表决机器”的国会上,竟大言不惭地说:“便衣警察假装大学生进大学的事是没有的”,“我要弄清安插纯化教育者这一流言蜚语的根源”。最近各家报纸也觉得这种事太不象话,不能不在一个角落登出文章,评论治安本部的这种大话引起的反应。据说,那个家伙遭到了学生的非难,又接到了追

究他的电话：“你怎么敢做那种假证言？”逼得他辩解说：“由于学校方面的请求，有过把便衣要员派进学校的事，但是，未曾有过给便衣警察穿上学生服、带上校徽，甚至登记在学籍簿上，使他监视学生的事。”

这当然又是一个“假证言”。对于以纯化教育为借口动员起来的暴力团的问题，连提都没有提，这只能引起学生们的冷笑和愤慨。这些流氓就是全斗焕的纳粹青年团或意大利法西斯党员吗？如果是那样，这有多么肮脏啊。这也许是说明全斗焕匪帮的本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反映了韩国人反对法西斯主义，抗拒不道德的暴力的姿态。实际上，全斗焕匪帮曾多次声称要组织青年团，但总以失败告终。如果上面谈到的是“假证言”，那么，这个体制说的搞的，统统都是“假证言”，是戴着假面具搞的政治。因此，目前，学生们希望他们的斗争得到市民的支持。他们认为，反对全斗焕集团的斗争，必将成为全民性斗争。

狱中斗争的胜利

全斗焕一派当权者分明是害怕国民，敌视全体国民。最近，他们突然向国会提出“资源管理法案”，企图制造又一个骚动。按规定，必要时由国家管理和训练从20岁到50岁的男子，报纸、广播、电影都由国家管理。对现在已经掌握的权力还嫌不满足，这回要求“全盘托出自由和财产”，要把一切置于军部的支配之下。这个法案是只要政府认为

必要，就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动的。

为什么突如其来地提出了这样的东西呢？如果用现在掌握的权力也不能统治这个国家的国民，那么，再用什么样的法律也是不可能统治的。再说，资源管理法这个名称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不是因为不好沿用日本人用过的国民总动员这个词？这不是说，在他们军人的眼睛里，人也只不过是象消费品一样的资源吗？拿出这样的货色，这是凭常识简直没法想象的狂人把戏。

在这里介绍一下一位朋友对这个问题的评论：

“以前的刘总理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目前，这个国家的经济象重病人一样处于严重状态。因此，如调治不慎，就会使病人本身死去，务必慎重。因为全斗焕集团接受了他的意见，他才出任了总理。但是，不懂经济的军人是根本不可能慎重处事的。发生了张玲子事件以后，说是搞经济革命，把利率时而提高时而降低，胡乱发表经济政策，并发动御用新闻出版机关大加自我吹嘘。出现了私债市场问题后，又大叫大嚷什么实名储蓄啦、课税啦的。这么一来，钱就无影无踪，流向利率高的外国去，造成了资金不足，于是又增加了通货量。现在，说是要搞一番调整。试问，膨胀了的通货打算怎样处理呢？总之，陷入了死胡同。所以刘总理也拂袖辞退了。一切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不知他们要拿这个资源管理法案搞什么名堂。不经研究和讨论，就突然亮出来。因为作战是秘密嘛。漏洞百出就不能不害怕民心。于是他们可能要搞出能使国民震惊的事情来。这是要转移人们的视听的。不管怎样，那

个所谓国会不过是个装璜而已。但是国民想，难道还会有比这更坏的？便采取冷淡的态度，任他随便去做。其实，不仅经济是这样，政治也一样，不去碰倒好些，可是由于他们很不安，不搞点什么名堂来进一步束缚国民，就不能放心。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哪怕杀人的训练也要搞一搞嘛。”

从最近的报纸上有时倒也可以看到些有关社会情况的文章。据说，这个国家10大财阀的总售货额达到国民总产值的42.8%，而30个财阀占60%。仅据财务部向国会提出的材料，就可以知道去年58.9%的劳动者每月平均收入为10万圆（约合日币3.3万圆）以下。加上，大财阀也泰然地说，自己的资本勉强达到18%，通货膨胀会给他们创造还债的可能性。

这是到处都能看到厚颜无耻的人以狰狞面目在俯视的世道。因为他们这样不合理地凌驾于他人之上，所以总是害怕民众，不能不动用暴力。

据说，目前，外债有377亿美元，这相当于国民总产值的51.3%。1982年，其利息是6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总产值的8.2%。据说，因此，今年要引进75亿美元的外债来偿还原利息。而且，为了新的五年计划，继续增加外债，1986年把它增加到650亿美元。但据说，把它加以调整，压在550亿美元的水平上。各家报纸也表示忧虑说，由于这种情况，会进入象墨西哥一样破产的时代。借款这个东西总是要被大国夺去比它更多的东西的。在这过程中，行使暴力的当权者和资本家填饱私囊。而且把那些钱储存到稳定的大国去，只有这样，钱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放下心来。

10月6日，基督教教会方面召开人权问题全国协议会，发表了1982年《人权宣言》。下面介绍这篇宣言的一部分。

“今天，统治者的横暴变得露骨化、暴力化，人权几乎每天都在被扼杀。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不禁感到心慌和战栗。进行严刑拷打，对学校 and 工人社会施加有组织的武装镇压，到头来连教会的祷告会也用武力禁止，把讲坛上的说教也当做搜查对象，进入了默示的黑暗期。”

“继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和正义而奋起的光州义举之后发生了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我们特别深切关心与这个事件有关联而受审判的良心犯。我们希望，实现民主正义社会的最后一个堡垒——司法部站在维护人的尊严——人权的立场上，进行这个审判。韩国教会的800万人的眼睛将注视这个审判。我们痛切地感到，我们和他们是共命运的，把他们经受的痛苦当做我们自己的痛苦。”

“韩国教会把今天挨饿受压迫的工人、农民和穷人看做是当年与基督一起斗争的伽列里亚的民众。我们确信：今天这样的韩国教会的传教使命就是为他们开展争取生存权的恢复人权运动。”

“我们确认：在今天的韩国社会，由于冷战体制分裂的逻辑、统治者的正当化阴谋和保安的逻辑，使韩国社会合理的秩序遭到了破坏。……在韩国社会，民众言论被破坏，只有官方言论存在。言论只为政府的公报服务。它的横暴、歪曲、夸张、片面的报道扼杀了民众应知道的权利和应告知的权利。只为政权的保安而加强情报监察的结果，造成了不信任的空气，加上游兴业的发展使国民的精神越发堕

落，越发非人化了。”

可以说，这篇宣言的内容，比1976年，金大中等为之而被捕的《民主救国宣言》的内容更强烈。可是，只有几个人被警察传去，受调查，再没有发生什么事。全斗焕匪帮好象已经没有了监禁重要人物的力量了。宣言说，现在完全是黑暗时期，并称光州事件为光州义举，把它列在1960年4·19革命的地位。因此，不许对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进行错误的审判。也可以说，这个宣言提出了能够向全斗焕体制全面地提出抗议的与它对立的国家方案。然而，当局却不敢下手。这是因为如把很多人监禁起来，狱中和狱外的人特别是连市民都要为表示同情而展开斗争。

参与民主化运动的一位朋友说道：

“他们虽然掌握那么多的权力，但不能压制抗拒的呼声。于是他们甚至企图炮制所谓资源管理法，但那是不可能成为法律的。他们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他们很想要日本的钱。但是，因为怕学生，全斗焕集团不敢直言。学生把它称做‘保安经济合作’。意思是说，那是用来加强军队，延长政权之命的钱。对此，日本也最好不要过分地积极行动。这回可能要掀起真正的反日运动了。反日运动，只要一旦掀起，就一定会马上燃成熊熊烈火，蔓延开去。

“天主教的正义及和平委员会和新教徒的人权委员会，共同编辑了一本小册子《关于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的报告——以第一审审判过程为中心》。对此，当局也没敢下手，只是禁止分发，进行监视。现在，第二审正在进行，那个《抗诉理由书》实在是理直气壮的。那里还详细地写了施

加拷问的事实。若是有一天执行了有关这个事件的死刑，学生和宗教徒们就会掀起强烈的抗拒旋风。美国大使馆也害怕这一点。

“我觉得，在光州，朴宽贤一个人的死，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大大激起了光州市民和学生们的抗拒。光州的抗拒差不多带有暴力性质。全斗焕集团为了不引起第二次光州事件，这次比较慎重了一些。不管怎么说，政府着了慌。目前，当权者方面和军部的秩序很乱，各自行动。到头来，政府方面不得不在报上登出大篇文章来作辩解。教会和光州市民大喊说，那是谎话。朴宽贤咽气时，医生和护士都哭了。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对进行绝食斗争的他施加拷问的痕迹。另外，光州监狱的50多名政治犯和大田的40名政治犯进入了绝食斗争。那是豁出生命的斗争。如果再出现死亡者，那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因此，当局保证要改善政治犯的待遇，但是，政治犯们表示拒绝说，那是不可信的。于是，当局求教会的人权委员会和家属去说服他们。这样，好不容易解决了。据说，待遇立即有了变化。可以说，这是由于朴宽贤的死，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的结果争取到的一个胜利。”

对于法务部长官对朴宽贤之死的见解，10月21日，良心犯家属协议会发表反驳的文章，具体地提出了抗议。那文章讥讽道，政府连尸体也偷去，悄悄地埋掉后说什么，若对朴宽贤问题论是论非，就要以流言蜚语论罪，严惩不贷，这简直太厚颜无耻了。而且，就把真实的言谈“非难为恶毒的流言蜚语”的问题提出抗议，列举了许多事实。

绝食不只是为了表示抗拒而搞的。因为给他们吃腐烂的食物，提出了改善非人待遇的要求，可是官方不接受，所以进行了绝食斗争。由于进行绝食斗争，有很多人来探望他们，这一点，朴宽贤自己在法庭上也做过证言，监狱长也在家属面前承认过。“法律的执行者法务部长官”竟否认这样的事实，把事实说成是流言蜚语，加以惩罚，这是什么行为？把尸体偷去，却发表说，验尸结果是心律不齐和心肌梗塞症，这怎么能叫人相信呢？因此，家属们甚至到政府综合办公厅去进行静坐斗争，要求“改进教导行政”。为此，警察对家属也从各方面进行了调查，但没敢再下手。

看来，暴力的界限终于显露出来了。如果不正当，那么力量本身就会衰萎，变成无用的东西。这一年也快要过去了。

残毒的行为并没有停止。据说，10月7日有8个人，8日有7个人被当做共产主义者处刑了，可是连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公开。当然，报纸上也根本没有发表。朴宽贤是在10月12日咽气的。紧接着，发生了光州和大田的教导所的绝食斗争，事态十分危急，不定什么时候出现第二个朴宽贤之死。10月20日左右，在光州，家属和人权委员会代表直接向良心犯转达了当局要改善待遇的诺言。

大田的斗争更为激烈。他们说，当局的诺言是不可信的。据说，终于在10月23日，38名良心犯聚集在礼堂里，对家属和人权委员会的保证最后表示同意，才停止了绝食斗争。这样的协商、对话和让步在韩国监狱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事。据说，探监、书信往来的次数也要增多，放风时

间也要延长。还能受到定期诊察和治疗，也可以受到外部的诊察和治疗。另外，还能得到煤油炉子，也可以转到离家近的城市监狱去。据说，文益焕牧师已经转到汉城附近的安养监狱去了。告诉我这些消息的那位朋友继续说道：

“有消息说，良心犯受诊察后甚至得到维生素。另外，金大中夫人10月16日，在没有用玻璃隔开的房间，不受监视地与金大中会面了1个小时30分钟。这样传开了将实行圣诞节特赦的风闻。敏感的人说，明春金大中将去美国。

“全斗焕集团本来就恶毒到极点，毫无原则，所以怕情报传到国外，怕得神经过敏了。他们借口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年轻人向外国人提供了情报，就判他18个月徒刑。他们依据的这项法律是1975年在朴政权当时，执政党议员们由于遭到在野党的反对，只有他们自己参加的秘密会议上通过的。运用这条法律判刑是头一次。他们还对美国广播公司的女记者朗斯顿和加拿达广播协会记者本兹两个美国人下了驱逐令。虽说是他们的护照有问题，其实是因为他们写了批判性的通讯。据说，还有很多与美国教会有关系的人被禁止入境。

“总之，全斗焕集团被赶进了窘境，在于千方百计地企图找出一条出路。他们决不会放松镇压，如果放松，他们就会被推翻的。用暴力做垂死挣扎的时候，便是他们终结的时刻。我不认为，全斗焕匪帮除了自取灭亡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英明地选择一条出路的理性。”

如果说，从1972年10月宣布戒严令并推行所谓维新体制的时候起，大力开展了民主化斗争，那么民主化斗争到

今天将近有10年的历史。可是，如果从1960年4·19和1961年的朴正熙军事政变算起，民主化斗争已超过了20年。在那以前，从解放那天起，斗争是一直持续了的。也许这个斗争的起源应该回溯到遥远的1910年日本把朝鲜变成殖民地的那天，或比那更久远的年代。韩国的军事法西斯分子受到世界范围的扶持的条件下，韩国的民主力量虽不很大，但能一直斗争到现在，是因为我们也有世界良心的支持。我衷心感谢海外的朋友们10年来给予支援和支持。祝愿你们迎接幸福的新年。

最后，这里引用继续斗争10年、如今还在狱中的金大中最近写给家属的信(11月2日)中的一段作为他向监狱外的各位的岁末问候，来结束今天的通讯。

“为了国民，为了我自己的良心，要度过遭受灾难的一生，这岂不太过分了。不只是我一个人，家属自不必说，有多少弟兄、亲戚、朋友为我牺牲了啊！每当想到他们，我痛心欲绝，言语难表。世界上再没有比眼看着别人为自己受折磨也做不到什么事更为痛苦的事了。岂止这些呢。我活到现在，受了多少多的人的恩惠呀！个别人的恩惠、麟蹄和木浦选区居民的恩惠、国民的恩惠，任何一个恩惠我都没能报答，所以只有痛心而已。度过这苦难的一生，出于非本意地麻烦人，没能报答人们的恩惠，连自己小小的抱负也未曾实现过。想到这些，不禁深深怀疑我的一生究竟有什么价值。……”

谁能阻挡春天的到来

1982年12月16日讯

时代的趋势

全斗焕政权发动所有的新闻出版物，拿日本的教科书问题鼓吹反日情绪，才好不容易从张玲子的7,000多亿圆期票舞弊事件中挣脱出来了。这样，同张玲子相勾结的全斗焕的妻子李顺子现在又能和他的丈夫一起重新出现在新闻出版界面前了。但是很难说，国民对全斗焕的恐惧，不，蔑视已经消除了。对全斗焕及其集团的厌恶却越来越加深。这恐怕是谁也不能阻挡的历史的趋势，是民心所向。

全斗焕政权的处境使得它一方面如此扇动国民，另一方面还谈论什么60亿美元的经济合作，对日本察颜观色。因此，新闻出版机关每天都要请示上司，该在何等程度上批评日本。表面上搞反日，在背后不得不搞亲日交易，全斗焕政权的这种自相矛盾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朴正熙政权时代的亲日派都要复活了。这回也一样，将同更凶恶的强盗集团携起手来。全斗焕的弟弟负责搞这件事。这种风闻现在正在汉城市面上流传着。知道这种底细的许多民主的

国史学者对这一次反日浪潮置若罔闻，这可以说是引人注目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忍无可忍，呐喊起来了：

“诸位国民！我们学生看到这个国家的黑暗现实，无法抑制愤怒，合上心爱的书本，奋然站起来了。”

“全斗焕政权，只有依靠残忍的暴力才能维持下去，他们宁愿把民族的灵魂出卖给外国，也要把持政权。诸位国民，对用欺诈和暴力进行压制的、财阀和军部横行霸道的这块土地怎能依旧袖手旁观呢？我们的前辈曾抗拒日本帝国主义捍卫了民族的灵魂，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统治进行了斗争。我们学生继承他们的遗志，今天为谴责全斗焕政权的暴力镇压政治和反民族的姿态而站起来了。”

这是在11月3日各大学学生拥到汉城市中心大街——钟路的时候，用汉城大学全体民主学友的名义散发的题为《告国民书》的呼吁书的一段。呼吁书还要求不要向日本乞求经济合作，美国要召回驻韩大使渥克。还要求撤销对指为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主犯的金铉奖和文富轼的死刑。呼吁书里还谈到了工会问题、言论问题等，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在这个国家情况中成为焦点的问题。反日、反美倾向将变得更为强烈。在日本和美国支撑全斗焕政权，支持它监禁民主力量，把国民赶进恐怖之中进行掠夺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时代趋势。

年轻人将变得更激进。尽管如此，他们在声明和呼吁书里努力保持稳健的姿态。这为的是取得全体国民的支持。因此，他们改变了在校内举行示威的战术，这次带着象《告国民书》那样语气温和的呼吁书到大街上去呐喊。市民看

到武装警察对他们的残暴行径，感到愤怒。看来这样向市民号召的动向，今后将更加扩大。其实，原来估计这次秋季的抵抗会更加扩展开来。但是我的一个朋友说，由于寒冷突然袭来，抵抗似乎停息了。他接着说：

“学生们对这种不道德的、残忍的统治忍无可忍，站起来了。那是在铁蹄践踏下难以忍受痛苦而发出的悲鸣。即使全斗焕垮台，在又一次的混乱中，军人上台的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反复下去。但还是不能不呐喊。

“他们说，那种恶性循环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新时代不久就要到来。有不少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能要在这种痛苦中结束一生，但这是值得自豪的。当权者，看起来好象挺自信，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自信，而这些抵抗的人则好象没有自信，但是他们有确信和信念。这是奇怪的事情。从前，大学的1~2年级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如今，即将毕业的4年级学生在指导和参加示威。他们所以能够做会断送一生的行动，是因为他们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学习的坚定了信念。他们是为理念，豁出生命忘我斗争的。”

这可能就是历史的趋势。全斗焕集团的统治给国民带来的绝望，将给这个国家的历史带来什么呢？韩国国民把期待寄予政治而得到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几乎没有正确地遵守法律。因此，不得不依靠个人或全家的力量开拓这个人生道路。由于全斗焕集团的统治，国民不能不愈加背离当权者了。朋友继续说：

“可以说，这是抛弃国家的心情。当国民抵抗军部的时候，它的当权者是要垮台的。那么这个政治所招致的矛盾

和被压迫的民众的要求就会一下子爆发出来。如果是这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会再次由军部掌握政权。很多人认为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极端堕落的民间人政治家即使掌握了政权也是搞不下去的。很难设想，国民会忍受着跟着它。

“所以，中产阶层很想迁居到除了这个国家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应该说，这真象是南越的难民在政权垮台之前开始乘船逃走的一样。财产和人都在逃之夭夭。这个趋向是无法阻挡的。这就是美国以军事战略为基础的政策破产。单靠世纪末的军人政治的暴力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必须有能够吸引国民的某种理念、价值或道义之类的东西。

“五角大楼是不懂这一点的。所以，它把全斗焕这种人捧上了台。驻韩美军司令，胡诌什么韩国国民象迁移的野鼠一样，所以不管谁他们都跟着走。可是那个胡说八道的驻韩美军也好，美国驻韩大使馆也好，看到急剧变化的韩国局势，大为惊慌，保持沉默了。尽管如此，美国还企图暗示：美国好象在担心韩国事态，希望实现民主化。应该说，又开始搞起新的诡计、鬼把戏和欺骗来了。新到任的美军司令顾忌象从前威卡姆上将那样接近全斗焕集团。看来在美国驻韩大使馆里，由熟悉韩国情况的代办来决策。

“但是，我们不能受骗。解放后近4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受美国的那种巧妙的双杀战术的骗而牺牲了啊。

“在国民中间充满抛弃国家的心情的情况下，决心留在这个国家斗争到底的人，是有希望的。当为从祖国出走而出国留学的风气盛行的情况下，在年轻人中间有一些觉悟

高的学生以拒绝留学外国的姿势进行着抵抗。他们说，民族的大多数还是留在这个土地上的啊。他们坚持着民族不灭论。”

可能是旧的东西在倒塌，新的东西在萌动。也可以说，很多东西同旧的东西一道被水冲洗着。在这样的时代，企图苟延残喘的政权，虽然拥有力量，实际上是很可怜的。我的朋友还说：

“全斗焕集团不会有对未来的理想。他们只是生活在瞬间的。他们认为，考虑未来是不合算的。那里没有政治。只是在根据C I A的情报或街头巷尾的风闻，埋头于防卫自己。由于他们的恐惧心理，那些情报和风闻每每都要夸大起来。

“现在他们做了恐惧心理的俘虏，怕明春在大学和工人中间发生大规模的民众起义，正在谋划保卫政权的计划。他们把一切都集中在那里。如果连高等学校学生也都拥向街头的话，该怎么办呢？到了那个时候也还能守住政权吗？军人把枪口转向这个市民也不会出什么事吗？那时候，军队内部还能平静吗？全斗焕集团企图同全体国民做对来保卫政权，对军队的忠实与否大动神经，集中地对它进行工作。”

当权者感到威胁，怕得发抖。他们为自己干出的野蛮暴行而惊恐起来。由于这种恐惧心理，他们反而对国民施加惨无人道的暴力。这样，野蛮暴行就要变本加厉，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害怕国民。这种恐惧心又表现为对国民施加暴力。这种恶性循环日甚一日地反复不止，直到革命爆发时为止。这就是时代的趋势吗？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流传着一条奇怪的风闻，说是驻大邱的第二军司令白云决在一次酒宴上，和同僚——部下互相弄枪，被击毙。这是在11月10日前后发生的事件。据说，这件事发生在他去找全斗焕忠告说，照这样下去，不禁令人为国家命运担忧之后不久。这个第二军司令和全斗焕是同一个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十一届毕业生。他的继任是第十二届毕业生即特战团司令朴熙道。他也是空降队出身的将官。

据另一个风闻，由于这一骚动，实际上死了3个人，被驱逐了7个将官。有的说他们是谋划政变的。还有一条风闻说，在其背后也有前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金馥东。他同全斗焕一起行动，是由现任内务部长官卢泰愚等组成的三人小组的一员。

这莫不是玩刀者为刀所灭吗？难道这也是时代的趋势？

颓废的浪潮

暴力统治所招致的最可怕的东西是国民的精神颓废。因为把国民看做是敌人，国民就无从知道真实。言论被封锁了。使人不能不担心，由于外资的引进不如意，韩国是不是不久就要变成墨西哥的样子呢。据说，他们最近指示各企业说，要经私人通路引进外资。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为把这真实情况告知国民并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作出的努力。在这样日趋灭亡的情况下，新闻出版机关被迫报道说，这

个政权一向实行善政，并取得发展。这种不正直而颓废的思想是个大问题。什么是真实呢？为找这个真实，在市民中间流传着流言蜚语。

韩国基督教农民协会出版了《庄稼人的主张》漫画集小册子。因为这件事，这个协会的会长和印刷业者受了拘留处分，小册子被禁止出售了。事实上，这个小册子是要在真实被掩盖的环境中澄清真相的，哪怕微小的也好。这里介绍其中的题为《种庄稼赔本》的漫画的一部分。

A

标题：种庄稼赔本，只有债台高筑。欠农业协同组合的债平均每户超过100万圆的村子增多了。（《新东亚》1981年第十期）

男农协职员：借的钱可不少啊，所以没有钱可领喽。

女农协职员：请交股金吧。

农民：……（手里拿着收款证，有口难辩地站在那里。）

B

贴在墙上的标语：“笑脸偿还必需时借的钱。”

农协职员金某：就那么回去，怎么行啊？要缴草袋钱、农药钱和肥料钱啊。

农民：……。

C

标题：还了债，扣除一项又一项，生路渺茫。

男孩：我想念高等学校！

女孩：饿死我了！

D

（可是广播和电视里却说）：“获得了丰收，该过好日子啦；获得了丰收，该过好日子啦；该过和过去根本不同的好日子啦。”

E

农妇：我不是早说过到城市去搞点行商比这强嘛。
这叫什么命啊。

农民：看你，又说这个。

F

标题：总之，10年来有360万农民背井离乡。
（《朝鲜日报》1981年4月23日）
（全家挥泪离乡。）

画这种程度的漫画，说这点真实，也是不容许的。因此，流言蜚语成了能够了解真实的唯一手段。据说，不久就要改组内阁。而且，将给一部分曾被禁止政治活动的所谓老政治家解除禁令。所以采取这种措施，是因为担心明春紧张局势加剧，以至爆发起来。但是，所谓这个一部分人无疑是同全斗焕集团约定合作，能够以在野党的名义，破坏真正的政治活动和真正的在野党的人。

虽说是针对明春的措施，但那是从表面上装作改变印象，实际上更加加强暴力的措施，这是不言而喻的。今年秋天，穿着栗色夹克的机关人员大批地钻进了学校。这是在逮走可疑的学生或示威学生之前把他们弄得半死不活的

暴力集团。他们想，如果许多学生看了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就会不敢想去举行示威。但是对豁出生命掀起的抵抗，打算怎么办呢？某一大学的朋友轻声地说道：

“与其说是法西斯，倒不如说是杀人强盗团。学生们抱着刻骨的怨恨。这种怨恨促进着思想的迅速进步。那些穿栗色夹克的家伙们，甚至有指挥警察的权利。据说，他们为整治警察，甚至对警察官肆行了暴行。可见他们无疑是从军部来的。如果女大学生或女工遭到逮捕就被强奸。虽然她们本人不说，但甚至遭到轮奸哩。拿强奸来威逼她们，这就是全斗焕集团统治的本质。对此进行抵抗，与其说是政治斗争，倒不如说是作为人的呐喊。过去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员或纳粹党员也可能是那样做了的。这是残忍的人的巢穴。除非残忍的人，是活不下来的。军人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战场。这可能是一个制度没落前夕的征兆吧。

“不管怎样，既然是对此进行抵抗，学生们也是豁出生命进行激烈抵抗的。过去在朴正熙统治时期，先让在大学读书的他的女儿回家后才举行示威游行的。但是，近来在汉城大学，就在全斗焕的女儿面前，举着写有打倒杀人魔鬼全斗焕的字样的横幅标语呐喊。看来，全斗焕终于把儿子送到美国去了。但是他依然打算做当权者。他简直不是人，而是个疯子。用一般常识是不可想象的。但据说，他还谩骂学生的行动是只有敌人才能干出的勾当。”

这的确是走向灭亡的时代。在非人的独裁统治下，很多人变得极为颓废了。只有少数有勇气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坚守人的灵魂，保持民族的精神。这也许是使人期望

到了下一代能够开出花朵的唯一的保证。

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写得太多了。在这里抱着那种期待和希望，援引从狱中送出来的两首诗。一首是在今年10月下旬，大田监狱的良心犯们结束绝食斗争时，哀悼朴宽贤的死而创作的题为《没有花没有十字架的坟墓》的诗。另一首是文益焕牧师在1982年圣诞节前夕送出来的题为《和平》的诗。《和平》共38行，这里只引用开头的几行。

没有花没有十字架的坟墓

没有名字没有花也没有丧钟敲响，
不流泪不叹息，以男子汉的气派，
你的老同志们，你的亲戚们，
把你安葬在地里。
遇难者哟！土地是你的灵枢台。
没有花没有十字架的坟墓，
只有一条心愿，同志啊！
为了你，要报仇，报仇雪恨，
只有立下一个誓言，同志啊，
要战斗，永不停息地战斗。

和 平

土地，就是和平。
土地的心怀就是和平。

比天空广大的心，
比海洋蔚蓝清明的心，
比太阳炽热的心，
土地的心怀就是和平。
脚掌吻着土地，
感到羞愧，
丝毫不嫌恶，还吸取
散发的恶臭，
让花树开放花朵，
脚掌感到羞愧。

这样把人的耻辱反映在诗里。对夸耀制造核武器的手，
脚掌不禁愤怒。听到在伟大文明的阴影下，饿得难忍的孩
子的哭叫声，脚掌感到绞痛。《和平》以如下的几行结束。

踏着诚恳的土地，
脚掌犹如火一般。
站在火热的土地上，
脚掌犹如火一般。
愿献出挺立的身躯，
让火烧尽成为牺牲品。

是不是在颓废的污水坑中会涌出一股清水呢？是不是
历史起净化作用，把污水坑清理干净，舀出清水来呢？只有
把希望寄托在这里活下来的人才能肩负民族的未来活下去。

三 起 事 件

历史上有难以预测的偶然的事。那些希望韩国民主化的年轻人在学日本语。据说，这是为了在受控制的黑暗社会得到正确的消息和情报，接触自由介绍的思想。因此，警察和如今被叫做安全企划部的CIA、保安司令部，一旦逮捕了年轻人，就问他懂不懂日语。如果说懂，就给他贴上从思想上武装起来的确信犯的标签，判他更重的刑。“日本”的这种存在也许有某种历史意义。

当谈到难以预测的历史的时候，脑海里自然浮现出使全斗焕政权变成象今天这样与全体国民对立并脱离国民的政权的许多事件。在抗拒的历史中也有过许多未曾预测的事件。其中，1980年5月发生的光州事件，象不灭的历史一样，一直折磨着全斗焕集团。

12月13日，大邱高等法院终于对金铉奖和文富轼，同第一审一样判了死刑。而对其余的14名则下了比第一审减刑的判决。对于就光州事件提出抗议的这一事件，全斗焕集团当真要执行死刑吗？这恐怕会给年轻人的反美情绪火上加油。目前，在国内也继续进行着号召拯救他们的签名运动。天主教方面正式把审判过程写成文件，互相交换情报。新教徒也和他们采取同一步调。虽然金铉奖同这个事件毫无关系，但是只因为他参与光州事件后，隐藏在天主教会里，就硬把他同这个事件联系起来了。这为的是夸大釜

山事件，对天主教会施加压力。据说，最近在美国也有国会议员和莱舍渥教授等人，在《纽约时报》上提出抗议，说“处刑只能给反美情绪火上加油”。我恳切地希望这种出自良心的呐喊大大传布。

看来，这个事件给全斗焕集团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结果。美国装得挺冷静，但心里却是很惊慌的。因为这不是红党或反美主义者制造的事件，而是由希望更忠于美国本身提出的民主理念、希望韩美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的人们做出的行动。这里援引今年11月29日他们在第二审所作的一部分最终供述。

金铉奖：

在光州事态发生的时候和发生以后，我一直流下了很多眼泪。我为悲哀和苦恼而战栗。我握着监狱的铁窗格子做了祷告。教导所当局看到我的这种行动也感到惊讶。我哭着祷告，想，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我犯的只是托生为人的罪、出生于分割的祖国的罪、爱说正直的话的罪、想要爱护邻居的罪。

如果我想烧毁釜山美国文化院，那就我自己直接去放火。为什么要让年纪小的富弼去呢？请愿书里也写过，如果要杀我和富弼中的一个人，那就杀了我吧。我是独身，但富弼是结了婚的人。我恳切希望饶恕他。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想抛弃生命。在这个审判过程中，我对富弼产生了尊敬之心。他的那个年龄、那个面貌、那个信念使我不能不尊敬他。如果是该受处罚的事件，那么就让我来

负刑。

文富轼：

我要谈谈一件往事。一位受国民尊敬的我国的政治领导者，在5·17事态时被扣上内乱阴谋罪，被判了死刑。那时，我对朋友说：“在这个社会，该有多少人去送命，才能实现民主呢？”朋友说：“如果你和我不怀抱要豁出生命去实现民主的决心，民主是绝对实现不了的。”他说着批判了我对历史性悲剧只感到痛心的那种伤感而消极的态度。从那时起，我一直费尽心思琢磨了支撑不当的当权者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那不是当权者说的漂亮的话或口号。现在国民是不再为那些东西所欺骗的。那不是经济的发展或军事力量，也不是经济力量。我认为，支撑不当的政权的最大的力量是不当的韩美关系，是抛弃了民主并死了心的、不是民众的群众即这个国家的国民。为了这次的放火，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豁出了自己的生命。我豁出自己的生命，对这个民族和世界寄与了期望。

.....

我希望，我的死，成为韩美关系的新的里程碑，成为民族自觉的警钟。我希望美国政府以这次事件为转机，改变把冷战体制强加于弱小国家民众身上的姿势，做真正的友邦，走帮助实现民主，统一民族的道路。所谓友邦是朋友关系，决不是主从关系。日本政府企图取代美国，在亚洲以宗主国自居，沿袭美国的做法。这个事件对此也应该成为一个警钟。我豁出生命，敲响了那个警钟。

.....

上帝在活着。只要上帝不骗人，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决不是因为我们有财产，或强大，而是因为我们站在正义一边和世界史的洪流上，而他们站在和这个洪流对立的立场上。黑夜虽然漫长，但明天是总会到来的。我要低声呼喊，民主万岁，民主万岁，民主万岁。

不得不大大省略美丽的词句。那是盼望着历史的洪流和即将来临的春天，抱着崇高的理念和忘我精神生活的人们的呼声。但现在这一呼声被迫保持沉默，并消逝。

和这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一样，10月12日在光州发生的朴宽贤的死这个事件，也是带来了难以预测的结果的事件。由于这个事件，全斗焕政权怎样对待政治犯的事实暴露出来了。在光州人民欲将爆发的愤怒和政治犯在狱中殊死的绝食斗争面前，全斗焕集团吓坏了。看来，绝食斗争会继续招致死亡。于是，全斗焕集团惊恐万状，破例地采取了接受政治犯的要求的措施。这样把对政治犯的管理从C I A移到了法务部。并不是下了监牢就算掐断了斗争的咽喉。斗争总是监狱内外呼应着开展的。到头来，对朴宽贤的追悼礼拜也不能不允许了。11月10日，光州的基督教联合会举行了追悼礼拜。席上朗读了散文诗形式的长长的追悼文。这里介绍追悼文的一部分：

“宽贤，你在死后说了什么呢。啊，你在说话。已死去的你却活着向我们说话，揭穿了勒紧你喉咙的魔爪的真面目……。你今天象那后脑勺挨卡因的石头流血倒下去的阿

伯尔发出血的号召那样对我们说话。(省略)可是看吧,你的死使我们闭着的眼睛睁开了。你的死使我们的心的重新火热起来了。于是,我们聚集在这里。洗净被耻辱玷污了的手,抱着新的决心聚集在这里了。你曾说过,很想做照耀黑夜的一束星光。我们想着你的这一心情。(省略)每年到了10月,我们将从飞翔的雁群的啼鸣中听到遍体鳞伤的你的灵魂的哭泣声。每年到了10月,那和无等山山谷的红叶一样鲜红的血的呼吁将在我们的心里回荡。你的10月的死,是我们朝着自由民主前进的有力的进行曲。宽贤,我们向你保证,我们继承你未竟之业,一定要在这块土地上打起民主的旗帜。在那天,在胜利的那天,我们将把凝聚着震撼山岳的欢呼声、盖过大海的欢喜的一束菊花献在死后永生的你的灵前。”

这样的决心怎能被践踏?是谁在想阻挡这一历史的洪流?我认为,朴宽贤的死也将创造难以预测的历史。

在这里再举一个元丰毛纺厂工会事件。这个元丰是把企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系统的工厂。跨国公司出售胜利之女神牌球鞋,在澳大利亚等地承包输油管那样的大工程。希望对于这样的跨国公司也施加国际压力。

元丰事件是由于这样的政策发生的:鉴于YH贸易女工的斗争曾成为招致朴正熙政权的崩溃的导火线的事实,只要是稍带自由色彩的工会就立即事先把它毁掉。夏天,美国系统的公司昆特老·泰塔的工会成了镇压对象。而在9月下旬,元丰的工会作为最后一个自由工会遭到了镇压。据11月14日这个工会发表的声明《停止扼杀工人运动的政策》,

抗拒暴力的600名工会会员中有“230多名被警察逮捕，3名被监禁，23名受拘留处分，43名被解雇，13名干部遭受了全国指名稽查”。

被逮走的工会会员受尽了严刑拷打。在她们不在家的时候，遭受了住宅搜查。公司方面要求在工厂里做工的所有的工人在保证绝对服从的文件和没有记上日子的辞职申请书上签字，还要求她们在承认由暴徒组成的自称工会正常化委员会的文件上也签字。拒绝这个要求的450多名工会会员至今不能上班。尽管这样，“言论方面却不搞清楚这种事态的真相，而用惯用的手法，歪曲事实，欺骗国民，报道说，这是由于城市产业传教会系统的工人过激的斗争而引起的事件”。下面继续援引这个声明的一部分：

“这种镇压岂止这些呢。例如：政府发动一切行政力量，动员道知事、市长、郡守、面长、洞长、农业协同组合长、警察署长、便衣警察等去访问那些拒绝在公司要求的不当的文件上签字的工会会员的父母。他们对她们的父母说，你们的女儿受不纯分子的诱惑，沾染了红党思想，要让她们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书。然后拿出盘费，把他们带到汉城来。这样，80多名的工会会员在威逼之下无法再坚持，提出辞职申请书，被解雇了；有150名，由于逼她们回家而不能进行活动了。

“11月3日，曾受20天拘留处分被监禁在南部警察署的10名工会会员因期满获释，但当局为不让她们同别的工会会员见面，干出了卑鄙勾当，天不亮，就把他们用从地方政府机关调来的轿车送到乡村去了。

“政府干出的这种勾当，使我们可以估计到他们从现在开始对我们施加何种程度的镇压。现在也一样，加强对上班的工会会员的监视监督制度，监督上厕所的时间和对话，强硬要求她们过分地提高生产，强迫她们进行11小时的劳动。如果对此表示不满，就说她们还没有丢掉从前的习气，把他们赶出工厂。这种暴力事态，并不是单纯的劳资之间的纠纷或者是与组织有关的纠纷。很明显，这不仅是对自发的工人运动的镇压，而且是为挫折从5·17事件以来一直持续的一切民主化运动而施加的最恶毒的政治镇压。”

元丰的工人们诘问，到底是“为谁的政治，为谁的行政”，并说他们“痛叹生活在常理和法律行不通的镇压的时代”。

她们虽然想到这一斗争会长期继续下去，但表示确信，当这一悲痛的事实被全体国民所知晓的时候，“民主意识将更加提高起来，会使民主早日得到实现”。“憎恨工人的政府，不是民主政府”。这一斗争不是以争取元丰工人的生存而告终的，这一斗争是坚守这个国家所有工人的“自尊心和生存权的途径”。“为正义而遭受的失败，比卑鄙的胜利更可贵”，所以，反对和诅咒“残忍而肮脏的暴力”。声明还提出，“确信，玩刀者因刀而灭亡，同样，暴力由于激起暴力，并重复这种恶性循环，必将灭亡”。甚至说：“我们不以暴力对付的理由就在这里。”

在工人中间产生了高尚的道德。他们号召没有暴力情况下的工会的正常化，要求新闻出版机关停止不调查真相，

就诽谤工人，复诵政府的宣传的不当的行为。并向国内外号召，要“开展不买跨国公司生产的一切商品的运动”。这样，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化，并且它将担负争取民主运动的重要一面。然而，对于这种斗争，国际性的工人运动为什么不加注视呢？工会在12月4日发表的声明《我们决不能屈服于残忍的暴力》，更强烈地号召，要展开不买跨国公司生产的商品的运动。据说跨国公司的商品是厚质西服料、王子牌皮鞋、高性能收音机、龟牌厨房冲洗器等。

我想工人不会屈服于暴力的践踏的。最残忍、最不道德的分子把“实现民主幸福、正义社会”的横幅标语挂在街上，在这一招牌下镇压有良心的、最爱国的人们并夺去他们的生命。只要这种事态持续，他们越遭受暴力践踏，就将越切齿痛恨，豁出生命去进行斗争。事实上，工人的不满在这种镇压下显得更隐蔽，成为不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的巨大的政治问题。

对此，全斗焕集团能够做的只是象在元丰事件中搞的一样，更加加强暴力镇压。事先除掉抗拒的苗头，这只能使事态变得更加尖锐。这又是在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分明成为巨大的不安的因素。

金大中的“获释”

近来天气寒冷，身体也觉得有点不舒服。本想这次以元丰事件的消息结束报告，但今天早晨听到了“金大中迁到

汉城大学医院”的报道。今天，雪不住地下着。金大中获释，这场雪也是隔了好久才见到的瑞雪呀！今天的晚报在第一版上大加报道说：“允许金大中赴美就医”，“早则，就在下一周……，按照家属的希望”，“今早迁到汉城大学医院”。并写道：“慎重研讨与金大中事件和光州事件有关的人同其他人一起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所以采取这种措施，“并不是因为病情严重，而是根据人道主义措施，要实现第五共和国的大团结的意志决定的”，“又是清算旧时代……政治自信感”的表现。文章里写道，“这次的措施是完全没有受外国的影响的”，“特别是全斗焕抱着新的政治决心，下人道主义的决策”所采取的，但这决不是“忽视法律的执行的”。

当然，这种官方报道决不会说实话。全斗焕集团，特别是在全斗焕背后的非官方的军人权势层怎么会下这样的决心呢？

全斗焕集团可能在想，如果明春发生规模巨大的民众的抵抗，就不忌制造第二光州事件。但只是这件事，美国是想要避免的。为此，这些日子里，美国国务院要员们到过韩国。据说舒尔茨国务卿也即将来访。这是预告里根总统访问韩国的。所以，要事先采取某种措施。加上，为了引进外债，有必要扭转一下对政策的印象。这与其说是全斗焕统治的自信心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危机的表现。如果全斗焕和美国对民众的抵抗和反对，特别是对明年春天的危机不感到不安，就不会采取这种措施的。这是韩美联合作战之一。

他们没有长远的前景。他们是想无论如何要避免明春

的危机。在这一点上，韩美的见解是一致的。全斗焕集团的政权极度削弱了。为这件事，在军部内发生了甚至使一个将领送死的抗争。可能因为这件事，在圣诞节前发表了金大中和政治犯的释放日程。可能认为这将暂时消除军部内的不安。

据说，在光州，一种节日气氛在萌动。可是在民主化运动者中间为过早地采取措施而流露着惊慌的神色。由于这一措施，今后会有很多人获释，但是与1974年所谓民青学联事件有关的8名人民革命党关系者也许留在监狱里。并且对这次与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有关的人的残酷的待遇也将持续下去。由于南朝鲜民族解放战线事件而服重刑的很多人也将留在监狱里。我认为，这次的措施一定是为收到政治效果而采取的有选择的措施。

还有一件本月8日公布的“逮捕在高等学校里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12名教员和某广播电台广播科长等13名”的事件。据警察方面公布的材料，他们是以全罗北道群山市为中心，“听北方的广播，读不法书籍”，决心“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国家，坚决斗争”的小集团。但是，据可靠的消息，这个事件的真相与此截然不同。他们只是直到现在藏匿并帮助了由于光州事件等而逃避的地下小组。而且让其中的一个人亡命到美国去了。结果他们被贴上了以共产革命为目的的小集团的标签。

这种政治犯以后会怎样呢？不能得到外部压力帮助的无名的人们，会不会被诬为企图搞共产革命的红党被判极刑或重刑呢？因为在那种压力下释放了政治犯，所以今后

要把一切抗拒都捏造成共产主义事件，更加狠狠地整治。

释放金大中的真相与报纸报道的内容不同，可能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上周礼拜六，11日，C I A去找金大中夫人，嘱咐她要劝金大中到美国去，说，应该想到全斗焕政权今后至少持续5年，军部里有许多人企图夺去金大中的生命，因此要劝金大中去美国。其实，那天夜里，金大中已经转到汉城大学医院去了。那时候，他的头剃成光头了。因为他还不是获释的人，所以除了夫人以外，谁也不能接近他。他既不能回家，也不能见见亲戚和朋友，就要出国了。这是指定了起程日期的出国。并对她说，如果他不出国，就会很难采取对其他人的圣诞节特赦措施。

起初，金大中拒绝去美国。并说，要在释放与光州事件有关的政治犯等所有政治犯的条件下释放他。金大中又深怕他的出国赴美，成为半永久性的政治亡命。那特别是因为他们一直怂恿他的全家人出国。这是驱逐国外的，也可以说是根据国际性的阴谋搞的又一次绑架。他还担心，他的出国是不是会使国内的抵抗者们灰心失望？可是，无论是汉城人还是光州人，几乎一致地都劝他到美国去，说最要紧的是他的安全。就是说，首先要接受现在的条件，在这基础上再研究以后的问题。

但是，不禁使人抱有很大的疑惑，在使他出国的时候，政府会不会把他的家属中的一部分人扣留起来做人质呢？

总之，这可以说是美国和全斗焕集团为避免明春的危机而编出的一场最大的把戏。而且他们可能分析各种因素，认为现在正是必要的时期。事实上，等到明年3月释放他，

就会火上加油，使以学生为中心高昂的抵抗的火焰越烧越旺。于是他们就在此刻事先动手了。他们直到昨天还说他是共产主义者，而今天却在报纸上大加报道说，他决定到美国去。对这种手法，国民该怎样对待才好呢？在糊里糊涂的气氛中将对政治抱更大的不信任，这是不会错的。而且被解释为这是全斗焕集团的失败。

.....

最底层的思想

1983年1月18日讯

死亡之城

去年年底，12月14日下午，因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而受审判的16人中有12名向大法院上诉了。被指名为主犯的文富弼和被他们牵强附会地牵连于这个事件的金铉奖被判为死刑。难道要处决他们吗？全斗焕政权要干这种勾当吗？美国要对此默许吗？这样做的话，要以金大中的释放等来安抚民心的努力不就会化为泡影吗？今春会再次刮起以大学为中心的反美风暴。这正是全斗焕集团和美国伤脑筋的事。

另一方面又担心，斗争着的人们会从金大中的释放开始一直持续的全斗焕政权的所谓“让步”中得到信心。事实上，在斗争着的人们当中萌动着一种节日气氛。不得不在一夜之间释放判了无期徒刑、20年徒刑等重刑的政治犯，这不说明那独裁政治的力量太软弱吗？这是说这个政权遭到民众的反对开始倒退了。

1月18日，全斗焕不得不用国政讲话的形式说：“在今

年内对一批政治上被限制的人解除限制。”这就是说，对557名的所谓老政治家分阶段允许搞政治活动。明年有国会议员选举。为避免那时的麻烦，企图以此缓和一下空气。但是，这里当然附带着“有显著改悔”这样的条件。这指的是能够协助他们的统治的人。但不管这些老政治家怎样出面，对全斗焕集团来说，他们总是象炸药一样的，而且根据时局的变动，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争取他们。这不是象全斗焕集团所说的那样因为政局已安定下来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们日暮途穷，为苟延残喘而施展的伎俩。所以他们甚至还说出了什么地方自治之类的话。

去年圣诞节前夕获释的47名政治犯并没有保持沉默。无论是12月30日在汉城的基督教会馆举行的欢迎会还是1月17日在光州举行的欢迎会，都搞得很隆重。在那喜庆气氛里，孕育着全斗焕政权开始后退了这样的确信。谁也不能粉碎这一民众的反对、无言的抵抗，不能阻挡爆发出来的民众的批判和非难的呼声。没有人愿意听政府的宣传。所以，1月17日在光州的一次集会上，文益焕牧师理直气壮地说：

“……只要外国势力不干涉，这个国家就能走上民主的道路。在韩国，未曾有过在不走民主之路，与历史背道而驰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例子。李承晚也罢，朴正熙也罢，都垮台了。1960年，国民为反对官方组织的舞弊选举而进行了斗争，行使了权利。因为不仅企图搞非法的投票，甚至企图搞非法开票，所以民众的愤怒就爆发了。结果，民众获得了4·19的胜利。

“这个国家的国民选择了民主之路，而且能够把它培植起来。他们拒绝走其他的路。如果反对民主，那只有灭亡。”

全斗焕集团的军部只有两条路，要么后退，走向民主体制，要么继续动用反民主的暴力自取灭亡。在这两者之中，他们现在要搞的是，表面上无可奈何地后退，实际上加强暴力统治。举例说，为此，他们把奸细安插在所有的教会里，使他们把礼拜日说教内容在当天下午两点以前报告。他们去年年底释放47人以后，对剩下的政治犯进一步加强了镇压。这只能认为，他们怕狱中斗争，释放领导者来削弱了其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把政治犯转移到别的监狱去的作为也和这有关系。这为的是要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狱中抵抗组织。同时，转变思想工作组的的活动更活跃起来了。因为大体上都是犯了国家保安法或反共法的，所以强迫他们转变思想。如有表示反对的，就以禁止探监、殴打等来进行报复。所谓转变思想，指的不是背叛共产主义，而是立誓为全斗焕集团尽忠，服从其情报机关的指示。在去年10月朴宽贤死于狱中，发生与此有关的狱中斗争之后，当局约定改善待遇，把对政治犯的监督从安全企划部（前身为中央情报部）移交到法务部，但看来现在已经回复原样了。现在监狱里依然有383名政治犯。在年底采取释放措施后仍在增加。获释的人也遭到盯梢和监视。

对工人的监视比对大学的监视更严密。对于元丰毛纺厂工会的斗争，政府编了1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断定这是不纯分子的阴谋活动。因此，至今未能回公司复职的200名工人终于宣布了解散。现在有8名依然被监禁在狱中。200

名工人因失去了自力维持生计的道路，不得不宣布解散，回到乡村。劳动厅本身违背法律，向各公司发去了这些工人的黑名单。这些工人心怀深仇大恨，坚决不屈服，回到了乡村，但他们往后到底会怎样呢？他们大多数是女工。她们说，因为元丰毛纺厂的本社——外国公司搞建筑业之类，越来越把手伸向世界各地，希望对此加以注视和进行批评，并希望帮助她们重新回原厂工作。

12月初旬，在全罗北道群山地区有8名教员和1名广播电台成员被说成是和北方采取一致步调的小组，被逮捕并起诉了。这个事件也说明，全斗焕政权的暴力是什么样的货色。这是组织了叫做五松会的读书会的人们的事件。基督教方面的人们听到与这个事件有关的人们正遭受严刑拷打的消息，就到群山去了。但是家属们甚至回避同这些人会面。当局还不允许家属同被监禁的人们会面。其中只有1个人被允许同家属会面。他遭受拷打，弄得身体晃晃摇摇，眼睛象死人一样灰蒙蒙。那些不允许会面的人们情况不是更悲惨吗？但是他们不能请象样的律师。给每个人请一个律师，每人就得拿出200万圆。不久后，要求每个人再拿出100万圆，说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受到不起诉处分。但实际上他们都被起诉了。

遭受这种痛苦的人，并不只是那些正义感特别强的有良心的人。可以说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痛苦集中表现在他们身上了。简直是凄惨的人生。如有人说，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死亡，汉城是死亡之城，人人都表示同意。因此，这样的呐喊从基督教教会讲台不时地传出来。这次刚获释

的文益焕牧师向着这种时代唱了他在狱中作的赞美歌《爱》。

不胜感激的爱哟，涌出来吧，
涨裂我们的心胸溢出来吧。
群鸟哟，欢快地歌唱吧，
我要用眼泪湿润干涸的这个国度。

火热的爱哟，涌出来吧，
烧毁褴褛破败的人生吧，
风啊，刮起来吧，
我要翩翩翱翔，使冰凌溶化。

爱是不胜感激的，爱是火热的。
刺骨的痛苦，沾满血迹的爱哟，
你遍体鳞伤，粉身碎骨，
用鲜血染红了这个国家的爱哟。

这座死亡之城能够复生吗？显然那个带来了死亡的军部的力量和他们信口叫嚷的“创造先进祖国”之类的法西斯口号，是不能使它复生的。

充满忧虑和希望的对话

12月20日公布“总统秘书室的许和平政务第一首席秘书官和许三守司正首席秘书官被撤职了。据说，这两个人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七届毕业生，特别是许和平辅佐全斗焕，一直在情报部门工作，掌握了比全斗焕更大的实权，可是他为什么被撤职了呢？

对这个问题，在汉城大街小巷传开各种风闻。据说，那是因为现在全斗焕已经有了能够支配更年轻的军官的实力。又说，那是因为在杀害第二军司令以后，对这一伙有更大的反感。于是那些受第十一届毕业生和第十二届毕业生支援的第十六届毕业生就对更强硬的第十七届毕业生进行了挑战。因而现在由第十二届毕业生掌握了实权。据发表，许和平的后任是第十六届毕业生郑顺德。过去在军部里，对于大校级军官顶撞前辈将领的现象，有很大的不满，这是事实。但全斗焕是在他们的支援下掌握了权力的，所以不能强硬地对待他们。

据另一条风闻，这又是美国方面的干涉。美国方面用警戒的目光注视了许和平等的法西斯排外主义……，所以美国方面坚决要求除掉他们。

可以说是不安的体制吧，全斗焕集团的军部和美国方面的不安是无法消除的。他们在全体国民的抗拒面前，陷于不可捉摸的不安之中，怕得发抖。他们虽然拥有实力，

但不能无视这个抗拒。

使国民抱恐惧心理，以使他们怕得不敢接近他们。把国民视为敌人。有人说，这应该说是来自全斗焕集团曾担任朴正熙的警护的经验的所谓警护室心理。全斗焕的目标充其量也不过是当陆军参谋次长。但是在朴正熙死后，他得到从保安司令降职到东海地区司令的情报，便发动了军事政变。由于这种事，国民对他的政权的正统性产生怀疑，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挑战。斗争着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要遭到全斗焕集团的袭击，陷于不安之中。韩国的政治可以说是这种相对的不安所造成的反常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看来由于人生的不安使人们的精神更加深刻了。和稳定的社会不同，在建立文明方面可能会落后，但是曾被捕入狱的人们精神深度，实在令人感动。有一天，几个人和这些人一起谈了话。下面介绍他们的谈话。

A：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是革命的出发点。通过这个事情，知道了军部的性质是什么，操纵军部的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正是和俗语说的一样，使人生病，而后又给药。把国民赶进无法忍受的状态，又唆使他们进行抵抗，然后镇压叛乱，并且说为保障安定，才掌握政治权力。对于国民，也总是先挑逗起来，然后发动先制攻击。用这种毒辣手法给许多国民带来恐惧心理，使他们后退。怎样摆脱这种毒辣的手法呢？这是为反对它而进行的良心和理性的斗争。尤其这是反对这一新殖民主义时代的斗争。大国的支配正在促进小国的法西斯化。我们对这种世界史性状况

进行抵抗。对这种时代的抵抗是首先从大国的周围开始的。这样，大国感到难以忍受的不安。我们应该一面战斗，一面为了未来，把这样战斗的人们、阶层和民族的历史证言记下来。

B： 是的。我们的斗争是同世界反动派的斗争。如不发生整体的变革，也许我们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现在能不能胜利。为了将来取得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将这样痛苦地生活直到死去。对此，我不仅不感到悔恨，反而感到骄傲。我已经做好精神准备，无论何时，视死如归。但是，直到那天，我要注意健康，有意义地度过可贵的一天一日。

C： 是的，不屈的意志是有的，应该说那是民众的意志。这个国家的国民有这样高尚而火热的精神，但是他们企图使这一精神变得颓废。他们是横行霸道的歹徒，是流氓集团。他们所以能够活下去，是因为国际上的政治权力流氓化了。据说，日本的中曾根总理来访的时候，甚至拿水瓢打着拍子对歌作乐。报纸对此只字没提。他们嘴上叫嚷着反日、克日，却这样狼狈为奸。这里的报纸被禁止报道，但看来日本报道了。在中曾根访美前夕，对他们来说这样勾结是必要的。这样用40亿美元的援助从美国购买武器，输入原子反应堆。所以，里根支持全斗焕。在这种情况下，韩国连成为日本的援助对象的企业组织的名单也没法提出来。这种风闻正在流传着。美国是这样掠夺韩国的。

D： 卡特和里根都同样支持了全斗焕集团。这次使金大中获释赴美的事实也如实地暴露了美国狡猾的手法。在

这里也玩弄了使人生病而后又给药的手法。

他们再不可能在汉城重演象光州事件那样的事件。但是看来今春将造成爆发性的危机。反美气势越来越高涨。因此他们有必要装出改变政策的样子。我认为这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恶毒面目的凶恶阴谋。但是迫使他们做到装装样子的程度的是这个国家国民的抵抗。如果金大中不在，军部的统治就能够强迫民间方面协助。他们这次在搞政治上解除限制的同时也许会把金泳三拉出来。总之，不管国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金大中还是最好暂且休息一会儿。直到现在，当权者说什么金大中同共产主义有关系，从而造成了他过激的印象。在军队里也对所有的军人，从陆军少尉到将领进行了那样的宣传，使他们信以为真。因此，在有良心的军人中也有不少的人认为金大中是很难执政的。这次可能是消除那种过激的印象的好机会。因为工人当中也有人认为金大中是容共的人。

E：美国要求所谓自由世界国家的团结。日本也希望同韩国的协助和合作，而我们盼望南北的统一。连全斗焕集团都在嘴上叫嚷国民的团结。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们都在希望协助、团结和统一。也就是说集体意识提高了。但是，他们都企图以自己为中心用暴力来实现。这么说，这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是同样的东西。这不是出自国民中间、亚洲各民族中间的。贯穿它的理念是根本没有的。现今是只有暴力横行的时代。他们不可能正确地利用这个民族强大的力量，也不可能利用金大中那样的人在国内外具有的影响力。应该把事实告诉国民，要求他们协助，

搞好团结，可是他们不能那样做。在南北对立方面，情况也一样。从这种时代性质来看，金大中这样的人也许是过于异质的存在，是与这个暴力时代不相称的。

A：我这次到光州去，抱着巡礼者的心情，巡视了在那残忍的日子里发生的事件留下的痕迹。光州市民的士气很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对民主的热切希望波及得又深又广。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军部独裁是反国民的。现在看到军部的力量，可能会感到绝望。但是这个国家国民的热情必将粉碎这个力量。也许是因为那天下了雪，使人觉得格外感慨无量。

C：既然美国不承认这种事态，反美情绪就不能不越发扩展开去。现在美国帮助军部独裁，妨碍我们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所以不能不倾向反美。过去，朴正熙建立了连小学的班长也加以任命的任命制，企图扼杀民主，但失败了。因此，全斗焕集团就叫嚷民主。但实际上他们搞的政治却与民主格格不入。国民对此来个回击，说别扯弥天大谎了。于是近来在传播将修改选举法啦、修改宪法啦等的风闻。这不过是要使国民多少对他们寄予一点期待，幸免危机的阴谋活动而已。

D：年底采取的金大中的释放和赴美措施，使一般国民确实很激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金大中的尊敬和同情。曾不加尊称，只叫金大中的名字的报纸也从12月24日起写了“金大中氏出国”。据说，这是因为“停止行刑”的缘故。直到现在，报纸对于政治犯未曾只叫过名字。不管怎样，一般国民可以把金大中提到话题上来了。但是，他出国以后的

消息一点也没有报道。对于金大中的出国问题，不知韩日美之间有过什么交易，但因为金大中不去日本，日本方面可能放下了心。全斗焕可能想，由于金大中去美国，而没有去日本，所以总算保持了自己的面子。美国虽然支撑全斗焕，但可能认为，通过这件事冲淡了一下反美情绪，把韩国从政治危机中拯救出来了。首先，美国可以装出不容忍独裁的样子了。

然而，我认为，这反倒使许多人认识到韩国完全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再说，中曾根来了，韩日美的体制建立起来了，这不就是和1905年的桂—塔佛特密约一样的吗？在这样的体制下，韩国将被委托给日本。能用什么法子从这一桎梏中摆脱出来呢？

E：我国每年不得不进口60亿美元的石油和30亿美元的粮食。甚至可以说，来自公害和产业灾害的祸害多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利益。贸易上的利益只有5%。尤其是，出口的东西在海外的分社积压40%。开设信用状，这不过是为得到80%的财政支援而做的安排。这是如不几会属于美国和日本的支配就连气都不能喘的经济。美国完全掌握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国家生存的所有命脉。所以，美国认为需要有得不到国民的支持的全斗焕集团的军部统治。

11月，派兵黎巴嫩的问题被提了出来。1965年朴正熙缔结韩日条约后，派兵越南，才受到美国的支持，得以苟延残喘。因此全斗焕也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朴正熙于1969年搞三次修改宪法，三次连任继续掌握了政权。派兵黎巴嫩，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也可以预料到，在国际上

最弱的韩国军首先会遭到巴勒斯坦游击队或叙利亚军的攻击。这样的话，在韩国，反全斗焕政权、反美气势就会更加高涨起来。于是，安全企划部(前身为中央情报部)命令各政党说，就派兵黎巴嫩问题不要表示赞成，也不要表示反对。看来他们最后决定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全斗焕集团就是这样随着美国的情绪行事的。

B：对政府的宣传，谁也不相信。可以说，金大中的释放给许多人带来了一种信心。因为在韩国他是民主的最大象征。这次他获释后受到了空前多的人的欢迎。我想这是与过去大有不同的。政府可能知道这件事，加强镇压。他们将会继续维持极端的军事统治，而我们将以示威来提出抗议或者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很明显，如果只想用统治的手法来扭转这种状态，就会引起更大的事件。

必须实行结构改革。必须修改规定99%的国民不能选举总统的政党法和选举法，必须保障能够支援它的言论自由。必须实现农协和工会的自由化。如果不这样缓一缓，就会形成两极极端的对立，发生爆炸。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面动用政治活动净化法来束缚政治家的活动，监禁许多政治犯，驱逐许多教师和学生，一面大加宣扬民主，这可太厚颜无耻了。全斗焕在年初演说中说，要使工厂家庭化。这是多么脱离现实的话呀。如果厂主死了，工厂就属于将成为其儿子的工人的吗？如果不承认工人应有的权利，那就只能招致破产。全斗焕一派的当权者害怕国民的力量，有时作让步，有时突然动用暴力，反复地搞无原则的行动，走向灭亡，这是没错的。韩国工人的良心和力量是了不

起的。在那引起社会舆论的元丰毛纺厂开始破产的时候，也是工人们把它重振起来的。但是，这回企业主却叫嚷说要打倒工人。在许多地方反复地出现这样有碍生产的现象。

这种充满忧虑的对话没有个完。依我看，虽然路在旁边，却不想去看它。看来，由于私欲和没有理性，眼睛给蒙昏了。谁能使他们睁开眼睛呢？必须有从中调节的人。基督教教会太无能，起不了这种作用。那也是因为作了没有理性的私欲的俘虏的吗？不，即使他们那样的人想做从中调节的势力，当权者也会把他们诬为反体制派的。他们原来不过是体制内的批判者，但与他们的意图相反，被诬为反体制派。

必须终结怨恨，开辟历史的新篇章。应该把为这个历史竭尽全力当做骄傲。必须在韩国终止特权型统治，为此，必须要求民主和平，缓和南北之间的紧张局面。这样做，也符合韩国周围的大国的利益。对于从中调节的道路，一个人说是“玄妙之道”，另一个人说，这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和睦”。这是出自韩国的民主化斗争、狱中的痛苦的想法。这也许是从死亡之城诞生的生命的智慧。这个进行对话的夜晚实际上是充满希望的时辰。

悲 怆 的 岁 月

1983年2月15日讯

落 地 的 谷 穗

我反对现实，
可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草棵，
现实残忍，冷酷，痛如切肤，使得众人你离我散，
所以我在叹息，
椎心泣血向大地倾诉悲苦。

这是从22岁的青年工人金钟泰的遗稿《我的一辈子，我的20年》中引用的。他在1980年6月9日，以焚身自杀来就光州事件提出抗议，于6月14日咽气。

他在贫困中，参加中学毕业甄别考试及格，他什么事都做过，也卖过零工。在那样的生活中，还印发了称做《集会》的印刷品，还为贫民村的孩子们办过夜校。在这过程中，他体验了险恶、冷酷、残忍的现实。1980年5月，他听到光州大屠杀消息，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他留下呼吁书《该怎么对付这个黑暗？》、《抚慰光州市民和学生的魂灵》，离

开了这个人世。去年6月，迎接他去世3周年，基督教青年们发刊了他的文集《工人金钟泰永垂不朽》。我弄到了这本书。

的确，人们受着极端的贫穷和悲哀的折磨。只从最近政府的计划院发表的以1980年为基准的统计，也可以充分地看出这种情况。据这个政府的统计，每户平均月收入不到25万圆的占总人口的65.9%，不到13万圆的穷户占29%。对这种现实采取了象对元丰毛纺厂的工会会员采取的如下的措施。

对13名工会干部下了全国稽查令。以稽查干部为借口，非法地闯进自己做饭吃的工人的房间，进行搜查、没收、逮走。在警察署，破口大骂，殴打，并强迫她们跪坐在水泥地上，用脚踢她们的脸说：“不照实说，就要把你拖到地下室去剥光衣服，摔打”、“被赤化的娘儿们要当做红党对待”、“不想到公司上工，就到酒馆去吧”，等等。他们这样用不堪入耳的话来进行威胁并蹂躏人权。

就这样，工会被破坏了。仍有8个人坐牢，出庭受审。但是对工会会员施加暴行的公司的恶汉，没有一个受责难，都健在。200名工会会员被放逐到乡村去了，但她们怀着烈火般的决心：“我们决不能屈服于残忍的暴力。”这表明了生活在不得不走向死路的这种现实的她们的意志。

关于全罗北道群山的“五松会事件”我已经介绍过。据说，这个五松会，其实是五星会，是警察当局用字音相似的汉字改换的。五星会原是全罗北道里里的名门、南星高等学校出身的人们的会。尽管是这样，当局却把它当成了

听取北方的广播，唱北方的歌，看非法书籍，做不稳思想宣传的五松会。可是，他们怎么施加拷问，也捏造不出事件来。要说有问题，那就是在1980年光州事件发生当时，帮助那时最主要的人物、现已亡命美国的年轻人躲藏了一时。据观察，这个事件需要从头开始重新进行搜查。至今的搜查材料要付之乌有。原因是，群山地方的关联者以及学校、教会都为这个事件大惊失色，提出了抗议。

虽说去年12月有48名政治犯获释，但监狱里的政治犯不断增加，现已将近400名。那是因为去年秋天，由于各大学举行示威游行，有很多学生被捕了。由于内外的压力，释放了与光州事件和金大中事件有关的人，但特别是学生政治犯，他们根本不想释放。有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就这一系列情况说道：

“情报部的一伙也说过，现在他们最怕的还是学生。即使在汉城再一次发生大规模的抵抗，他们也不能再象在光州事件时那样加以镇压。

“1月25日长老派教会召开青年大会的时候有1,200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在大邱开了3天，会上聘请坐过牢的人们以民族、民众、统一等为题目做演讲，会场充满狂热气氛。最后，大会真挚地讨论了是否进行街头示威的问题。多数人的意见是，举行示威，时机尚早。大会秩序井然。若是过去，这样的会要在机动警察队的包围中举行，因此，年轻人都很激愤。但这次没有那种事。当局也不想去刺激年轻人。他们认为不能一味用高压手段，就做了暂时的后退。

“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松弛下来。并不是因为有去年的圣

诞节特赦、金大中的获释和赴美就镇静下来的。因此，当局针对着春天，保持着紧张状态，他们不知道年轻人将怎样行动。所以，情报部的一伙也说，不能释放学生政治犯，不允许被撵走的教师复职的原因是，如果解除了这一切，学生们就会陶醉于胜利，不知要干出什么事来。

“全斗焕政权不受国民的欢迎，又碰上学生的抵抗，将如何收拾这种局面？为此，现在，多少要缓和一下紧张局面。但是，如果用这种办法也搞得不好，会不会再次发生大的冲突？是不是在国民的压力下要逐渐采取开放之策，还是继续推行强硬政策，最后象朴正熙政权那样自取灭亡？也许可以说，在这苦恼之中，韩国政治史倒有它的妙处的吧。”

在朴正熙临死之前被捕的78名所谓“南朝鲜民族解放战线事件”有关者当中，33名仍然在狱中。据说在这期间有1人病死在狱中，猜测有两名被处刑。现今有无期徒刑10人，15年徒刑8人，10年徒刑4人等，遭受重刑的折磨。据说，他们具有激进的思想，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出什么行动。可以说，他们之中大多数采取绝望的态度，认为只要国土被分割为南北的情况持续下去，军部独裁下的韩国的政治现状就不可能有所改变。因为他们是希望争取能够实行有良心的政治的那种民主的。尽管如此，却不分皂白地指控他们支持了共产主义革命，这怎么行呢？他们的家属这样诉说，可是至今，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这样的思想动向，并不是只有这个事件的有关者才有的。这也许是冰山的一角。汉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道：

“汉城大学这次又有1,111名受惩戒处分。其中，197名

为开除处分。这就是所谓强制脱落措施。比定额多招收30%，然后把一部分挑出来除掉。他们用这种办法，把学生束缚在书桌上，使他们不能去想或图谋当局所说的‘不纯的事’。在这样的镇压下，学校颓废得简直不可言状。然而文教部强迫大学执行这种政策。结果，这回用教务惩戒的名义，继续进行放逐和处分。表面上说这是因为成绩不好，但事实上，‘思想动向有一点点不对头’就列入这一类。对此，既不能抱不平，也无处去诉怨。

“由于这种情况，有良心的年轻人感到痛苦。他们对这个社会，完全失去了希望。尽管如此，如不能背离这个社会，就只好逆来顺受，自己也颓废下去，不然，就不得不在绝望中进行抵抗。学生们这样遭受被放逐的辛酸遭遇，但他们中间还出现过激的倾向，这是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那甚至带有悲壮气氛。

“不知从哪里流进来的，他们读着很多从日文本翻译出来的激进的书籍，并活跃地展开讨论。其中，可能有从在日本的机关送进来的北方系统的书籍。他们甚至单纯地、有时不加批判地读那些书。我深怕为这件事又遭到镇压，付出许多牺牲，总感到忐忑不安。这是被封锁的社会的悲剧。加上，又有在外部的政治走狗机关在暗地里进行活动。可是，我们的教员没法插手。当然，不能进行讨论。实在令人寒心和懊丧。”

政 治 把 戏

在全斗焕体制下的所谓两三个在野党按预定计划，一月末召开所谓地区党改组大会，2月初结束了全党大会。因为听说要释放因政治活动禁令而被束缚的人们，所以要事先打好自己的地盘。2月9日召开的所谓院内第二党——民韩党的全党大会也平安无事地结束了。全场一致地再度选举了现总裁柳致松。据说，那个大会只有鼓掌声，几乎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只是总裁一个人在那里夸夸其谈。各报对在军部统治下过于太平稳当地进行的这个大会，也感到惊讶。尽管如此，嘴上却在喊民主，说为“改善选举制度”，为“民主行政”、“言论自由”而斗争，国民对这种政治把戏只能感到厌恶。

看来搞政治的他们度过这苦难的时代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的。取得国际贷款的事日益困难了，其条件也在不断恶化。报纸也指出，从外汇银行勉强取得了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但其中一部分的利息暴涨到11.2%。这种贷款，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在它的压力下，不要说发展，就是每天的日子会怎样呢？全斗焕政权实行比朴正熙政权更糟糕的镇压和腐败的政治，究竟要把这种局面拖到什么时候呢？最近，各报也在点点滴滴地表示对国家总破产危机的忧虑。为掩饰这种危机的政治把戏搞得很活跃，如果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操纵国民的心理，那未免太天真了。难

道不搞那种把戏，就不安得呆不住吗？

因此，最近官方组织了所谓响应政府的降低物价政策的运动，即13个制药公司向保健社会部报告，决定把80种药品的价格降低2.1%~25%；下达将出租汽车费降低9.1%的命令之类的突击运动。难道认为用总统的一道命令就随随便便地抬高或降低物价的就是政治和经济吗？这是只要下命令就行的简单的想法。虽然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但日常生活却日益艰难。在政府说的话和报上写的东西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下，民心越来越离得老远。

因此，又摆出了关于地方自治的问题。唆使执政党和在野党向国会提出地方自治会问题。然而，现在如果挂起地方自治的招牌来举行选举的话，或许在农村和小城镇，能用各种镇压手法任意进行捏造，但在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全斗焕匪帮必然遭到惨败，这是明若观火的事。所以，最近正如人们所说的，气得人们握拳发抖。据说，他们在研究这样的方案：装出向往民主的样子，尽可能拖延时间，当真地要采取措施的时候，就让步到市长要任命，市会议员要选举的地步。不仅这样，他们还在研讨和朴正熙政权时的维新国会一样，地方自治制的议员的三分之一由中央任命的方案。

由于国民的压力，可能要做出很大的让步，但在这过程中，不断地搞出延长政权之命的鬼把戏。尽管如此，即使继续搞周期性的镇压，也无法把这个国家的国民弄得完全沉默不语。因为不但有反对它的国民的抵抗，而且要这样做的政权太不得人心，太腐败。再说，要把它付诸实现

的官僚阶层太无能，太腐败，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如果统治者不受国民的欢迎的话，官吏对统治者的忠诚也是会减退的。

还有一个他们为苟延残喘而策划的重要问题。如果全斗焕按照他的诺言行事，就应该在1988年结束7年的任期，下台。但他当然没有那种想法。所以，现在他在偷偷地研究“统一宪法”。意思是包括南北的宪法。制定出这个东西后，将向北方提出这个东西。北方当然拒不接受。那么，他们就说，不得不只在南方根据统一宪法举行选举来选出南北统一的总统，然后再度选举全斗焕。这样，他就会成为依据统一宪法选出的第一个总统，而不是再度当选。他们就是要搞这样的骗人诡计。为了搞这种政治阴谋，全斗焕政权虽然明知是毫无效果的提案，但比过去更加卖力地接连呼吁南北对话或交流等等。

他们一面加强反共浪潮和反统一政策，一面更嚣张地、更频繁地发出这种呼吁。

2月1日还叫统一院长官向北方发出呼吁：要早日召开“南北韩当局及政党、社会团体代表会议”。那是要在3月间进行工作级预备会谈的显得非常急躁的提案。然而，这是他们从2月1日开始进行一直到4月中旬的所谓“协作精神”的韩美大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发出的。他们长期搞这种大演习是，为了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春季把军队束缚起来。有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告诉我说，明明知道北方对这种提案不会表示同意，却这样反复地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发言。这都是按照全斗焕政权的政治计划搞的。

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政治把戏而已。某一天的报纸第一版上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政治矛盾。报纸上并排地登出了两篇互相矛盾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写道：《全斗焕指示要节约 3 亿美元的原油》，另一篇的标题写道：《商工部报告民用小型汽车研究两年，200 万圆的农村万能车年内推广》。报上写道，农村和城市的中产阶层比预计提早迎接了使用自用车时代。难道能有一面推广自用车，一面节约原油的妙策吗？报纸可能是把这两个大标题并排登出来，悄悄尝试了抵抗。

最近，全斗焕政权对民主化运动者改变了手法，用各种方法去接近。他们说，因为有日美的支援，全斗焕政权如今可以放心了。因为有了自信，打算缓和一下政策。在政权内部军部的强硬派后退了，你们不来支援鸽派，军部的强硬派就会重新抬起头来。所以，千万不要再惹是生非，而要协助。又说，青瓦台的两名有权势的秘书官给撵出去了。这就是鸽派得到加强的证据。这次出狱的一位年轻人对这个问题评论道：

“我想没有必要固执说，不是那样。希望只回答说，将注视形势发展。首先，他们一点也没有放松拷问。如果有人憎恨某人，说要揍他，打倒他，大家就一齐动手，把他弄得半死不活。政府的各部在各自为政。这个政权完全失去了控制力。不管怎么逞强，各机构都不听使唤。我们只能注视着。没有人能够阻挡国民的思想意识的变化。这一洪流的变化将决定历史。我们只是在做出忘我的、先驱的努力。南北问题也一样，只由当权者他们是无法解除被分

裂的民族痛苦的。民众总有一天不容忍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无力的民众将怀着同样的心情遭受痛苦。他们将越发把对主张统一的镇压看做是毫无道理的。我总想，由民众实现统一或和解的日子必将到来。他们只会以不信任的眼光去看统治集团。无力的国民将对政治施加压力，统治集团将不能为所欲为。不仅一定要求南北之间的和解，而且还一定要求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解。镇压将成为不允许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民主化和统一问题是列在同一个历史潮流上的。”

也许这是过于浪漫的见解。但是，应该说，没有这样的遐想是不能进行斗争的。然而，另一方面，现实很严峻。1月28日，报纸上报道，前青瓦台政务第一首席秘书官许和平应美国赫里迪基财团的邀请，作为客居研究员赴美。该财团是由里根政府的前负责保安的特别帮办爱伦负责的，是与里根有着很深的关系的公司，许和平就是这个公司的第一个客人。还有风闻说，前司正秘书官许三守将去日本。是因为留在国内就众说纷纭的缘故，还是要让他暂时去见见世面，而后再任用？是不是带着特别任务去的呢？对这些还没有人知晓。也有风闻说，他将在海外担任特殊工作。切望海外的朋友们多加注意。特别是，很多人担心金大中的人身安全。说不定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要诋毁他的人望。传说，1月初，保安司令去美国，把旅美居留民团组织起来，下达了特别命令。看来他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外工作，来改变对全斗焕政权的印象。

我们从象拾起落地的谷穗一样弄到手的情报和风闻中

所看到的只有苟延残喘的军部独裁的挣扎，而不是走向民主的可能性。而且只能听到人们在这种环境中悲叹的声音。

追 究 真 相

去年圣诞节时获释的人们的的气势很高。除了卧病不起的人以外，都在进行活动。使他们获释的民主运动者，在韩国恐怕是公开主张反对核武器、反对原子能发电站、反对战争的少数人。他们在参加礼拜四祷告会时，毫不犹豫地这种话。在那里，他们还谈论关于被诬为间谍监禁起来的旅日韩国人的问题。金大中尚未获释时，他们还常说：“听说，朴正熙死后，三个姓金的在伺机夺取政权，可是为什么只有其中的一个人被监禁呢？”又有人说：“把金大中监禁起来的原因是军部怕他妨碍他们夺取政权。如今，军部已掌握了政权，所以没有必要再叫他坐牢啦。”这个祷告会可以说是治外法权地带。

只有这种集会能在汝矣岛（汉城市永登浦区北部，位于汉江的岛子，上有美军用机场——译者注）广场上举行的那天到来的时候，才能说是实现了民主的日子。那一天不到来，就不会有这个国家的安定，最近甚至有人说，在把为民主和正义呐喊，直言敢谏的人借口制造社会混乱，关进牢里的情况下，全斗焕是不能平安无事地结束他公开宣称的7年任期的。

去年12月获释的光州人原打算去参加1月5日的礼拜四

祷告会，但是，警察在集会开始之前就把他们押回光州去了。很多人说，光州事件和金大中事件的真相必须彻底澄清。他们甚至认为，追究和澄清这个问题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为了正确的民族史必须澄清这个问题。对此他们抱着一致的意见，说道：

“金大中事件，是事先周密谋划了的。1980年5月上旬，延世大学学生代表在汉城各大学代表会上发言时说，要澄清从特定的政治人士那里得到了钱的问题。这个说是得到了钱的事在报纸上大加报道。金大中被捕后的第五天即5月22日，就发表了所谓‘有关对金大中搜查的中间报告’。直到7月上旬，被捕者被捏造成策划内乱阴谋的现行犯。估计，至少有7人被处死刑。可是从7月中旬左右起，又改成了内乱阴谋。要把金大中牵连到这个事件中去的企图没有得逞后，就把他被绑架以前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当成问题，动用国家保安法，对他宣判了死刑。

“他们说，学生代表赵诚宇参加在5月8日搞内乱阴谋的集会时接受金大中的指令后把它传达给学生方面。这完全是捏造。原来，他长期藏在地下，这天在郊区的一家中国饭馆招待了他的母亲和亲戚。那天正是他母亲的生日。虽然有那时的收据，而且那个饭馆的老板也向检察官做了证言，但在公审时那个证言没有被采纳。

“判决书中，把有关金大中‘在日本的活动’的部分删掉了，并把它交到日本方面去了。这是一场黑暗审判。获释时没能把抗诉理由书带出来。因为他们怕真相被暴露。怎样才能把那样的历史文件要回来呢？在最近也害怕春季的

活动，继续把人逮走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即使要回那份文件，也不能保证它不被他们夺去。

“他们断定国民联合是出自金大中的秘书室的，并说，如果接受了那个室的负责人文益焕牧师的指示，就等于接受了金大中的指示。与金相贤的关系也一样。金相贤是金大中一边的人，所以从金相贤那里接受了什么，就等于从金大中那里接受的。

“就光州事件来说，现在亡命美国的年轻人是同金相贤见过面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一直藏在地下，在乘走私船离韩之前躲藏在济州岛警察局长的家里的。这个警察局长原是全斗焕集团的一名军人，他的妻子是那个年轻人的远亲。这种问题也存在着疑问。反正，因为他不在，就把郑东年捏造成了主谋者。说是郑东年访问过金大中，但这种事是未曾有过的。于是，他的名字追加地记在访问过金大中家的人的名单里。因为那个笔迹非常象郑东年的，连本人也大吃一惊。”

这些事谈起来没完没了。大家都为很多人依然留在狱里，感到痛心。

也有人为挺不住过分残酷的拷问，屈服于把金大中搞成阴谋的中心人物的诡计，感到耻辱并烦恼。

“他们来找金相贤，威胁他，要他说，从金大中那里接受7,000万圆，转交到光州的郑东年那里了。甚至青瓦台的民情秘书李鹤捧也到监狱里来逼他这样做。他说，因为这是军部为掌握政权而搞的把戏，只要肯照办，你能够很快获释，至于金大中，事件弄清后就要释放。不久，金相贤

获释了，但金大中仍没有获释。金相贤非常懊悔自己的行动。他获释后，为见李鹤捧费了很大工夫，但是人家是不会给他那种机会的。

“金相贤是在给他看了郑东年写的收到600万圆的字据后屈服了的。另一方面，郑东年反抗说，他根本没见过金相贤。于是，他们给他看放大的金相贤的相片，说，要记住这个脸。一定要作证说，从这个人那里接受了钱。

“把这样凑起来的供状放到金大中面前，要他承认，说，手下的人都这样说了，就你一个人舍不得自己的生命，岂不是太卑怯吗。说着扒掉了他的衣服。

“我们根本没想到，会让我们这些能够这样澄清光州事件和金大中事件真相的人活下来。为什么让我们活下来，又释放了呢？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的吗？这是出自只顾眼前的策略，不管后事的军人性格的吗？有时候陷入这条命能保存到什么时候这样的不安情绪之中。也许他们为抓住可以随时干掉我们的借口而瞪眼监视着哩。”

这是说疯话的时代吗？是疯狂的社会吗？这样的时代将延续到什么时候呢？从朴正熙政权算起，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从开始实行维新体制也过去了10多年了。到了今年8月，把金大中从东京绑架来的事件也有10年了。这个通讯开始以来也有10年多了。在这难以忍受的漫长的岁月里，胸间充满了悲愤。同时，我向使这个乏味的通讯得以问世的日本朋友致以热烈的谢意。

否定的道路

1983年3月18日讯

在一个毕业典礼上

2月是毕业的季节。先介绍一下登在东亚日报(2月22日)上的小小的报道《某一大学的毕业典礼》。

“家政系理学士122名，起立！”

不知是因为天气寒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主持者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坐在露天剧场草坪上的30多名大学生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为授予学士学位证书而站出来的校长，向为接受学位证书而出席的代表发了毕业文凭。

“其次，政治学士102名。”

这回也有30名左右的学生站起来了。在参加毕业典礼的家属和朋友中间爆发了笑声。坐在主席台上的教师当中，有的翻开为授予学位仪式而准备的印刷品，核对毕业生人数。坐在旁边的一个职员嘟哝着说：“辛辛苦苦念了4年书以后连毕业典礼都不参加的人逐年增多。”

21日上午11点，在某大学操场上举行毕业典礼时，在学位获得者3,000多名中，参加典礼的还不到1,000名。授予修

士、博士学位仪式结束以后，校长开始训话。他说：

“不是以被动的、消极的、习惯性的态度，而是要以能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态度……”

他继续训话，但学生们对它根本不理，处处有人站起来同家属互相打手势，告诉自己所在的位置。有些毕业生离开队伍，一伙一伙地聚在会场附近，忙着照相。在那周围卖胶卷的人们打的红色旗子和黄色旗子给围了起来。好多人哇哇叫着把朋友举起来，有的跑来跑去叫着谁的名字，加上卖棉花糖的也插进来凑热闹，弄得异常喧嚣。校长继续训话：

“要想保卫开放的社会，就应该凭理性行动，而不应该感情用事，同时也应该懂得遵守自由的限度。”

训话快要结束的时候，由于学生们离开座位，露天礼堂阶梯式座位稀稀落落的，显得很冷落。只有获得修士、博士学位的人们仍然坐在前排椅子上。在主人公们离开座位的情况下，毕业生代表致了答辞，然后大家唱起了校歌。

总结4年课程的毕业典礼，就象寒冷的天气一样，冷冷清清。在这毕业典礼上根本感受不到“学习的喜悦”、“教育的骄傲”这一教育的理念。

这是令人寒心的这个社会的缩图。说不定今后还要由军队来维持这种毕业典礼的秩序呢。这天，这家报纸这样小心翼翼地登载了这个消息的同时，还在头版的左段用黑体字写道：“全斗焕××接见并勉励检察干部，要严格取缔无视法律的特权阶层，应丢掉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态度。”“为实行认真负责的清廉的政治做出榜样，全斗焕××出席民

正党全罗南道支部政论大会致词。”报纸每天都要在左段登载全斗焕的照片和他的活动情况，以及他的“爱国”语录。然而，社会却象“某一大学的毕业典礼”一样变得越来越不象话。全斗焕的言行同校长的训话一样，是为了掩盖事实的。暴力在每天搞正义的说教，真是啼笑皆非的世道。但是只好忍着心肺欲裂的痛苦，默默地听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民众是会选择对暴力和不道德的行动进行反抗的否定之路的。会有以不关心、逃避或消极的形式表现的否定。也会有自愿地对它进行抵抗，被监禁和受拷刑的那种崇高的否定之路。为了压制这种否定，有组织的镇压在越来越加强。最近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说，各大学正在筛选学生，苦于从超过招生定员30%的学生中挑选该刷的学生。据说，以思想不稳的借口放逐也还不够数。由于这一“强制脱落制”，念完2年级的时候，就有18~20%的学生被刷掉，念完3年级的时候，就有10~12%的学生被刷掉。这样做，就能把大学生束缚于所谓学校的指导和学习成绩上。

于是发出这样的布告：决定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考试等录用国家公务员的考试中，考虑大学教师的推荐和大学时期学习成绩30%。结果，大学失去了活力。大学变成了象年轻人必经的兵役一样的地狱。所以，毕业典礼是那样颓废了的。

大学教师也一样，如不进行抵抗，就要颓废下去。如果失去了理念，就会落到利己主义的泥坑里，叫学生看不起。这样他们就越要把权威、成绩评定权、推荐权和身分

调查权当做盾牌。可能是为了恢复扫地的威信，掀起了为获得博士称号而竞争的旋风。在这里甚至拿钱进行交易，干出肮脏的勾当。如果有些人对这种现状并不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反而感到满足的话，这一国家的将来会怎样呢？我们不能不说，只有进行抵抗的人才会有向往未来的可能性的理由就在这里。我们总是感到如不按照新的方向组织起来，就会变成一群匪徒。

正因为如此，抵抗在持续着。2月25日，成均馆大学和外语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都散发了以打倒全斗焕为内容的传单。结果，有的被逮捕，有的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抵抗。据说，目前政治犯有370名以上，其中4分之3是学生。汉城大学也在3月7日和9日散发了地下文件。7日散发的文件，是以“汉城大学全体民主学友”的名义写的。文件的标题是《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是对美国支援独裁政权的抗拒》。这是学生们在大法院对纵火事件进行宣判的前夕发出的呼声。9日散发的文件，是以“民族和民众的儿子——汉城大学全体学友”的名义发表的声明。它的标题是《政府要明确对交叉承认原则的立场》。这是追究政府对南北交叉承认的立场的。下面援引第一个文件的最后一段：

“我们知道，这一事件，是迎接韩美建交100周年，促使人们认清过去不平等的韩美关系的，也是对美国支援反民族的现独裁政权的一种抗议。我们还知道，只要反民族的政权继续存在，只要美国继续支援它，这种斗争就不会停止。因为金铉奖在最后供述中说的话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我想起了我年幼时看到的一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那是

一个大学生为反对纳粹党而参加法国抗争运动后，遭到纳粹党的逮捕，走向刑场的场面。走在前面的人沉思着，后面跟着的人嘟哝着说，他什么事也没有干过。这时，走在前面的人回过头看着他说，正因为你什么事也没有干，我们才一道被拉到刑场去送死的。”

报纸报道说，3月8日，大法院对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进行判决，宣判“驳回全体16名被告的上诉”，“确定金铉奖、文富弼死刑”。同时又并排地报道说，对期票舞弊事件进行判决，宣判确定被告“李哲熙、张玲子15年徒刑，驳回李圭光等16名被告的上诉”。这是要把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和历史上罕见的舞弊事件相提并论的。但据说，3月15日，国务会议“从人道主义出发”，决定把金铉奖、文富弼的死刑减刑为无期徒刑。对这个问题有各种风闻。有的说，美国施加了压力，有的说，欧洲各国的外交系统也进行了活动，据说，他们害怕，由于把他们加以处刑，使学生运动等抵抗运动再度爆发。也可能是这样。难道他们认为韩国的带有批判情绪的人们愚蠢到高度赞扬美国为宣传美国和所谓自由世界各国的“人道主义”而绞尽脑汁施展的奸计的程度了吗？

据说，金铉奖和文富弼听到死刑确定的时候也泰然自若。许多人为能够保存这两人的生命而感到高兴，并且密切注视苦难深重的斗争和这一黑暗现实。

再 度 监 禁

国际通货基金机构发出警告说，到今年年末，韩国的外债将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总产值的56%，所以应该“慎重管理外债”。对此，报纸也不得不进行报道。利率低，通货膨胀的威胁总不消除，又没有对企业进行投资的意思，所以掀起了一股拿不动产进行投机的热潮。为此，政府连续发出严命，说要“严格制裁”。有的地方，土地价格在4个月内一跃上涨了2倍。高尔夫球球场会员券也上涨到去年年末的2倍。拿高层住宅进行的投机，现在扩大到拿东药材进行的投机。结果，使与此无关的平民也心里感到不安，发生了动摇。

为了镇压春季学生运动，已逮捕或监禁了100多名学生。据推测，正在策划捏造可怕的红党事件的阴谋。他们今年没有发布3月1日的三·一节大赦令，也没有发布祝贺“总统上任”的3月3日大赦令。他们最大的任务是镇压学校。有一位朋友在谈到年轻人的情绪时说道：

“不抱豁出命的决心就不能进行斗争，这是事实。这是说，要以破坏换来重建的。尤其是他们反省着容易流于理论和抽象的学生运动，想把它发展成为民众运动。他们认为，学生运动是在象工人运动那样的民众运动发生的前夕发生的运动。”

“从今年1月25日到28日举行的长老会青年大会，有很

多教益。在‘民族、统一、民众、教会’的口号下，有1,200名参加了会议。那是以批判的态度广泛讨论韩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会议。会上，听取了工人的呼声，也听取了宋建镐（前《东亚日报》编辑局长）等反体制人士的发言。大家听到他们打动心弦的话都流下了眼泪。一部分保守的青年，不能接受会上的这种政治倾向，想中途退场。但后来大家都沉浸在一个热情充沛的气氛中。从各教会在会上提出的口号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年轻人的苦恼和希望。口号大致是这样的：‘大家起来建设’、‘如果变成民众治理的国家，民族将会得到统一’、‘新日在来临，直到那天决不动摇’、‘前进吧，冲破这一黑暗’、‘让我们在民众的苦难与复活的现场伽列里亚再会’等。”

他接着谈了趋于激进的学生问题：

“斗争一个时期以后转入地下。在地下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后，在适当的时期，通过适当的人出头露面。当局在约定不加逮捕和拷问的条件下让他们从地下出来，然后再进行调查。在地下的人注视当局怎样对待他们，并根据情况决定自己的行动。当局为封锁地下活动，想用所谓宽大处理，使他们出头露面。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斗争一个时期后转入地下的现象就会成为平常的事。另一方面，表面化了的人并不是思想转变了。他们一定照旧继续进行斗争。于是，当局以给他们安排工作为名企图硬把他们送到中东等海外的建筑工地去。但这可能是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害他们的计策。因此，他们即使再度坐牢也对它进行抵抗。不管怎么说，越来越增多的这些被放逐的、只

能趋于过激的反体制的年轻的人们的问题，倒是个重大的问题。”

这个朋友还谈到了留在狱中的人们的健康状况。由于昆特老·泰塔和元丰毛纺厂的斗争而被监禁的女工们的健康也很不好。据说有两人患重病受折磨。3月10日，有1,500名工人冒着雨聚在汉城的永登浦教会，庆祝劳动节，纷纷流着泪诉了苦。他还谈到了有关光州的消息：

“当局为光州事件当时被杀害的人们修了很朴素的茆地。这为的是使人相信牺牲者只是少数，并安抚民心。但这反而成了祸根。因为人们动不动就聚在这里，外国人也到这里来。于是当局给每一家属发1,000万圆钱，并施加压力，叫他们迁葬。今后也应该注视这一方面的斗争。另一方面，今天全体人员都被释放的情况下，受伤的人成了问题。约有150人中，有5名由于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加上交不出治疗费，都被撵出了医院。当局看到他们没有力量，就不理他们了。光州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它孕育着再度引起许多抵抗和悲剧的因素。”

他还告诉我一件有关高永根牧师被捕的消息。曾先后两次长期遭受缙绁之苦的高永根牧师，2月24日在汉城基督教会馆举行的礼拜四祷告会上，作了题为《主持正义》的说教以后，第二天又被捕了。他的说教首先对全斗焕集团开了炮。他指责了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向戒严司令开枪的越权罪和从1980年5月18日开始在光州屠杀同族的罪行。他还断言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是民族思想的表现，是一个“义举”，并说：

“美国政府帮助军事独裁者参与了光州市民屠杀事件。威克姆司令和渥克美国大使侮辱我们民族的事件等，对自主的国民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耻辱。再说，那些残酷屠杀自己同胞的歹徒们篡夺政权，蹂躏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并且献媚于美国和日本，情愿过奴隶生活。只要有一点点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国民，对今天的现实就不能袖手旁观。不论是谁，总得有人要求美国改变对韩国的错误的政策，要求军事独裁者反省，同时也应该使民众从睡梦中醒过来。就在这样的時候，文富弼代表我们民族，以纵火的方式做了促使人们觉醒的事情。”

这样高永根牧师再度被捕入狱了。这位朋友说明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他说：

“他的说教印刷后分发到许多人中间去了。是再好不过的内容。可以说这次高永根牧师的说教倒比他前一次的说教温和一些。他本想把这次说教作为最后一次的说教，暂时不作政治性说教，只作为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工作。安全企划部(前身为中央情报部)和保安司令部对于是不是把这个说教当做问题，意见不一致。当局还逮捕印发这个说教的一些人进行调查。在教会内部也有意见分歧。有的人说，目前监狱里没有一个牧师，所以为了运动和斗争，应该把高永根牧师留在监狱里，没有必要同当局进行交涉。有的人主张，不管怎样，在人被监禁的情况下，应该站在维护人权的立场上，进行交涉。但看来他们的态度是如果释放时附带条件的话就不能接受。”

不管怎样，在压制下，国民不应该陷于颓废和软弱的

泥坑里。只有选择真正进行否定的道路，提出坚决的主张，采取行动，才能成为照亮黑暗的一束亮光。在这种黑暗的时代，只有苦难和殉教才是历史的证言。必须保持这种精神，并把它变成全民族共同所有。

传说，金大中在美国使许多同胞深受了感动，这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在这一半岛上的生存和他们在海外居住地上的生存，都是同一民族的生存，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我总想，我们民族今后的任务就是建立一种把这两种生存看做是同一民族的生存的、符合多种生存方式的政治秩序。那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那么多的人被严峻的历史波涛推到远离半岛的东西南北异国他乡去居住了。

现在，金大中可能在这样的现实中，积累又一个经验，正象过去在日本的统治下流浪的先辈爱国志士一样。

不可饶恕的人们

1983年4月17日讯

被凌辱的学校

整个国家被一小撮军事暴徒凌辱了。在某一大学里，500多名穿便衣的人冒充学生横行霸道。这是对大学的凌辱行径。这些便衣青年，是警察，是军人，是暂时被雇佣的暴力团，还是以纯化教育的名义被征用的不良青年，无法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可能是干出暴行，见了血就更加疯狂的法西斯集团。本来以为这些凶手——青年暴力团只是按照军部的命令干出野蛮暴行的，但现在竟然向女学生伸出了用暴力进行威胁和强奸的魔爪。这可以说是当权者豢养的暴徒。首先在汉城大学开始发生这种残忍的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关于1983年4月6日星期三从10点到11点，在汉城大学女学生部办公室里举行的学校当局主持的女学生干部座谈会的秘密报告也承认了这一点。现在把它大略记述如下：

1，新生欢迎会也被取消了。因为干部会的内容没有公开，这更加引起了一般学生的不信任。

2, 虽然举行了体育大会和野游会, 但参加的人很少。在学生中间消除冷漠现象, 是个大问题。

3, 据说, 对于使女学生本身参加女学生福利设施经营委员会的问题, 正在向文教部请示, 何时得知其结果呢? 必须在第二学期开始时通知。

4, 把工读的女学生们只分配到食堂去做服务员, 是不恰当的。希望采取新的措施。

5, 有关学校内女学生的遇害情形的具体实例:

a, 社会系女学生的情况:

3月15日下午3点左右, 从图书馆走向第七栋和办公室的半路上, 被自称为政治学科3年级学生的男子拉去挨打和受胁迫后, 经过师范系食堂到达4·19纪念塔附近时, 因从上边下来了经营系学生才得救。这个来历不明的男子把她拉去, 威胁着说: “我是机关人员。你是有问题的学生, 受监视的人。如果不跟我去受检查, 就不能上学。参加示威的学生都要受这种管制。”由于经营系学生出现而不得不放了手的那个人, 在离去时, 附带地说: “以后再通知你。明天再到这儿来。”就这一问题正在同指导教员等人进行商量。

b, 家政系女学生的情况:

3月18日下午4点左右, 碰到了头发短的象学生模样的男子。他靠近后, 硬拉着要她跟他一起去。她表示反抗, 他就打几个耳光, 松了手, 威胁说, 以后一定再来, 然后溜走了。

c, 师范系女学生的情况:

这一事件是与这个学生生死攸关的问题。作为女子遭

受了最不幸的祸害。本人说如果这件事被众人知晓就要自杀，因此不能公开。

对如上所述的事实应当迅速采取措施。

在这里再引用一份汉城大学学生护国团的第三次常任委员会(1983年4月7日18时到21时)的报告。

场所是委员会办公室，指导教员和干部们参加了会议。

1，必须取消选举和任命学生会干部以及加入小组须经指导教员批准这一条。对此，学校当局回答说，可以取消对原会员的重新批准这一条，但如果连对新会员的批准这一条也取消，就要受到失职的追究。

2，经营系演出话剧(4月1日~8日，《谁也不憎恨的人之死》)一事得到了批准，但学校当局突然改变态度，取消了。师范系护国团主持的学术讨论会(4月8日，《大学的师生员工和大学的职能》)没能召开。这不是出于当局的神经过敏吗？预定在4月12日举行的人文系和师范系学生护国团主持的“4·19”23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必须在全校的关注下召开。但是现在学校当局以禁止考试前一个星期期间进行活动为名，不允许举行学术讨论会。

3，最近，由于冒牌学生增加，女学生的遇害事件也增多了。由于对师范系学生的暴行事件和对社会系学生以及家政系学生的暴行和胁迫等事件的发生，校内流传各种风闻。由于学生数和常驻在学校的冒牌学生的增加，学生相

同时，要求有关机关停止最近不经大学校长的认可，搜查各办公室，并逮捕学生的行为。

终于发生了潜伏在汉城大学里的便衣机关人员冒牌学生强奸师范系的新入学的女生的事件。教授会也承认了这是冒牌学生的行径。12日下午9点左右，冒充高年级学生的家伙把在图书馆里学习的女学生带到外边去，威胁她说是思想不稳的学生，并装作审问，甚至强奸了她。过了一个星期后，这个家伙又企图强奸另一个女学生，但被学生们发觉了。学生们在集会和示威中要求弄清这个事件的真相。

这么一来，警察当局到了4月16日才说：“最近，流传着汉城大学女学生遭受武装警察队员、学校要员的凌辱的流言蜚语，但是把这段时间里的搜索结果综合起来看，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并发表了如下的内容。报纸简单地报道了其内容。

“有两起强奸前案的安基孝(22岁，住址不定)，今年3月初在汉城大学区内小卖店，买了学生手册，在那上面写了社会学系统3年级，成了冒牌汉城大学学生。后来在3月12日晚9点左右，对在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学习的师范学院一年级女生金乙子(假名，18岁)说：‘给你介绍校内小组活动。’这样接近她，并把她引诱到有大学4·19纪念塔的后山去，掐着她的脖子，拿棍棒进行威胁，干出了兽行。遭受暴行的金乙子，第二天向素来熟识的前辈安某(27岁，师范学院数学科4年级学生)诉说了这一事实。安某在3月19日下午6点左右，在图书馆附近抓住了这个企图接近另一名学生

的犯人安基孝，并移交给冠岳警察署了。调查结果，判明犯人安基孝在干出丑恶行为的第二天即13日下午6点左右，在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偷了该大学法学科2年级学生文某（19岁）的小法典一本和宪法总论等3本书。为此他以盗窃嫌疑犯被拘禁了。”

据英文报的报道，警察当局甚至附带地说，因为女学生不想起诉，强奸的事实无法确认。传说，常常在对拘禁的女人的审讯过程中进行强奸，难道这种丑恶行为甚至波及到大学里了吗？学生们正在切齿痛恨。他们愤恨地说：

“现在事情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穿便衣的人在学校里横行霸道，实在无法忍受。这可能是国家和大学都被凌辱的具体表现吧。这是在国家的凌辱行径中暴力化了的男子的行径吗？如不然，是为威胁大学而有计划地搞的吗？警察直到现在禁止报道，过了一个月以后才作了荒唐的说明。有两起强奸前案的犯人，住址不定，盗窃罪等，净是不明不白的东西。他们不否认事实，只强调他不是机关人员。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真的不是机关人员，那么这种消息就会登在社会栏最醒目的位置上的。”

为什么庇护犯人呢？是无法否认事件的吗？是不想否认的吗？是对女学生们提高觉悟的事实进行威胁的吗？他们这样提出疑问，不停地述说痛苦的话：

“最近，很多女学生忍无可忍，参加了示威。作为女子，感情上的冲动恐怕是难以抑制的。最近的示威是由即将毕业的4年级学生主导的。他们抱有断送一生的决心。这是胸怀很高的意识作出的行动。

“在这凌辱的时代(因为美国在凌辱这整个韩国半岛),言论对此保持沉默。不仅是国内言论,而且世界言论也都算是协助这种凌辱的。不仅如此,尽管学生们都豁出生命进行斗争,但看那卑鄙的教师们吧。没有一个人人为大学的这种现实感到苦闷而得神经病。没有人进行抵抗,也没有人感到羞愧而自尽。没有办法啊。他们满不在乎地说,学生们变成了红党。说着竟对罪恶深重的日子表示肯定。有时说他们无能为力,并乞求同情。他们遭受凌辱,却作出理应如此的样子。他们心甘情愿受凌辱,并以此来达到飞黄腾达。

“都是些不可饶恕的人。确实是凌辱的时代。而它具体的创伤只留在我们的肉体上,使我们感到刺痛。”

年轻人的愤怒的呼声,总是批判美国。这样的时代,日本当然同美国一起成为非难的对象。他们接着说:

“这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支配的末期现象。是国际性的法西斯主义时代。能有什么东西摧毁它呢?因为这一点,我们感到难过。他们只有军事上的防卫手段。但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很多挑衅性的事故和事件,创造历史。

“迎接《东亚日报》创刊63周年的时候,中曾根发表了特别书面谈话。《东亚日报》大大赞扬新殖民主义,并对此大加报道。中曾根甚至发来用朝鲜文字写的贺信,祝贺《东亚日报》创刊63周年,同时祝愿今后的发展。这份贺信使报纸大放异彩。这是歌颂《韩日新时代》的。这就是为凌辱抛出的微笑。《东亚日报》遭到其凌辱又做出微笑。总之,我们国民的怨恨只能越来越加深。”

对年轻人的这种绝望和“反叛”，怎么办才好呢？看来，这一事态，不是可以用日本总理和日本大使的友好书信和《东亚日报》对此表示感谢等把戏来收拾好的。如同学生们所说的，这将会更加加深这个国家国民的心中的裂痕。

抵抗的激进化

迎接4月3日的复活节，韩国基督教青年协议会，发表了复活节书函。这里引用其一部分：

“我们民族比别的任何国家都受到更多的外来势力的压力，而最近听到有关在韩国半岛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的发言或者在韩国半岛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报道等，对于这种严重地威胁民族存亡的事态不禁表示忧虑。由于严重地依赖对外经济，民众的生活基础已在崩溃。很明显，政治上的发展和人权问题，现在已不是能只在韩国半岛追究其原因和解决办法的问题。传统的文化被破坏，民族的主体性遭到侵犯，到达了难以恢复的地步。由于这一切问题，民主的、民众的、民族的运动力量遭到各种形式的镇压，这就是今天的现实。迎接传教100周年的韩国教会，对民族史的任务置之不顾，为夸耀表面上的成长，而着重准备庆祝活动。”

书函在末尾写道：必须“不顾周围大国的种种阻碍和干涉及威胁”，为实现“自由和平等”、“正义和真正的和平”，为“反对外来势力，实现民族统一”而行动起来。虽然选了稳

健的词句，但可以说是表明了战斗的年轻人的共同决心。这是没有止息的斗争。

4月再次掀起了抵抗的暴风。3月18日汉城大学，22日成均馆大学和西江大学，23日崇田大学，31日檀国大学，4月7日梨花女子大学，4月8日汉城大学，4月15日淑明女子大学等抵抗接连不断地进行。在4月8日汉城大学举行的示威中，现在的执政党民正党的上层、国会副议长尹吉重的儿子也被捕了。迎接4月19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学生的示威将会更加逐步升级地扩大起来。在汉城大学，由于强奸事件，学生们的愤怒火上加油了。于是，从4月12日开始，“室内室外的一切学生集会”都被禁止了。现在引用学生声明的一部分。

他们为什么放了火呢（指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这为的是向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利益而支援韩国独裁政权的美国提出警告。这是韩民族对光州事件负有责任的美军作出的正当的惩罚。这也为的是号召我们国民提高民族觉悟，向美国国民表明韩国国民的立场，并对梦想支配韩国的日本势力提出间接的警告。（摘自3月7日全体汉城大学民主学友的《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是对美国支援独裁政权的抗拒》）

法西斯体制根本就不是基本上在一般国民中扎下根，能够民主地处理一般国民的要求的体制。这个体制只是作为代表买办集团的利益的体制才存在的，所以它缺乏追求

真正统一的思想。因而一涉及统一的问题，他们就只想把它利用于他们的掌权方面。根据这种事实来看，实现统一的最先决的条件，可以说是出现最民主的政权，确立以此为基础的民族主权。因而，统一问题，只有对内要通过反法西斯斗争，对外要通过对外部势力追求自己利益的阴谋活动提出警告，才能找出根本的解决途径。（摘自3月18日汉城大学全体爱国民主学友的《为民族、民主的斗争宣言》）

我们必将取得胜利。让我们都团结成一体吧。各位学友，示威一开始，一散发印刷品，就拾起印刷品，唱起歌，排成挽臂队伍吧。印刷品是争取这个疆土的民主化的声明，是表明民族的未来面貌的。因此要在学友之间传阅印刷品。（摘自3月22日成均馆大学全体民主学友的《行动纲领》）

请看看我们周围。经常干涉的教师们，从校门直到图书馆，监视我们的门卫，在校舍前昨天和今天都在等候的机关人员，打扫教室和卫生间的老大娘，化装成大学生的女机关人员，他们都在监视着我们。再加上，现在由于学习成绩的竞争（因为强制放逐30%的学生的关系），学友们之间也进行竞争。（摘自4月7日梨花女大全体民主学友的《争取民主化的斗争的前言》）

3月22日发生的成均馆大学的示威斗争是至今的示威中搞得最激烈的一次。2,000名学生同500名武装警察进行了掷石战。据说，15名警官负伤，现在两名还在住院。警

察发射催泪弹，学生们就用沙袋或水来对付它。无数的学生负伤被捕。据公开发表，10名学生被拘禁。

在为地下文件《我方，对方》（参考另文刊载的《汉城地下报告》）进行的搜查中也逮捕了很多学生，很多人和教会会馆受到了搜查。看来，他们把它当做最大的事件。据说，汉城大学也有30名被逮走或被捕，约有20名学生为这个事件匿迹。最近，对出入韩国的外国人也进行严密监视。估计，可能要捏造同国外的动向有关联的某种大事件。

当局为压制学生的活动，倾注最大的努力，所以学校变成了象战场一样的地方。从前年开始，录取超过定员30%的学生，命令在学期间放逐掉。他们认为，这样做，学生就会不再关心“政治”，老老实实地用功。据说，今年除掉了876名，但正确的数字还不详。当局命令，只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一点点可疑，就给以教务惩戒。据报纸报道，受惩戒的学生数达到1,200多名。他们叫由于30%的放逐措施而被撵出大学的学生报名上广播函授大学插班学习，但学生们对此不感兴趣。据说，如果照这样下去，到1985年，被刷的学生将达4万名。全斗焕政权怕这种事态会招致极大的社会不安，便说，对一部分学生在4年毕业时，可以发证明修业4年的证书，而不发文教部颁发的“学士证”。因为他们镇压国民，青年就受这样的折磨。教师们说道：

“学习再好，30%是要被放逐的。因此人人都在战战兢兢。不可能有自由地进行学习和研究的生活。也许列入30%的学生中被刷掉，倒不如在进行反抗运动中被放逐。在暴力的法规下，现在他们想尽可能忍耐下去，可是到了3、

4年级会怎样呢？由于反抗心理，也许会掀起更大的起义。

“总之，被放逐的那么多的年轻人的将来会怎样呢？他们在全斗焕政权之下是活不下去的。必然要趋于革命化和激进化。特别是，那些曾被监禁，而如今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出路的年轻人挣扎在绝望中。他们变得反美，而且认为首先要实现统一。不论能否实现，它是支撑着他们的人生的口号。只要全斗焕继续掌权，知识分子就感到绝望，不知什么缘故，连国际形势也使人感到绝望。他们批判地对待金大中等人，认为他们过于稳健。”

这样，话题便转到金大中问题上了。这里把几个人的对话整理起来介绍如下：

“由于金大中赴美，在学生中间传出了强烈的呼声，说他同当权者妥协了，背叛了同志。但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和市民却明里暗里想着他，对他寄予期望。他们听到金大中在美国的活动获得了成功的‘流言’受到鼓舞，连那些至今说他背信弃义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了变化。他们想，怎样在国内运动中弥补失去了他的损失。金泳三多少有些进步的表现，但还不能得到相当的信任。要是现在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金大中可能就会以压倒的优势获得胜利。但是，对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问题，大家都抱怀疑态度。美国当然不会支持他。只拿城廓是无法保卫国家的，可是成为这个城廓的军部在这种世道里只能衰弱下去。他们日益腐败，一味寻找有效的政治上的出路，闹分裂，互相戒备。反美风潮将风起云涌。美国对这种情况会满意吗？”

他们说，在激进化的学生中间有这样的议论：金大中

是不是应该对目前的韩国情况死心，而同北方进行对话。有一位记者一听这话便说道：

“金大中倒是可以向北方说，我们商谈吧的人。美国目前提出南北交叉承认。会不会认为，能够进行对话的金大中是他们需要的人物呢？全斗焕集团企图暗地里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金大中是经常失掉良机的不走运的不幸的人。难道他是没有一场革命就不能回来的人吗？还有风闻说，金泳三将成为全斗焕的后任。”

大家都一致认为，全斗焕集团所怕的只有金大中。继金钟泌之后，丁一权（军部出身，朴正熙统治时期的国会议长）也被送到美国去了。人们说，不久，金泳三也将被送去。这为的是，向美国装出有政治自由的样子，同时贬低金大中的声誉。当记者的朋友接着说：

“全斗焕集团并没有把金钟泌和金泳三放在眼里。要把他们两人送到美国去，搞什么鬼呢？现在表面上装成有自由的样子，而现实却是在背地里进一步加强镇压。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将进入那个不过是御用团体的国会选举战。但看样子，即使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根据现行的选举法举行选举，现在的执政党民正党也难免遭到全面失败。对此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现在已经把金钟泌和丁一权送到美国去了，传说，把金泳三也要送去，这些决不会是与此无关的。”

政府公布：即使石油的国际价格下降，国内价格也只反映其30%。估算其余的70%可达2,000亿圆。这一项将拨给4个部门，即“支援合理利用动力及储备煤炭，支援电子机

器零件出口及资金需要者金融,支援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分期付款出口,支援建设7个堤坝等水利工程”。但那位记者朋友却说,那是明年要举行的选举的政治资金,这是人人皆知的。

对全斗焕集团来说,要维持政权是这么难的。因此日本政府和财界是不是估计到全斗焕政权会对日本采取低姿势?现在已经看不到全斗焕政权出世当时不懂世故的年轻的辅佐官们那“傲慢无礼的样子”。

这一系列事实将更加刺激反对全斗焕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反抗情绪。镇压和放逐越加强,他们就越会激进化。

创造“先进祖国”

全斗焕集团最近挂出了创造“先进祖国”这样一个口号。为了宣传1988年举行的奥运会,连茶店的牌号也起作“奥林匹克茶店”、“88茶店”。看样子,他们把这当做“先进祖国”的象征。然而,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话太可厌,觉得不值一提。有时为讥讽才说两句。

在变成“先进祖国”的前夕,这个祖国的目前情况怎样呢?它是外债大大超过400亿美元的负债国。只据政府发表的材料,截止去年末,外债达372亿美元,占国民总产值的53%。今年一年需偿还的本利为60.3亿美元,明年将达到70亿美元。为此,贷款企业要搞出4.8兆圆以上的赢利。那么结果将怎样呢?通货一味膨胀,银行的存款只有出没有进。银行几乎停止贷放。

各报登出这样的标题：《银行空了》、《全市银行存款额剧降，贷放口冻结》、《釜山哭丧着脸叫喊3,000亿圆投奔汉城》，并把为搞投机业流转的资金当作严重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条象征“先进祖国”的前夕的面貌的新闻。3月27日，韩一合成纤维的理事金根祖在釜山受审时昏过去被抬到医院后死了。据说，他受令出卖了企业所有的无用之地，不久又买回时，由于投标有舞弊而受审。在旅馆，3名警官审讯时拷打他说：“你既然对公司尽了忠诚，也该对国家尽忠。”

这样，他被抬到医院去了。可是，他们隐瞒拷打的事实，说是药物中毒，使得医院方面白白花3、4个小时进行了洗涤。医院方面怕警官，在金根祖死亡后也没敢写诊断书。后来家属提出抗议以后才扣押了1名警官。然而，事后在报上天天大书特写地报道，对各企业买回土地时出现的舞弊进行调查的消息，对韩一合成纤维公司则施加压力，说也可能判处15亿圆罚款。这可能是要迫使家属取消抗议的。当治安局长为这件事被追究责任的时候，就公布说，局长应智利政府的邀请出国，并同时提出了辞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法西斯政权的残暴的掌权者之间在国际上的联系和支援。

难道这是走向“先进祖国”的道路吗？截止4月10日，查明有359名政治犯在坐牢。这和“先进祖国”的表象是毫无关系的。当局可能很想说，他们正是阻挡走向“先进祖国”之路的叛徒。那么，这所谓“先进祖国”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呢？是和智利那样的国家的当权者加强国际联系的吗？是象全

斗焕口头禅似地说的“现今，韩美比任何时候都在加强合作关系”那样的货色吗？3月28日，他在迎接美国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委员长一行时强调说：“韩美两国是最亲密的血盟之友邦，如今比任何时候都在加强友好合作关系。”他还特别赞扬了“协作精神83”军事演习“胜利进行”。据说，小组委员会委员长对此表示同意，答道：“特别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及贸易合作是令人满意的。”难道全斗焕集团认为，这样满足美国的利益，就可以加入先进国家的队伍来夸耀“先进祖国”的吗？看来，他相信，这样做就可以保住他的残暴肆虐的政权。所谓“先进祖国”可能就是要完全附属于国际法西斯体制的。全斗焕可能是因此有了自信。据一位记者说，最近全斗焕变得非常饶舌，简直使人挠头。他对来访的人，自己一个人喋喋不休地扯一个小时。记者向周围的人们问道，这应该看作是什么征候呢。

“先进祖国”不过是掩盖他们的不安的空洞口号。在黑暗笼罩的情况下，勉强提出那样的口号，企图迫使国民响应。对今后的政治局势流传着很多流言。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有可能提前在今年秋天，向北方提出统一宪法。据说，如果北方表示反对，就只在南方实行。他们是想用所谓修改宪法这么一个政变来闯过明年的选举之关的。”

“3月27日，民正党全党大会在持续两个小时的掌声中结束了。他们自吹自擂说，至今，民正党每当遇到考验时，以‘改革精神和同志爱’克服了它，并进一步成熟了。在总统赞歌的乐声中，全斗焕夫妇一出现，顿时响起‘哇’的喊

叫声，同时举起了900多枚牌子，其中600多个是全斗焕的脸象，300多个是写着民族、民主、正义、幸福、统一、精神改革、先进祖国等字样的牌子。他们是用那个喊叫声来排除他们的不安的吗？他们的内部是四分五裂的，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同志爱。他们没有方向，不知朝哪里走，也没有组织体系。他们是为觅食突然聚拢来的乌合之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改革精神。据说，许和平和许三守虽然被赶走，但陆军士官学校第17届毕业生的势力死灰复燃了，而和全斗焕同期第11届毕业生、现任内务部长官卢泰愚之流是早晚要给撵出去的。

“这是到任何时候也不得安定的政权。因此他们似乎在忙于想办法豢养暴徒即所谓法西斯分子。他们大喊要把党员从现在的106万增加到115万，并说，已经训练好了51,000名骨干党员。党员当中大学毕业的有3.1%，所占比率很低。中学毕业的最多。他们是想把他们豢养成凶恶的法西斯分子，这事会搞得顺利吗？因为有长久的文人社会的传统嘛，朴正熙曾想尽可能搞文人统治。他这样做了也还统辖了军部。但是全斗焕不顾最近国民对军部比从前抱更大的反感，却企图使全社会的干部军人化。

“这恐怕不会搞得顺当的。同国民的对立越来越加深。虽然布下了那么严密的警戒网，但学生们不是仍在起来斗争吗？在这对立达到顶点的状态下，只有牺牲者会更多起来。”

那位朋友说，如果不修改宪法，而搞挥金选举，或靠镇压和舞弊来搞官方操纵的选举，那末，国民就会掀起巨

大的反抗浪潮。我说，他们或许估计到那种情况，采取某种坚决的政治措施呢。他答道：

“他们为了使金大中和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人变成极少数，可能要去动员金钟泌等旧朴正熙势力，可能的话，还要拉进金泳三。还可以估计到，分别举行选举，而后纠合成一股大的政治势力。然而那是名副其实的一套政治，所以我想，全斗焕集团不可能那样做。因为他们没有那种能力，所以他们可能认为，如果那样做，他们将失去一切。实际上，我并不认为，用那种方法就可以使民主力量变成脱离国民的极少数的一派。至少金泳三是不会同意那样做的。

“他们每每都说，克服了危机，但那不是克服。他们只是以毒辣的镇压和蹂躏勉强支撑下来的。国民被迫保持了沉默，也许努力去忘掉它。但是，最近，我总觉得那些东西积累起来变成一种极大的潜在意识。这样，国民越发不信任政权，越来越反对政权，反对军部。这种情绪变成愤恨，在心里越积越大，等到当权者方面认为好容易闯过了危机的时候，来一个突然爆发。这要比做火药库好呢，还是比做施工上出了岔子的煤气管好呢，我觉得当权者好象坐在那上面似的。”

没有起变化的可能性的东西是没有希望的。这样堵死可能性，打算怎么办呢？他们常把权力集中在一个残暴的人手里，力图苟延残喘。那个人一倒下去，一切都崩溃。在那样的情况下，当然不会有社会的安定。哪怕执政党内有所变化，也不会这样感到不安。在民正党内部也好，为什么不能来一个执政的更替呢？现在的政权，在走朴正熙的

老路中命要更加缩短。除非发生革命，就不能指望政治上发生变化吗？朋友接着说：

“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在野党不能不走向革命。眼下，官僚也一样，只要有一句责难，就来一个辞职。无论是谁都感到来日的命运难保。也许可以说，只有军部的人过着安定的生活。由于从军队里转业或降职而退伍了也能够谋取一个安定而清闲的好职业。据说是全斗焕的三人组之一的金馥东现在开始在延世大学行政大学院学习。可能是想当一名高级官员或国营公司的头子，度过余生。他们这一辈子是打了保票的。因此，近来学生们说，博士上面有陆士（意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译者注）。这些军人有一种预感，觉得这种安定的地位很是勉强的，而且是有些不安的。

“因此说，这是一切都不安的政治。不仅把官僚而且把全体国民的日常生活也赶进不安之中，然后叫人们都来依靠当权者来求救。可能就是要不断地造成不安来维持独裁的吧。他们在强调来自北方的威胁。他们是为使国民看不清内部的敌人，才强调北方的敌人的。但是，当今的年轻人却说，北方是自主的，实现了统一，也有可能带来自由。北方不是象南方那样被外来势力及其走狗践踏的泥沼。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此，我们没有能够进行说服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性的话可讲。”

在创造“先进祖国”这一空洞的口号下，国民越来越消沉。那是因为他们凭直感认为这个历史不是前进的历史，而确实是没落的历史。

殷切的呼声

给标上“南朝鲜民族解放战线事件”这么个吓人的名称，在1979年朴正熙被枪杀前夕被捕的人们的家属在继续呼吁，要营救病弱的33名良心犯。两名被处刑而不在人世，5名仍在服无期徒刑。去年夏季，美国系统的企业“昆特老·泰塔”宣布停业的时候，对此提出抗议的3名工会女干部也在狱中患病。被解雇的工会会员重新就业的路也被堵塞了。有消息说，为这件事，美国本公司的代表和美国教会代表将一同来韩。因此她们对此多少寄予一定的期望。

去年秋季，从元丰毛纺厂给撵出来的工人当中，工会支部长等8人仍在狱中，受审判。工会会员们呼吁，要营救那些女工，并继续唱《决不瓦解》这支歌。

消逝，毁坏，
穿孔，歪扭，
这些都不过是映入我们眼帘的形象。
那犹如深海中的鱼儿，
一个鳍也不丢失，
生活在这个世上各个角落，
燃起永不熄灭的蓝色火光。
消逝，毁坏，
那不过是映入我们眼帘的形象。

这也是反映怨恨的思想的。在用暴力无可奈何的这样的意志面前，暴力终将灭亡。反映这种思想的无声的呼吁，从四面八方传来。因此，全斗焕集团也在说，事实上，这样的民众的思想、民族的精神虽是最大的敌人，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奈何不得的。

由于这种无声的呼吁，在光州，暴力岂不是在惶惶不可终日？不久，5月光州事件三周年就要到来。当年，全斗焕集团为了掩盖死亡者5,000名这个数字，修了127人的坟墓。这个墓地如今却成了巡礼之地，反抗的象征。人们象到麦加去一样，到这里来搞政治性的聚会。晚上也有学生到这里来。于是，当局害怕了，拿出很多钱劝他们迁葬。现在许多人仍坚持不接受，可是传来了由于家属屈服，已有3个坟墓迁葬的可悲的消息。

全斗焕集团那种军人式的、暴力的思考方式是当然看不出国民的这种心情的。现在，国民采取旁观的态度，说：“干吧，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好啦。”

参加民主化运动的一位朋友说：“这个民族通过长久的历史，曾经受了很多别的民族的折磨。因此，可以说，他们懂得了在别的民族的支配下忍受着活下去的方法。但他们可能还不太懂得在同一民族的统治下，忍受着活下去的方法。同一民族对同一民族实行统治的方法没有任何发展。总觉得我们在经历新的体验。”现在，对同一民族的统治却象对敌人的统治、对殖民地的统治一样，国民就象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初一样，陷入深沉的沉默、抗

拒和绝望之中。

然而，即使是处在这种环境中，那些斗争着的人们也梦想着新的解放。他们在想，这回可不要被动地接受它，而要积极地去争取它。这种思想在流传。

现在，我这里有一个题为《学生运动的前途》的印刷品。用400字稿纸计算，可达180枚。这是回顾迄今的学生运动，加以批判，并展望这一运动的前景的。

运动的目标定为“民族统一”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它的战略是：（一）“反对法西斯政权和支援它的外来势力”，“结成广大的民主联合战线”。实现（一）的策略是（a）“揭露美国保守势力的本质”。（b）“对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地盘予以强烈打击”。（b）中还指出，要加剧政权内部矛盾及政权和美国保守政权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政权脱离民众。

为实现（二）的策略是“刺激其他的运动，扩大力量”，“为奠定全民众抗争的基础做准备”，“通过政治斗争大量培养优秀的活动家”。这样，必须排除单纯的理论斗争、“把自己的立场加以合理化来使当前的斗争目标和方法模糊不清的思想”之类东西。并把“日常斗争”、“宣传工作”、“政治斗争、示威”等作为斗争方法提出来。还对许多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举例来说，就“政治斗争、示威”问题这样写道：

“示威是学生运动的最高形式，要采纳学生群众的热烈志向，把它发展成政治斗争。并且，要有能够克服政权的残酷镇压的积极而周密的策略。街头示威是应该采用的最高的斗争形式。街头是政治斗争的最后的场所，在这里可以通过对民众的直接的鼓动，将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民众

的起义。在街头示威的时机、形式、口号等方面，要制定多样的策略。”

这是一本关于革命运动的教科书。笔者写道，对外国的运动，过去谈得很多，但对我们自己的东西却没有进行考察，因此这样初步地分析也是必要的。这本书淋漓尽致地批判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等，强调了灵活性。甚感遗憾的是，不能把全文转载在这里。其内容确实令人深受感动。对于韩国的斗争竟发展到这种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不禁表示惊讶。斗争，的确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只想在这里引用“道路——我们的姿势”这个出色的结论的一部分。

“有时候斗争的人倒下去，由旁观者独占斗争的成果，但历史终究是由那些斗争的人们创造的。想看到自己倾注了精力的事业的结果，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连我们这个朴素的愿望都不可能实现。对每时每刻承担的工作，都殚思极虑地完成的那种实践态度是极其可贵的。”

这种分析和展望，虽然还停留在非暴力的阶段，但它还是阐述得冷静、透彻而且严密。它又是对同志们发出的殷切而热烈的呼吁。那是表示了不容许凌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决心的文件。向往新世界的年轻人的斗争的教科书，在这个国家里出现了。我记得给了我这本教科书的朋友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在没有活路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一些看来挺激进，但全斗焕集团一拉，就会被拉过去的人。因为他们已精疲力竭，陷于绝望。然而，全斗焕集团是不想收买那些

无名的人的。如果要收买的话，那就想把他们充当中央情报部或警察的走狗。但不会有人去屈从干那种事。若是提出相当不错的条件，就会有因软弱而中计的危险。必须告诉他们，全斗焕集团最喜欢想把别人利用于他们的策谋之中。不管怎么说，在革命中，对一个人物或集体的忠诚是不可缺少的。可是，至今没有那种人物或集体。寻找那样的人物，建立那样的集体，可能是今后的重大任务。重要的是，理念和思想，组织和人啊。”

4月7日，高永根牧师获释。他曾被汉城市警察局逮捕。3月30日，所有文件都交到总统官邸青瓦台去了。据说，全斗焕很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把高牧师监禁起来，就会在同教会的关系上发生更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逮捕了他呢。这样，这个事件就移交到CIA去了。CIA方面同教会干部多次商讨后释放时却威胁说：“不要把我们看成纸老虎。不要为这次释放而放心。”

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农民的债务与日俱增，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入学率在降低。上层的人们叫嚷要增产，还强烈要求购买肥料和农药，但他们自己却要吃没撒农药的粮食和水果。高速公路旁的农家盖了漂亮的屋顶。这些房子不是向南，而是朝公路，是为给人们看的。因为是新式建筑，冬季里冷，也没有库房。因为农民欠了债，想搬也搬不出去。

电视节目与农民生活格格不入，使得农民越发感到懊丧。年轻人离开农村，堕落成城市的二流子，在农村缺乏人手，要支很多工钱来雇人。可是，农村完全组织起来，谁

家来了客人，就一定要报告上头。这样聊着天南地北的事的某一天清早，一位前辈说道：

“为什么只有革命这一条路，而没有别的路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开创一步一步踏实地走上改革道路的历史吗？总是分成敌我。如果有好的统率，国民也可以抑制急于求得的欲望，寄予期望，同他们妥协。我认为，我们的国民是好的国民。一向处在相对峙的政治环境中，可不可以使能够起到从中调节的可靠的中间势力成长壮大呢？迄今有过的都被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团体或基督教会行不行？也许历史是连我们这样朴素的愿望也不容许的。这个斗争和黑夜太漫长了。”

只是非难说，这是外来势力搞出来的历史，是不行的。从今开始，就是有那种外来势力的压力，也要创造主体的历史。不知是否可以说，在心里下这样的决心的人日益增多。

怒 火 冲 天

1983年5月16日讯

大 盗 贼 的 故 事

“批评是认识真实的必经之路，但在这个社会，只要你一批评就给你标上危险或叛逆的标签。虽然嘴上高谈主体性，但实际上却在硬灌输对西欧和先进国家抱幻想的事大主义。虽然大谈精神文明，但现实却强迫人们做物质文明的奴隶。”

这是天主教会的韩国天主教传布200周年纪念小册子《援救农民的司牧》中的一段。这是说明全斗焕集团的话和现实不一致的一段话。简直是盗贼反来讲正义，杀人者说教慈悲的世道。

4月14日下午，在汉城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大盗赵世衡”破坏拘留所牢房的气窗逃跑了。他轻巧麻利地干了这一切。可是19日上午，在他逃走后约过115小时的时候，又给抓住了。他在逃跑中，跑进一个人家，把一个高等学校学生作为人质，藏在浴室里，但挨了追捕的警察发射的3发子弹负伤，被捕了。

事件不过是冒险的单纯的逃跑未遂事件。但这个事件竟然使很多人(简直可以说是全体国民)闹腾起来了。

报上说,甚至有人给向警察告发盗贼藏处的市民的家打来了非难和嘲笑电话:“你以为姓赵的是那么坏的人吗?你得了多少偿?”报纸报道:“切不可将有11起前案的赵世衡当成义盗看待。”据说,对此读者纷纷打电话和写信,提出了抗议。

这倒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是专挑以舞弊行为和腐败手法致富的权势人家袭击的。他从阳台等的地方轻而易举地摸进去,防备再严也只用20分钟就干完事。因为遭到袭击的人家差不多都是比他大得多的“大盗贼”,所以很难向警察报盗案。如把被偷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就说:“这不是我们的东西。”人们看到他们“不贪财的样子”,不禁表示惊讶。可能是因为偷来的东西被偷的缘故吧。

大盗之间暂时更换了所有者,恐怕这样说更恰当。只看根据起诉书发表的东西也可以知道他偷的东西简直都是绚烂夺目的。5.75克拉的钻石、3.75克拉的钻石“帕太克”、“皮埃杰”、“克伦”等普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名牌高级手表。还有最高级的水貂大衣等等,简直数不胜数。越是高价货,就越难找到物主。据说,起诉书标明市价2,000万圆(日币约600万圆)的东西实际上是1亿圆。标明50万圆的“帕太克”,原是600万圆至3,000万圆的高价物品。据报道:“起诉书上标明一只200万圆的‘卡尔替’八角手表是在八角形的表壳周围镶着耀眼的钻石的珍品。”

警察方面公布其一部分说道,这类东西的物主是前国

会议员、高丽医院院长之流的属于特权阶层的人。但是，据国民中间纷纷传开的风闻，已公布的被偷物品的数字及其高价物品的种类、物主的名字是极少的一部分。尽管是这样的大事件，象口头禅似地叫嚷“消除舞弊、腐败”的那些统治者，却在保持沉默。可能是实际上他们在幕后策划了舞弊腐败的阴谋和强盗勾当的吧。他们本应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就拔出他们那个“宝剑”，大喊“要给他一个一刀两断”，可是他们却缄口不语。

觉得这事怪离奇，但看了公布出来的名字，不过是一些小喽啰而已。可是，汉城的街头巷尾流传的风闻说，全斗焕周围的掌权阶层和军人中有很多是大盗，和这事件有联系。

于是，5月2日，各报纸终于报道说，现任副总理金垞成这次也失盗，丢失宝石、贵金属和股票等共值5亿圆的东西。

这5亿圆，恐怕也是缩小到几分之一的数字。他不得不向新闻记者坦率地说，向警察报失盗的只有那些宝石之类，至于股票、房产和地产所有证、私人债权证书之类没有申报。据说，他还满不在乎地说：“这些虽然都是我的财产，但不能全部登在我的名下呀。这一点你该谅解。”尽管如此，他今天仍是副总理，在国会上还夸夸其谈哩。他也许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偷的不幸的人呢。不，因为他是与这个事件有关者，可能成了它的代表。

在韩国，有很多贵重品列入了禁止进口的项目，这是事实。禁止占有1克拉以上的钻石。但是，只要成为权贵，

就可以享有所欲为的越法特权。金垞成副总理之流不过是一个牺牲品而已。这种偷盗之风是从最高权贵层开始的。1980年，他们掌权后没多久，一起走私案被揭发了，那时拍卖的贵金属统统流入了他们权贵的手里。那时候还有过因不知这些实情而冒失地进行调查的警察和警察干部被罢免的事例。几乎确定的与这次事件有关的最高的权贵，是去年退出总统办公室首席秘书官地位的许和平、许三守这两个姓许的。据说，许和平现在应美国总统里根参与的赫里迪基财团的邀请，进行“研究工作”，许三守也在美国夏威夷伊斯特·威斯特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因此，在美国，人们说，那样的人物到底能研究什么学问，美国的研究机关竟堕落到那种地步了吗，并开始搞起驱逐他们的运动。原来是要把许三守派到驻日大使馆去的，但不知是因为日本政府有先见之明而没接受他人入境，还是他本人认为广阔的美国才是他躲避的宜地，那是不得而知的。

大盗贼的故事不止这些。连各报纸也报道舆论说，人们在开玩笑地解释赵世衡的名字说：“赵世衡是想把不公正的社会变成均衡的社会的。”人们还说，把他当做义贼是“民心”，他是韩国的罗宾·胡德，是洪吉童重返人世的。洪吉童传是17世纪初写的劫富济贫的义贼的故事。著者许筠这有名的儒学者，被扣上冤枉的罪名被处刑了。

赵世衡专在财主居住的地区行盗，挥金如土，但也接济过穷人。他绝对没有想伤害人命。于是，官吏们哭丧着脸说，他从来没有把钱财分给穷人，“真不知道为什么连言论也给人们以把他美化成义贼的印象”。国民在想，和那些

杀害和折磨许多国民来致富的大盗比起来，他是多么善良的人啊。报纸说，在没有英雄的这个时代，在市民看来，他是英雄好汉。报纸也不得不为“歪扭了的这个社会的心理”叹息。

赵世衡所以能够一时越狱成功，恐怕是因为有一些同情他的囚犯和狱外的人帮助了他。但是警察却在强调，这是他单独搞的行动。而且，他在再次被捕时，警察们不顾那个被他当做人质的高等学校学生的生命危险，发射了枪弹的事也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疑惑。现国会也把这事当做问题，有人提出把这样的警察提升一级也是个怪事。也有人说，对走进死胡同的罪犯怎么能开枪了呢？那是为了杀害赵世衡，从而淹没掉权贵与那贵金属之类失盗物品有很大联系的事实。

的确，这个大盗贼的故事，不能不说是象征今日韩国的事件。据说，有一个财阀的儿子由于企图把33万美元拿到美国去而被捕了。韩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三宝证券交易所被合并于东洋证券交易所了。仅据政府公布，这是因为197亿圆巨额款项不知去向，造成了资金困难。对此，现国会也非难说，事实上，权势方面与这件事也有关联。那是有权势的阶层硬把现款存起来，使它不顾交易上的损利、证券价格的涨落，用利息和工资的名目支付津贴的缘故。据说，那亏损不止197亿圆，而是象张玲子事件一样达到数千亿圆。

为了弥补这种亏损，政府在搞收购不动产，把它以高价出卖的把戏。也就是说，用近两倍的价格卖出去，收回

闲置资金。

国民对这种大盗贼把戏的愤怒越发增大。于是，权势方面照例疯狂地宣传说，北方已经做好了南侵的准备。5月初旬的一天，突然向全汉城市的居民保甲下了紧急集合令，并指示：“大批北方间谍钻进来了。要加强警戒。”那时，有很多市民低语说，又要来一次政变了。看样子，他们打算炮制出统一宪法，并向北方提出，而后就说，北方拒绝了，要只在南方实行，这样发动又一次的政变，以此来糟塌预定在第二年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因为，在现独裁体制下也一样，那无力的国会的经营和选举陷入了窘境。在国会咨询时也有人一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的风闻是否属实的问题，就被制止了。据报道，有一位执政党代表，也许是慑于越发增大的民心的愤怒，终于4月23日言明：

“如果不信任，开始怀疑起来，那是没有尽头的。据我所知，有不少人参加统一宪法的制定工作，已趋完成。……至少在政府或民正党内，没有人想出象在民间传播的那种修改宪法之说，只是这一点我可以断言。”

据说，这是所谓“没有修改宪法”的谈话。这话太使人疑惑不解了。民间的修改宪法之说和他们所说的修改宪法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他们本身也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政治危机是无法克服的。所以，可以说，他们要使出一切诡计发动又一个政变，这是事实。难道他们认为，那样就能够苟延残喘吗？我觉得那只能带来更大的破灭。因此，陆军总参谋长黄永时用在国会上作证言的形式威胁国民。他扬言说，陆军不仅在前方拥有“强有力的机动打击力量和用

最新装备武装的精锐特工部队”，“在后方地区，也组织军官民联合机动队等”来做好了对付万一的准备。“特别是，完全建立了以凶猛、慍悍而善攻的精锐将兵为主轴的首都防卫体制”。他夸耀说，把特别忠于他们的最新、最强的军队集结在汉城中心了。这不是对北方的共军说的话，而是全斗焕集团的军队冲着国民这个“敌人”胡诌的狂言。

然而，这不可以说是军人们在暴风前夕的恐惧中，为自相勉励，强硬保持“信心”而说的话吗？

禁忌对象——民众

在现今那样的国会上，有的议员还提出质问，说只要有“民众”这个词，一切书籍就被宣布为“禁书”，其理由何在？民众这个词成了禁忌对象。因此，带有批判情绪的人们爱用这个词，并高喊民众的思想。在这样严密的禁忌封锁之中，民众这个词的渗透力仍是很大的。它也许终将带来除非民主就不能治理国民的那种时代吧？这个民众当然不会拥有能与陆军总参谋长所说的“凶猛、慍悍的”“精锐特工部队”较量的武装。能够对抗那种暴力的武装力量是不会有。但是，反对非正义的暴力的那良心的呼声，也许可以比做点穿岩石的滴水。

元丰毛纺厂工会的8名被监禁者的斗争正可以说是那一滴水。4月30日第二次公审时做最后供述的前副支部长朴顺姬控诉：“强盗犯、杀人犯等一般囚犯允许同任何人会面，

也可以接收送进的东西，可以互通音信，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被限制了。我作为国民的一员，希望在监狱里也能够得到同样的待遇。”从这一天午间开始，他们8个人要求改善待遇，进行了绝食斗争。

他们提出，要允许同亲戚朋友会面，接收他们送来的东西，和他们进行书信来往，允许洗衣服，停止在监狱内的严密监视，允许送进在市内出售的一切图书等。他们以此为条件，从2月15日到19日，进行了5天的绝食斗争。因为当局答应上述要求，他们才停止了绝食斗争，结果只是会面的问题多少得到了解决，但其他的要求根本没有得到实现。他们当中有5个人在患病。其中的一个人在去年9月27日工会遭到暴徒们袭击时4天被关起来遭受暴行后，一直浑身疼痛难忍，下半身麻痹，难以走动。

尽管如此，当局根本不想给他们治疗。法庭上，坐满了曾对他们施加暴行的50多名暴徒。从元丰毛纺厂撵出来的工人都上了黑名单，因此，他们就职的门路给堵死了。下面援引一段他们在法庭上的最后供述。

“不会因为现政府破坏一个元丰毛纺厂工会，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就永远消失。我坚信：工人运动将以新的形式，在这个土地上更加活跃地开展起来。这个审判的最后结果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我们心里是决不会屈服的。希特勒政权当时当过审判官的人，在那个政权垮台后被判了无期徒刑。在审判战犯的法庭上，审判长说：‘你们做的审判的结果，虽然可以认为根据当时的现行法是正当的，但事实上不是杀害了无辜的国民吗？’据说，希特勒政权下的审

判官们哑口无言，低头走进了牢房。虽说，我们的行动与现行法相抵触，但那是因为法律错了，而不是我们的行动错了。”（前支部长方镛锡，男）

“我们决不屈服或失望。我想，为了让劳动者也能过上象人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工人运动将继续下去。我们今天冤枉地经受这种痛苦，将成为它的基础。……

“审判官大人，这里有更可悲、更痛心的事。我并不为坐牢而伤心。有许多劳动者为了糊口活命，因为穷，不得不过欺骗自己良心的生活。他们只能按照公司方面的指使行动，现在大家都为此感到痛苦。许多劳动者怕解雇，明明知道是不当的证据文件，却在上面盖章，今天他们为受到良心的责备而苦恼。”（前副支部长朴顺姬）

“我成为工会主席后，曾和经理见面，向他提出：‘让我们早日和平解决提高工资的问题，做出劳资协议的榜样吧。’那时经理说，他已递了辞呈，并说：‘一切都是上头的指示，不能随便搞。太叫人痛苦了。倒不如掀起一场大示威，被撵出去的好。’刚才在这里作证的梁炳旭（暴徒之一），我仍感到他很可怜。因为穷，为了那点钱，他才干了那种暴行。我是同情他的。”（工会主席郑贞顺）

“难道破坏民主的工会、只许御用工会存在是正义社会吗？难道工资逐年降低，工人的生计受到威胁也毫不关心的现社会是真正的幸福国家吗？这我不清楚。我衷心希望人人都和工人共患难的那种社会到来。圣经里面的一段记述与这个社会的面貌很相似，因此，我想在这里朗读一下：‘我曾向您诉说，有暴戾作祟，可是您为什么不帮助我？……’

坏人包围好人，正义事业被歪曲执行。”（工会副主席梁承化，男）

“检察官大人，你说什么我们使社会陷入了混乱，其实使社会陷入混乱的正是象检察官那样的人。”（委员车彦年）

“我希望我们背起最后的十字架，让劳动者不再为这类事情遭受痛苦。”（委员金淑子）

如上所述，法庭上，好象他们在审判人，而不是他们在受审判。5月7日，对他们判了1年到1年半的徒刑。对剩下的一些人，要在5月17日进行判决。一直注视这个法庭的家属们，在5月6日，发表了呼吁书。从中可以看出在全斗焕集团的暴力之下不法法庭面貌的一断。因此，下面引用一段。

我们通过审判看到和听到了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了对人们施加暴行的暴徒们在开庭之前，就从前门进去占了旁听席。我们也看到了检察官的厚颜无耻的嘴脸。他们就暴徒们的问题说：“因为都是些靠低薪生活的劳动者，没法叫他们交罚款，所以做了不起诉处分。”可是对那些被殴打而倒下去的人却说，他们“给社会造成了混乱”，“应该对他们判处2年至3年徒刑”。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毫无顾忌地判刑的审判官。事情也只能如此，因为审理这个案件的检察官金承年是地区劳动对策会议议员，对元丰毛纺厂问题早已插手。他亲口说，发生9·27暴力事件时，他曾在公司里的，他也就是指挥了暴行的元凶，当然无法对他自己动员来的暴徒给予处分。

看来对这种暴力支配进行抵抗的途径好象只有象绝食

斗争这种非暴力的良心的呼吁。在开始进行绝食斗争后，监狱的官吏硬说没有那回事。于是，5月12日，被监禁者家属15人在基督教会馆开始了绝食斗争。第二天，咸锡宪牧师、李文永教授等30人也参加了这个绝食斗争。为此，安全企划部（前身为中央情报部）提议，要进行协商处理问题。14日午前5点30分左右，300多名机动警察队袭击基督教会馆，把进行绝食斗争的人统统逮走了。警察们占据了阳台，还在建筑下面张了网，以防跳楼自杀。现在，有许多人仍在被拘留中。允许回家的人，却被完全软禁起来了。因为预定5月18日在光州举行迎接光州事件3周年的追悼礼拜，因此，这种事态可能将持续一个时期。

据说，在监狱里，由于有池学淳主教等人的探监说服，一些人停止了绝食斗争。但是，方镛锡却对教会方面不关心工人疾苦一事表示遗憾，没有听从他们的说服。他的夫人的说服也没有奏效。很多人表示忧虑，怕他采取1970年全泰一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而焚身自杀的那种抵抗方法。有一个与此有关的人说道：

“他提出了4项要求：撤销扼杀工人运动的政策；修改劳动法；对暴徒进行公正的审判；必须建立彰善阐恶，为民众雪恨的社会。这些条件是与全斗焕集团的劳动政策从根本上相抵触的。他也清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决心豁出生命，同它进行斗争。谁也无法预测，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人在心里想，在他死后将如何进行斗争。”

战争是手持武器的双方打的仗。而压迫，是一方有武

器，而另一方却赤手空拳的。在绝食斗争中死去。可以说，压迫比战争还要残酷。大盗贼掌握审判权，大谈和平和安全。这只是因为还没有受到历史和民众的惩罚。

被监禁者家属们可怜的诉怨声不断地发出来。所谓“南朝鲜民族解放战线事件”有关者的家属们为被监禁已5年的33人不断发出呼吁。所谓“全国民主学生联盟及全国民主工人联盟”事件有关者13人的家属也发出了呼吁。他们身体越来越衰弱，病人也越来越多，可是，暴力政权对此根本不理睬。

然而，他们对外想装出好象恢复了一些自由的样子。尤其是，因为10月里要在汉城举行各国议会联盟大会，要重新装饰一番。他们决定，不管大学里的示威搞得多么高潮，也不宣布停学。因为如果勒令停学，就会使人们认为全斗焕集团没有维持国内治安的实力。他们甚至劝诱曾被监禁的民主人士，同夫人去国外旅行。为的是，消除他们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并企图以允许有名人士到国外去旅行来宣传自由化。因此有人与这种“自由”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切事实，向国外报道的究竟有多少呢？驻在韩国的特派记者们，从他们也被关在韩国这座牢里的这一点上来看，也是和我们一样吧。年轻人的激烈抵抗、国民对当权者的强烈反对，恐怕都不曾被人知晓。因此，如果有一天这个政权垮台了，就会认为这个事件来得太突然，并表示惊讶，说原来是那么安定，那么巩固的政权啊。可能认为这事出于偶然，不会想到这是国民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浴血斗争带来的伟大胜利。

光州和汉城

5月上旬,由于截获中国民用飞机事件,喧闹了一阵,可以说,这个事件使他们一时成功地转移国民的视听。不过,那只是引起了人们一时的兴奋。不论对内或对外,它并不能为全斗焕集团带来什么成果。连报纸也报道了银行经营上出现的赤字。据说,银行收不回现款,就是接受了贷放的命令也因为资金涸竭,只好从外国银行引进短期投资和活期贷款。贷款的年利为10%,可是活期贷款则是13%。据政府本身向国会报告,在全国范围内每月所用的这类贷款达1,000亿圆,由于非法贷放,无从收回的资金愈益增多。可是,看来发财致富的大盗贼有增无减。据说,对这种世道的不满,首先在出租汽车司机中间爆发出来。有一个朋友说:

“那些有钱的家伙们因为这个世道不太平,可能要尽量多搜刮后,逃到美国去。出租汽车司机对世面动态最敏感。他们有时埋怨说,学生示威一爆发,这号买卖就做不了啦。可是如今却把希望寄予他们。对那些大盗贼,大家公开臭骂。出租汽车司机一听叫他们开到现代公寓或汉阳公寓去,就沉下脸。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乘客是住豪华邸舍的大盗贼。据说,在盖那种邸舍的土木建筑业部门干活的人们中间,有的竟暗暗地标上记号,说世道变了,这所房子就是我的。在这暗无天日的世道,许多人性情变得过激。如果这种性情爆发了,将会怎样呢?”

他还说,也可能美国和日本扶植大盗贼全斗焕集团,在背后干更大的盗贼勾当。但看来,民众死了心,认为美国、日本和军部是狼狈为奸的,所以再没有办法。只有学生们进行忘我的斗争。在学生的这些斗争中,有的可能还没有传到日本去。在这里介绍这些斗争之前,先谈谈光州的情况。预定在5月18日上午,在望月洞的光州事件牺牲者的莹地举行追悼仪式,下午在—光教会举行追悼礼拜,晚上在南洞的天主教堂举行追悼弥撒。这可以说是结束3年居丧的追悼仪式的吧。可是当局害怕光州和汉城取得联系,就软禁了汉城的大部分民主运动者。去年5月18日,政府为了诽谤基督教方面的追悼礼拜,把光州近郊的农民和预备役军人强制动员到光州公立体育场,举行了“道民团结会”。他们骂道,光州事件肯定是暴徒们搞的,追悼礼拜是要搞第二个光州事件的阴谋,是要把生命财产交给共产主义者的勾当。那时,他们急忙炮制了道厅协议会,可是遭到光州事件有关者和有良心的市民的攻击,不久就宣布解散了。

去年,11月,替代它,出现了由各机关负责人、企业家和教授组成的“地区开发协议会”。这个御用团体要搞的并不是地区开发,而是要除掉望月洞莹地。这是1980年发生光州事件后,由政府给修的公墓。当时当局宣称死难者只有127名。现在当局企图把它分散和消灭掉。遗属们每月在第三个礼拜天,聚集到这里。还每逢有意义的日子,人们聚在这里回忆当时的悲剧,为今天的现实而叹息。因此,当局企图把这个地方夷为无有,以便把那个事件从人们的记忆中涂掉。据说,地区开发协议会要用募捐36亿圆来促

进这项“工作”，现在已募捐了7,000多万圆。已经有4座坟墓被迁移到光州郊外去了。他们拿出50万圆迁葬费和赔偿金1,000万圆，逼遗属们迁葬。对那些不照办的遗属则施加种种压力。2月5日，全斗焕来光州时，在道厅就这个问题也作了强硬指示，并交给了巨额钱款。据说，其款额达6亿圆。他还指示那个协议会，对仍未痊愈的负伤者和成了残废不能工作的146人，要竭尽全力进行“和解”。

但是，光州的革命基地的性质是不能抹杀的。从5月11日到13日，光州全南大学学生们进行了强烈的反抗。据说，有一个人跳楼，被抬到医院去了，伤势甚重，处于绝望状态。全斗焕集团不得不经常为光州费神经。那是因为在民主化运动中，光州和汉城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纽带恐怕不是用疏散望月洞公墓的方法所能断绝的。

难道掌权者们是看不出这是以心脏、理念和热情结成的纽带吗？不能不说他们实在是个蠢货。他们认为，因为今春他们布下了严密监视和防范，所以不会有学生示威，可以太平无事地过关了。

正象他们曾用强奸来造成恐怖气氛的那样，断定，只要威胁说不择手段地进行蹂躏，抵抗就会消沉。但实际上，3月里一开学，学生的斗争却空前提早开始，而且越来越激烈。由于强奸而引起的学生们的愤怒与家长们的愤怒结合起来了。家长们愤怒地说，怎么能把女孩子送进数百名穿便衣的暴徒夹在学生当中乱窜的大学呢。去年，在梨花女子大学也发生了强奸事件。由于这个事件，在卫生间发现一个已成了尸体的学生。据说，在汉城大学有5名女生遭到

暴行。其中的两名已确认，可是有一名对暴露这个事件有顾虑。另一个人对作证没有顾虑。警察方面宣称，这是假冒的学生干出的作为，但是已证明这是骗人的。他们是以审讯为名逮去，干出了这种残忍的勾当的。他们要把入学的学生直到他们毕业那时刷掉30%，以此搞出没有示威的学校。但这个“英明的”意图，如今也引起了全面的反抗。对学习成绩是做相对的评价的，因此即使交再好的卷子也没法估计对它的评价。他们为强迫观念所驱，偷同学的本子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而且小组活动和体育活动，连想都不能想了。

这是一个互相敌视，互相竞争的场所。

约两个月前，天主教系统的西江大学，发生了一起学生刺死教师的事件。警察方面公布说，这是由于“精神失常”而酿成的，其实，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原因是一个学生两次得了不及格分数，对教师怀恨在心。

一切都可以用暴力解决这样一种对暴力的信仰，在到处招来破坏和弊端。学生们公然表示反抗说，全斗焕集团企图策划“在大学杀人”的诡计。大学里的反抗，今天与其说是由于政治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与年轻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产生的团结的行动。举例说，从5月12日到14日，在延世大学进行反抗的时候，近1万人参加了这个斗争。据说，在掷石战中，警察方面受伤的人更多。这是殊死的斗争。对这些事实，韩国各报一概保持沉默。是不是日本各报也这样？

学生们的策略也更加老练了。举例来说，当成均馆大学搞起激烈斗争的时候，机动警察队、武装警察队都涌到

这里来了，这时汉城大学又举行示威。而且，各地也展开小规模游击式的反抗。釜山大学、忠清南道大田的忠南大学也燃起了好久没有的斗争烽火。如今，安全企划部的家伙们也承认，用暴力整治学生已告失败了。不知这种事态将怎样发展下去，带来什么结果，何时何地引起什么事件。有风闻说，在汉城大学闹斗争时，有3名女学生企图割断血管自杀，使得斗争更趋高潮，那3名女学生立即送到医院去了。

学生的示威游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这么说也不是言过其实的。

在4·19前后，延世大学、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许多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他们的反抗燃烧着忿怒的烈火，国民越来越积极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斗争。

大盗贼的真面目败露无遗，斗争在逐步升级地扩大。学生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化了。原因是暴力统治好象垄断了正义、保安和安全似地横行霸道，大言不惭地叫嚷大盗贼的支配是为了实现自由和民主，学生们对此再也无法忍受了。在下面援引一段他们的主张。

今天，象幽灵似地飞来飞去的飞鸟，有一天气笛一鸣，就象蜂群一样涌在一起，挥动拳头。最可怕、最残暴的暴力无形中把我们的脖子越勒越紧。由于监察学校的行径横行，暴力不仅压迫我们的身体，而且压迫我们的头脑和胸膛，使我们感觉到“大学是监狱”这样的事实。……据那位

圣人说,除了他自己以外,全都是不纯分子,……“会觉察问题的学生”成了“有问题的学生”的今天,国民服兵役的神圣义务成了用来处分学生的“指导休学”,成了在任何法典里也没有记载的“预备扣留”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等等。加上,最近的风闻说,学校里发生并非由于陶醉于春光而吵闹的那种丑事。这里究竟是谁住的地方?

汉城大学是我们的基地

- 一、从冠岳向西南走15分钟,
冠岳山麓下的解放的故乡,
尽管那杂鸟群死气百赖地说它是它们的地,
汉城大学是我们的基地……
民主学友3,000名、御用教师500名,
那杂鸟有5,000只。
- 二、冠岳警察署、治安队、安全企划部、保安司令部、
催泪弹、相机、肉弹机动队尽管都来乱闹,
首都警备司令部来了以后,
深受感动返回去,
汉城大学是我们的基地。
南北分割37年,它是斗争的基地……
汉城大学是我们的秘密联络处。
- 三、5·17以后,硬说汉城大学
是他们自己的,岂有此理!

金相镇、金泰勋（两人都是曾以自尽表示反抗的
汉城大学学生）

在黄泉之下怒吼：汉城大学是民主的基地。

硬说5·17后到来了新时代，

这是无可忍受的。

5,000名光州市民在黄泉下怒吼：

汉城大学是我们的基地。

（摘自1983年4月11日汉城大学《民主广场》）

满腔愤怒的4月革命的喊声，今年也传出来了。当年
血泪汪汪的恸哭声为我们沉默而慨叹。我们的祖国被买办
资本、法西斯独裁所愚弄的今天，连我们也要被那盲目的数
字——课目分数所玩弄和欺骗吗？难道没有听见学友们凄
切的呐喊吗？学友们哟，要勇往直前，用我们的双手在这
块土地上争取殷切盼望的民主化……（摘自1983年4月12
日的淑明女子大学全体民主学友的《维护民众、民族、民主
斗争宣言》）

我们要自觉到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建立更加民主的
社会的使命，反抗反民众、反民族的全斗焕政权的独裁。历
史和民众将证明我们是正义的。

我们的要求：

- 1、释放4月7日拘禁的3名学生；
- 2、立即废除毕业定员制；
- 3、反对机关人员潜入学校；

- 4、接连不断地镇压学校的文教部长李奎浩滚下台去；
- 5、要求对镇压学校表示同感的御用教师辞退。

（摘自1983年4月13日梨花女子大学全体民主学友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烈火永远燃烧》）

民主学友们！

维护民族和民主的先锋、沿着先辈们持续不断的火热斗争的足迹，高举真理的火炬的民主学友们！今天，我们总结至今的斗争，要把应反省的问题摊出来，进行批判，把它当做今后斗争的基石。在总结的第一阶段，要把我们的敌人弄清楚。正如已经谈到的一样，我们一直议论的问题是起因于政权的本质的。另外，从这个学期的初期起一直暴露出来的现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反民族、反民众的性质很好地说明了谁是敌人。从今以后，我们的斗争要进一步发展起来集中于反法西斯斗争。……

民主学友们！

我们的斗争是以历史和民众的名义谴责虚假的斗争。只有我们在斗争中打先锋，在他们所进行的有组织的宣传和思想攻势下，被迫歪曲了意识的民众才能认识到真正的现实，一同站到斗争队伍里来。学友们！当我们的意志紧密地团结起来的时候，催泪弹、木棒和残酷的惩戒都不能给我们带来被害意识，反而会使我们勒紧运动的缰绳。（摘自1983年4月13日，汉城大学全体民主学友的《目前正是要我们表明立场的时候》）

我们克服种种困难考进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所想象的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呢？难道我们想象的不是为民族和历史着想，生动活泼的批判性的学问盛行，在学友中间不断进行讨论和对话的地方吗？难道不是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进行观察、设计和实践的地方吗？……3月间，包括我们延世大学的同学在内的两名同学曾企图过自杀。那是因为虽然他们抱着远大理想进了大学，可是由于毕业定员制，象狗一样被撵了出来。……在树立学习风气的借口下，把图书馆搞得象再修生（考大学落第，为再考而自修的人）的图书室一样。……我们为了不被撵出学校，把同学视为仇敌，把那些学生必读的自由的书看作是降低成绩的毒素来回避，优和不及格的分数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只有为了在这块土地上恢复真正的民众的民主，继续参加反对暴力独裁政权的斗争，以团结为重不断成长的知识分子才能实现大学的民主化。只有这股团结的力量扩大到社会，才能在这个土地上实现民主化。（摘自1983年4月21日延世大学的《民主之春死灭了吗——回顾浴血斗争的4月》）

必须在5月的斗争中，用实践来纠正在对3、4月的工作的评价和反省中提到的问题（即未能得到学生群众的信任的问题，没能以强奸等具体问题为中心展开斗争的问题，参加斗争的人们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的问题，学生群众和学生代表机构的关系不够圆满的问题，未能克服失败情绪和恐惧心理的问题）。……在5月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首先

要揭露对女学生的凌辱事件的本质。不是由警察和学校当局，而是要由民主学生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成为查明事件真相的工作的主体。参加“协作精神83”军事演习的一群美军，对京畿道利川邑女子商业高等学校学生进行的集体凌辱事件，是掠夺韩国民众的基本元凶美帝国主义利用全斗焕法西斯政权的暴戾来践踏韩国半岛的代表性事件。我们在当前的5月的斗争中，将把诸如此类的一系列事件看作是最具体地反映法西斯政权的暴戾的问题揭露出来。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把上述的斗争同由于光州抗争和金泰勋烈士之死而引起的反对韩国法西斯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是我们的任务。（摘自1983年5月3日的汉城大学全体民主学友的《听吧，斗争着的人们》）

光州和汉城越来越紧密地联结起来了。

这是因为被屠杀的人们的血在地下呐喊，并推动人们去争取民主。全斗焕集团的真面目越来越大白于世，使民众的忿怒开始燃烧起来。也许有人会讥笑，争取民主的武器只有不屈服的语言和绝食斗争之类的消极手段。但那是不可小看的道义的力量。今后，这个道义的力量必须对于被称为御用教师的人们、满足于很高的收入的基督教教职者发生影响。

那道义上的忿怒和国民的反对，也将粉碎今天的暴力统治。这终将发展成为国民再不容许军人的暴力统治的决心和行动。那无疑是能点穿岩石的滴水。

推动时代前进的人们

1983年6月19日讯

暴力在逐步升级地扩大

初夏，无雨而闷热的天气持续着，象在汗蒸汤里一样闷热难忍，然而，暴力在逐步升级地扩大，而我们只能抑制着愤怒，静静地注视它。

陆军总参谋长威胁国民，说，不仅在前线部署了精锐特工队，在后方也设置军官民联合机动队，以“凶猛、强悍而善攻的精锐将兵”为中心建立了首都防卫体制。并恫吓说，对于国民的不满和抵抗，能够毫不踌躇地动员任何暴力。法西斯分子只靠暴力体制——国家这个暴力机构和法律体系是不可能维持权力的。若不使国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暴力的威胁是不行的。在汉城大学发生的强奸女学生的事件，也可以说，事实上是由当权者制造的。意思是说，如果怕强奸，那就老老实实地呆着。

这个社会已经很久以来就不说真话了。当权者嘴上说的不是话，而不过是暴力而已。他们不仅叫嚷保安或反共，甚至有时大谈民族精神、幸福、正义、民主，但这与他们的

行动是毫无共同点的。如果说出的话是真诚的，那么人们是可以协助的。但是因为这样乱放暴力言词，人们只有战栗不止。他们是要人们屏息着怪自己八字不好，对于现实逆来顺受。今天这个国家的言论，只是重弹这种滥调，夸大地散布当权者的暴力言词。那些完全置于当权者控制之下，对当权者唯命是从的报纸，6月初，接连大加报道机动警察队的暴行，说“醉醺醺的武装警察”又对行人施加暴行，对妇女暴行未遂等等。行人牙齿被打断，倒在路上，劝阻的人也受了重伤。为什么不掩盖这种事件，反而连日报道呢？直到现在，武装警察的战场是大学区。他们是要向一般市民也显示其“威力”的吗？可能是要大大显示一下陆军总参谋长大肆叫嚷的部署了“凶猛、强悍而善攻的将兵”这一事实的吧。反对这种当权者的斗争，不是单纯的反对当权者的斗争。到了现在，这不是单纯地争取民主化的政治斗争，而是反对强盗和杀人者的良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地进行自卫的斗争。因此，我们就抱有与恶作对的自豪感和道义上的骄傲，并确信国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这长期的斗争中，民主力量中也出现一种颓废现象。有些人因为太疲倦太痛苦，变成了酒徒。幸亏有新的年轻人们出现，把那些人挤掉。在大学变成不能自由学习的兵营以后，地下大学活跃起来了。他们有他们的课程。也就是先读李永禧写的《理性和偶象》，其次读宋建镐写的《论韩国现代史》或俞仁浩写的《韩国经济的实象和虚象》。

他们分阶段读这些书以后进行讨论。在学校里不读这

些书，就会失去生气，畏缩起来。由于有这些提高了觉悟的学生，大学在不断地进行抵抗。所以，最近的抵抗是由大学3、4年级学生等高年级学生来计划并领导的。他们不象过去那样，在1、2年级时搞示威斗争，在3、4年级时埋头学习，毕业后，适应这个社会，弄到较好的职业。因为有这样的学生，各出版社在被容许的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出版批判性书籍。所以这样做，当然和有利于生意有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认为这种出版工作是有意义的。当权者对学生施加压力，录取多于招收定员的学生，然后在校期间刷掉30%，并“期待”实行这个新制度以后，学生升到毕业班，大学就会“平静无事”。舆论大发议论，说这个制度促使大学死灭，但是当权者决不想让步。他们并不是要改革体制，而是要搜出和除掉“罪犯”。他们再没有别的统治方法。

年轻人和知识分子认为，这种政权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在它的背后有军部，那后面又有美国和由美国操纵的所谓“自由阵营”。据说，为了给这个面临崩溃的暴力政权打气，明春，英国的撒切尔总理邀请全斗焕。如果全斗焕要去欧洲，也该访问法国和西德。他们可能认为，如果里根政府这样给他撑腰抬高他的身价，全斗焕集团就可以苟延残喘。他们要这样唆使愚蠢的当权者来统治前驻韩美军司令曾失言地叫做“野鼠”的这个国家的国民。如果他们绞尽脑汁想出的最明智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岂不可可以说他们也同样是非常愚蠢的家伙吗？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人们全面否定过一天算一天的体制，认为不摆脱美国的羁绊，就没有祖国的未来，这是

理所当然的。青年们虽然提出民主化这个较温和的主张，但看来，在他们中间，改革派思想已经让出了位置，而革命派思想占上风了。一位大学里的朋友谈到这种情况时评论道：

“美国根本不把韩国的民主化放在眼里，打算放任国民做‘野鼠’。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变得激进，贫穷的人们用完全不信任的眼光看体制，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要分清是或非的问题，也不是论它是否符合现实的问题，而是面对仍然存在的这种现实怎么办的问题。5月下旬，延世大学的学生举行大示威的时候，朝武装警察扔出了啤酒瓶，并大声喊道，下回瓶里说不定要装上什么东西。这可能是在暗示火焰瓶……”

美国认为，如果说韩国有力量，那就是军队的力量。只要美国继续保持这种不道德、不现实的姿势，韩国民众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激进化。那位朋友接着说：

“为了压制抵抗，只有暴力在逐步升级地扩大。美国不想为韩国的民主化而施加压力。抵抗的人们清楚地知道，以美国和韩国军部的联合势力为敌进行斗争，决不是容易的事。但他们认为，除了斗争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他们还认为，这个斗争不可能当代就结束，而可能要一直持续到下一代。因此他们决心，要度过充满光荣的苦难的时代。激进化了的年轻的人们实际上继承了这个斗争。不仅如此，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斗争不是单纯地只变革这个民族的历史的斗争，而是变革全世界的斗争的一环。美国很愚蠢，被当前的利益蒙昏了眼睛。富者都是那样。他们只知道刀

枪的力量，而不知道金大中和金泳三能够使数百万国民沸腾起来，下定为祖国献身奋斗的新的决心的这一民族的力量。因为害怕这种力量，才同全斗焕这一愚蠢而残忍的家伙携起了手。”

民主化斗争的失败鼓起人们搞革命的热情。这会不会招致大悲剧呢？难道现在，抗拒暴力的道路、实现民主化和改革的道路真的被堵塞了吗？

兵营化了的大学

5月和6月也接连发生了学生的示威和抗拒。例如：5月4日高丽大学，4日和6日在忠清南道大田的忠南大学，9日在汉城的汉阳大学，10日和11日西江大学和在全罗南道光州的全南大学，12日全南大学，13日汉城大学，18日成均馆大学的水原分校和高丽大学，19日高丽大学，23日庆熙大学和成均馆大学，24日汉城大学，25日梨花女大、中央大学、成均馆大学、汉城大学和光云大学，26日高丽大学，27日和30日汉城大学和建国大学，6月1日中央大学，3日延世大学，4日中央大学，8日汉城大学和崇田大学以及汉城农业大学，12日崇田大学，14日梨花女大，等等。斗争和抗拒这样接连不断，而且其规模越来越扩大。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被捕的学生有70多名。据说，从3月新学期开始以后到6月初，被捕的学生共达235名。这样，如今政治犯剧增到将近600名。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关于勇敢的人的

故事。一个延世大学学生在受警察的审讯的时候，逃出来又参加了示威，但在示威中又被捕了。据说，他对审讯官答道，只参加一次示威就被捕还象话吗？西大门警察署把16名延世大学学生抓来，说如果你们说在示威中没有起主动作用，就用“训斥释放”的形式释放你们。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监狱里挤满了政治犯，就很难办。但两个学生固执地说，他们是主动人物，拒不接受“训斥释放”。据说，近来军人和官吏的子弟积极参加示威。

学生公然宣称要在5月26日在东大门附近，27日在汉城繁华的光化门大街集合，举行示威。因此，在这两天里，几千名武装警察麇集在这个附近。26日，学生们利用杂踏混乱的下班时间，拥向了和平市场方面；在清凉里，举行了游击式的示威，砸碎了执政党——民正党支部建筑的玻璃窗。27日，学生们乘黑夜行动起来了。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逮捕了所有的年轻人，一直到深夜。在钟路三街，学生们举行了游击式的示威。

看来，今春的学生示威搞到这种程度，再次处于沉默和潜伏状态。全斗焕集团估计到，一到秋天，学生的抵抗将进一步扩大，所以为对付它要加强暴力。

在这次连日发生的示威中最令人注目的是5月24日汉城大学举行的示威。这不是单纯的破坏、纵火事件。学生们打破行政管理室的玻璃窗，把屋里的文件拿到外边烧掉了。他们慎重地只把文件挑出来烧掉了。这个文件是叫做学生身分调查报告的有关监视学生的情报文件。于是，当局出动暴徒集团——所谓三清教育队，对学生施加了暴行，但没能

收拾局面，于是这回又投入乘5辆载重汽车来的300名左右的武装警察，完全包围了闹事地点的附近，并逮捕450名左右的学生，对200名学生进行了严格的调查。看来有很多学生为这个事件被监禁了。这里引用学生们发出的声明的一部分。

“最近，同日本相勾结，用80%的日本资本和20%的韩国资本在济州岛办起观光旅社等，在开辟国际观光地、国际贸易港的名目下，企图积极开辟卖淫观光地。（摘自4月27日忠南大学的《致忠大民主青年的良心宣言》）

“我们记得很清楚，制造血腥的光州事件的令人发指的元凶是全斗焕法西斯统治集团和唆使他们的美国。我们反对企图使反民族、反民主的分割永久化的南北交叉承认。民族统一是只有确立真正的民主之后才能实现的。打倒阻挠它的军部法西斯政权，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摘自5月16日中央大学全体民主学友的《准备迎来韩国民主化的春天》）

“同学们，社会上一攫千金主义、拜金主义在猖獗，并蔓延到校内，使大学文化也被污染了。传统的文化和民族的正气处在存亡的岔路口上。这个时候，全斗焕独裁集团宣传不知是“88奥林匹克”，还是卖国体育场的东西，叫嚷什么观光韩国，企图以国际观光的名义动员我们的母亲和姐妹，来办嫖妓观光、卖淫观光。到了1988年，不就又要出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挺身队吗？同学们，这一切

社会的病态现象能够同政权的本质或经济结构的矛盾分开来谈吗？要打倒对强大国卑躬屈节，阿谀奉承，对国民实行非人的政策的全斗焕军部独裁政权，争取这块土地上的民主。”（摘自5月18日成均馆大学的《为了这块土地上的民主》）

“白天昏暗，黑夜漫长，
被虚伪和欺骗折磨的兄弟们，
向前，向前，冲破这个黑暗，
属于我们的，要由我们去找。

.....

三千万民族跟在后面，
啊，为自由而流了血的这块土地，
胜利的黎明来临。”

（摘自5月23日以庆熙大学学生名义出的《历史啊，你要叙述被践踏的河山》）

最后的庆熙大学声明，是4个学生写明自己姓名的。这个声明首先严厉谴责了“以美国、日本、韩国之序形成的主从的联盟关系”。附加在这个声明的《庆熙学园自律化宣言书》，谴责了去年10月很多学生由于暴力而流血的事件，并说明了今天韩国的大学面临的实际情况。还谈到了“根据叫做教师推荐制的个别卡片制，连学生的脸都不认识的教师掌握和填写学生的国家观、赏罚关系、校内活动这种充满矛盾的政策”。并写道：由于刷掉30%来保证毕业定员的做法，“在木浦发生了对教师进行集体殴打的事件；在延世

大学、外语大学、天主教医科大学，发生了悲观自杀的事件；在庆熙大学，由于开除7名牙科系学生，家长和学校当局之间发生了争斗”。据说，各大学实行了“校内言论的事先检查”。不仅如此，“校内外10名以上的集会、校内广告、印刷品的分发、外部人士的邀请等都必须事先得到批准”。学生们就是为反对这种象监狱或兵营一样的大学而斗争。特别是在最近的斗争中，也有很多女学生被捕了。年轻人是忍受不了耻辱的。一个学生就今天的实际情况说道：

“或许装没看见，得过且过，就行了，可是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在校内，暴徒象在自己的天下似地横行霸道，机关人员在干出暴行，进行强奸。对于我们任何小小的活动，都依法论罪，而对他们干出的行径则根本不当做问题。我们不能卑鄙到对此容忍和保持沉默的地步。我想起了跟着希特勒走的德国国民猖狂肆虐的残忍性。可怕的统治是产生那么可怕的国民的。今天我们就是要拒绝做那种人。”

可是，实际上不是在国民中间出现顺从那样可怖的体制的现象吗？这么一问，他就很有趣地答道：

“御用教师之类可能会那样，可是几乎所有的人心里都反对那样做。我们的国民是不会做象德国法西斯分子那样残忍的疯子的，而且也不会有驱赶他们象疯子一样进行侵略的事。不过，在这样的时代，国民容易失去目的和目标，变得不道德。他们可能会认为，诚实地活下去是毫无意义的事。我认为，对大多数韩国人来说，这是个问题。也许可以说，诚实地活下去，这意味着失败和死亡。我们国民是热情的国民。但这个热情不是用于正确的方向，而是用

于可怖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争斗。现在没有可以防止这种现象的精神、力量和秩序。权力和法律都站在强食的一边。都急红了眼，简直是一团糟。在这里，推动这个时代前进的人们不能不采取殉教者的姿势。一贯地坚持这种精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光州事件三周祭

过了三周祭，就结束居丧3年。光州—光教会举行了有2,000人参加的“光州民众起义三周年追悼礼拜”。

汉城有很多人要到光州去，但他们都被软禁在自家里了。有的被拉到乡村去呆了3~4天。预定在追悼礼拜进行说教的文益焕牧师也被软禁在自家里，没能参加。于是他先动手，把录好他的说教的胶带送去了。另一方面，韩国基督教协议会总务金昭英突然出现在会场，进行说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据说，葬着牺牲者中的127名的光州望月公墓，如今变成了圣地。这天也有几千人从大清早来到这个圣地扫墓奠祭。当局要破坏这个圣地的计划正在付诸实践。1980年发生事件当时，为了安抚民心，修了这个圣地，以图使人相信死者就是这些。但如今当局却把它当做眼中钉，劝诱迁葬，并说如果答应，就发1,000万圆。已经有6个坟墓迁走了。

因此，在追悼礼拜上，遗属们高呼要取消这种计划，并

要求当局公开光州事件的真相,接济受伤者,让因这个事件被放逐的人们回到原工作岗位。遗属们的请愿书里还有如下的一段:

“正如5·18光州事件不是暴动一样,我们遗属也不是不纯分子。但是当局把我们当做有犯了可怕的罪行的前案者,如有小小的事件发生,就视为罪人,频繁地到我们的工作岗位或家里来逼我们写坦白书之类的东西,真是无法无天。进而,如有政府的高级官吏到光州来,就从几天前起把情报员派到每家来监视,或者绑架到别的地区去,干出简直不能容忍的野蛮暴行。实在令人痛心。我们要求改正这种做法。”

在光州事件当时受伤,卧病不起,或者成了残废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中,至今为人知晓的有178名。政府如今还把他們当做暴徒对待,不想做任何补偿。对于这些人应采取紧急措施。这次三周祭的那天,以他们为中心的500人举行了特别追悼礼拜。

5月18日晚7点钟,天主教方面在光州南涧圣堂做了追悼弥撒。2,000名参加者静听了尹共熙大主教的演讲。演讲内容充满着悲叹,说不恢复言论自由,不杜绝拷问,换句话说来说,只要新时代不到来,光州事件的真相就不能得到澄清。这天天主教光州大教区司祭团的声明《值此光州事件3周年》,对于在市民起义中牺牲在暴力之下的人们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安慰。这是向这个黑暗时代挑战的勇敢的呼声。这里介绍这个声明的全文:

“今天我们迎接民族的悲剧——应受到国家保护的国

民被国家遗弃，国民的生命遭到刀枪残酷杀伤和摧残的1980年5月18日发生的光州事件3周年。

“首先，愿在主持正义和真理，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牺牲的人们永远安息，并祝受伤者和所有的市民充满怨恨的心蒙受上帝的抚慰。

“光州事件的历史意义是：上帝培植在人的良心的自由和真实、正义和爱，不是任何武力、任何权力所能扼杀的，只有它得到实现才能带来民族光明的前途。我们迎接光州事件3周年，把这个意义再次铭刻在心里，希望这种民族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在这些日子里，每逢有机会，我们司祭团就要求澄清光州事件的真相，追究责任，保障市民复职、学生复学，对受伤者予以补偿和治疗，对死亡者给予适当的补偿并以礼相待。并且要求通过它的实现，谋求民族的和解和团结。但是，时过3年的今天，光州事件的历史真相依然没有澄清，被掩盖和歪曲。由于对崔基植神父的不当的逮捕和判决、朴宽贤的死、不断的学生骚乱、日益加甚的暗中镇压和情报监察，市民忧郁的心总不能开朗，对于不幸的根源——现实深表忧虑。

“我们相信，只有实现民族和解和团结，才能妥善处理成为民族的悲剧和考验的光州事件，能够保证国民的生存权。为此，只有对此负有责任的当事者抱着赎罪的心情，在民族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才能实行能够克服分裂我们社会的不信任的思潮和机会主义的、正确而认真负责的政治。

“而且认为，只有有凭良心思考和说话的权利、为共

同的正义事业而行动的权利以及探知和告知的权利得到保障的真正的言论自由，曾同光州事件的牺牲者一起坚守和一起向往实现的自由民主，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我们向为爱和正义、自由和民主而曾不惜付出任何牺牲的牺牲者的崇高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并坚信，当民族史上的悲剧和考验——光州事件的历史意义载入民族史册里，全体国民在这个历史事实面前，以赎罪和反省的态度生活的时候，才能保障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骄傲，才能建设正义象河水一样满溢的社会。”

对此，实行暴力的当权者能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呢？他们要永远给那些牺牲者打上暴徒的烙印吗？他们可能认为，不这样做，他们就不能维持下去。这样，他们只好永远成为对光州深切关心的民族的敌人。

金泳三的斗争

当学生的斗争继续不断、光州事件3周年已经来临、国民对当权者的非难的呼声日益高昂的时候，尤其在全斗焕集团企图修改宪法来延长政权的残命的风闻流传的时候，前新民党总裁金泳三虽然政治活动被限制并软禁在自家里，但还是开始了斗争。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就这样不能不象殉教者那样行动，不知这种事态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里首先引用他关于绝食斗争的声明。

面临绝食

各位国民！

我在前不久发表的《告国民书》里，对于今天的现实做了概括的分析，揭露了现政权的阴谋、建立长期军事独裁体制的企图，并号召为粉碎这种阴谋，国民要提高觉悟，民主人士要一致团结起来。今天，我为向国民明确我的意图，坚定我对民主化斗争的决心，宣布进入绝食斗争。5·17政变不仅完全破坏和否定了民主，而且造成了那些要求民主化的几百几千的民主市民在光州残遭杀伤的事态。我进行绝食斗争，正是为对此表示负咎和忏悔。对于因这个悲剧性光州事件而丧命的灵魂、在那里被杀伤的民主市民以及他们的家属经受的痛苦，我不能袖手旁观。而且我进行绝食斗争，是为了对于反民主的独裁政权的强化、蹂躏人权、政治镇压表示抗议和谴责，也是为了表明我的政治要求：为了确立民主政治，要尽快采取措施，哪怕最低限度的措施也好。我下这样的决心，来奉告国民，从今以后，我们不得不豁出命来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能争取民主化，同时，以此表示我的决心。

亲爱的各位国民：

我要牢记，我所以能够迄今的30年来作为这个国家的在野党政治人致力于反对独裁政治，确立民主政治，是因为有国民各位的支持和声援，并再次由衷地表示谢意。

在极为凄惨的维新独裁达到顶点的时期和末期，特别是直到10·26事件(1979年独裁者朴正熙被杀害的事件——编者注)发生的期间里，各位国民给予我和新民党的积极的

鼓励和声援，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没能更有效地进行争取民主化的斗争，而且因为这个缘故，没能把几乎确定不移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民主掌握到我们手里，辜负了国民的期望，对此我感到惭愧，心焦如焚。

现在我确信，我最后报答各位国民的支持和声援的道路，就是为扭转我们面临的国家和民族的危机，而俯首献身于民主化斗争，并坚定决心，献出自己的一切，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化而斗争。我清楚地知道在这次绝食斗争中也有丧命的可能。我认为，如果我献出我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多少有所贡献，那么，这就是我对国家和国民的最后一次服务，因此我想甘愿领受一切。因为这是用更坚定的信念，更有力地进行民主化斗争的绝食斗争，所以我对我自己和国民表明我为争取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我希望，即使大家听到关于我的任何消息，也不要有所顾虑，也不要悲伤，只管表明我们国民对民主化的热情和坚定不移的决心。这就是我的呼吁和愿望。

1983年5月18日

金泳三

金泳三这样在迎接光州事件3周年的5月18日投入了无限期绝食斗争。28日，当局硬把他抬到汉城大学医院去了。5月30日，政府惊恐万状，通知他，解除自家软禁，允许他自由地到外国去旅行。第二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是，在国内，关于他进行绝食斗争的消息，到6月9日才进行了

报道,也就是经过23天中断绝食以后才报道的。还公布说,决定于6月13日召开临时国会,就对被限制政治活动的人解除其限制等问题进行讨论。

金泳三已经在5月2日非公开地发表了有10页的批判性文章《告国民书》。这里引用其开头部分:

“现在我被软禁在汉城上道洞的自家里,不仅不能走出门外,而且外部人士对我的访问也完全被封锁了,同外部的一切关系被割断了。当权者派来的警察和情报员严密地包围了我的家,监视我在家里的动向。我的房子虽然没有安铁栅栏,但象是监禁我的牢房。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写无法知道能否传到诸位国民那里的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他吐露了出自1979年10月朴正熙死后未能防止军部独裁抬头的“忏悔和负咎”的痛苦。他说,因此他“作为被束缚的人,只是为谈这个时代的真实而说话,而不是特意为个人的某种荣誉和欲望”而说话。他还写道,目前,全斗焕集团提出了“先进祖国”的口号,但是,不就是他们使祖国的历史倒退了20年吗?在光州屠杀了同族,“怎么还敢大言不惭地讲什么民主和正义、民族和幸福、先进国家之类的话呢?掩盖那种残忍性而诞生的政权怎么能主张道德性、正当性和正统性呢?”

他谈了扼杀了民主的一切可能性的现状、御用化了的言论和日常化了的拷问以及经济、外交、保安等问题。

他谴责说,全斗焕政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也会策划长期执政的阴谋,并号召国民对这一严重的危机提高警惕。他说,对于这一长期执政的企图,我们不能不豁出命

进行斗争。还附带地说，“就现在我的心情来说，早已丢掉了对政权的依恋”。他只是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还诘问“现政权当局的真意”，并提出了5点提议。下面引用其全文：

1、必须在承认民主化宣言的同时，全部释放为反对独裁政治、确立民主政治而斗争中被监禁的学生、宗教徒、知识分子和工人。

2、必须保障为政治活动限制法所束缚的所有政治人士、民主市民的政治活动。

3、必须保证因政治上的理由而被撵出学校和工作单位的教师、学生、工人回原单位。要对维新政权以来由于政治镇压而公民权受到限制的人们采取全面恢复权利的措施。

4、必须保障言论自由，取消合并或封闭言论机关的措施。要保证建立维新政权以后由于不当的理由而失业的言论界人士光荣复职，并保证自由开办民间广播电台以及基督教广播电台恢复正常职能。

5、现行宪法是与5·17以前根据国民的协议制定的有关直接选举总统的国民的意志相违背的宪法，是对国民的基本权利附有保留条款的宪法，是实际上无异于维新独裁体制的独裁宪法。必须立即修改现行宪法。必须按照承认国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方向修改宪法，这是很清楚的事。而且要对于维新时代以来的反民主的反动法进行民主改革，同时要把所谓保卫国家立法会议制定的各种反民主的反动法，如为刷新政治风土的特别措施法、言论基本法、关于

144

集会及示威的法律、国家保安法、国会法、总统选举法、国会议员选举法、工会法等加以废除，或者使其恢复原状。这种法律必须进行修改，同时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无效。

这样，金泳三抱着豁出命的决心开始了绝食斗争。为此，6月1日被禁止政治活动的前新民党所属国会议员和党的干部39名，组成“金泳三总裁绝食对策委员会”，决定为实现金泳三提出的5点提议而斗争。当天包括这39名在内的109名又组织“民主国民协议会”，表明了同样的决心。6月9日，金泳三在有許多忠告和压力加重的复杂情况下，暂时停止绝食，表明了用新的方式继续开展反独裁斗争的决心。

5月31日，咸锡宪、文益焕、李文永、芮春浩、洪南淳支持金泳三的绝食斗争，在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人权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紧急民主宣言》，投入了绝食斗争。但是这5个人，当天下午3点，在1,300名机动警察和便衣警察的包围下，从人权委员会的办公室被拉出来送到自家去软禁了。6月3日，前统一社会党领导人金哲也参加了这一绝食斗争。6月9日，人权委员会委员15名进行了24小时的绝食斗争。16日，政治犯家属30多名也结束礼拜四祷告会以后，在人权委员会办公室开始了绝食斗争。但在17日下午两点，他们也被拖出来了。在这些日子里，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支持他们的斗争，并对他们的健康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特别是，在这次绝食斗争期间发生的两起暴力事件激起了教会方面更大的愤怒。6月3日，在松岩新教教会，基督

教青年聘请前汉阳大学教授李泳禧，举办了以《韩日协定后的19年和今日的韩日关系以及基督教青年的决心》为题的报告。与会者约有1,500名。当报告会结束后会场里剩下200多名的时候，机动警察队一面发射催泪弹一面闯进会场，破坏了教会的门和窗户，踩坏了讲台，甚至殴打了牧师。另一起是，6月10日，9个神学校联合举行的体育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机动警察队袭击1,000多名学生，甚至殴打了教员的事件。机动警察队和便衣警察是从开始体育大会的时候起就动员起来摆开阵势的。这是当局的暴力故意刺激和袭击学生的事件。当然，这是他们要显示“凶猛、强悍而善攻的精锐将兵”的存在的。不能不说，今后教会针对由这种事件引起的愤怒和抗议的呼声，如何采取相应措施，是个重大的问题。

6月18日，咸锡宪等5名停止绝食斗争，发表了《第二紧急民主宣言》。宣言对远远超过朴正熙体制的暴力和无法无天表示慨叹，并再次谈到了推动这个时代前进的痛苦。宣言最后谈到，从日本的基督教徒进行绝食斗争来表示的声援，澳大利亚世界传教会的帮助，住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地的同胞进行绝食斗争来表示的声援中，“感受了火热的同志友爱并表示了谢意”。

也许可以说，这样就算重又平静下来了。据说，在国会正在讨论对受到政治活动限制的人的解除等问题，但这不过是希望平息热潮，争取时间的把戏而已。暴力在耀武扬威似地横行霸道，逐步升级地猖狂肆虐。他们重新拿出朴正熙时代制定的有关把反政府印刷品交给外国人的行为

规定为国家冒渎罪的法律，加剧紧张状态。这已是实际上没有运用过的具文。6月17日各报报道说，金泳三的秘书室长金德龙因犯了这条法律被捕了。金泳三的这次斗争，首先大大刺激了由于政治活动的限制而萎缩的在野党政治活动家。人们都认为，本来稳健、慎重、很容易保持沉默的金泳三这次展开的绝食斗争，将成为他今后斗争的序曲。如果他在国内，金大中在国外展开斗争，并在这斗争中相互朝着民主化这个最高的目标发扬谦让的精神，大大加强团结的话，可以说事情完成了一半。我恳切地希望，金泳三的这次斗争能够带来这种局面。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在失去从1979年开始持续到1980年初这一极短的汉城的春天以后经历的苦难的3年当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在这一段严酷的冬天里，我们确实失去了很多人，但也争取了很多。乱世里辈出人物。如果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分裂，就不可能获得成果。推动时代前进的人们如果能够抑制自己，实现善美的协助，胜利将是属于我们的。

从这种意义出发，今天韩国国民不仅向全斗焕集团的军部，而且也向反体制的领导人号召，不要以为权力第一，而要认识到民主化第一和祖国第一。千万不要忘记，人的社会往往由于人们在决定性的时刻不能协助而灭亡的事实。